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03-13

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余谋昌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北京 100732)

[摘要]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方面与全过程,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之路,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确保经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当前,可采取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措施来开展这一工作。其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确立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并将其融入生产技术工艺,实现经济发展基本目标的“三个转变”,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节能减排与资源再生作为突破口,将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来抓。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落脚点是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节能经济、低碳经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需要绿色消费的支持,要创造一种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是一种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以简朴、低碳、公正为特征,是一种更高级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它以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代替物质主义的价值,以适度消费取代过度消费,以多样性取代单一性,以崇尚社会价值和精神需求取代崇尚物质享受。这种生活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是未来新生活的潮流。

[关键词]生态文明;经济建设;生态工艺;循环经济;绿色生活

[中图分类号]F062.2;Q1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1

我们的时代是生态文明时代。20世纪中叶,世界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工业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和高消费生活达到巅峰。与之相伴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等随之出现。进入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接连不断。全球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同时,危机也催生了人类从工业文明社会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转向与发展。

当前的中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力增强,国家崛起。党的十八大报告总结中国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经验时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把生态文明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这样一种“五位一体”的总体

战略所指引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路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认识我们的时代,才能理解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勇敢地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要积极行动,着力“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尤其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一、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重要意义

目前,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1.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收稿日期]2013-06-15

[作者简介]余谋昌(1935—),男,广东省大埔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哲学和地学哲学。

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要求经济建设中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至上、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活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意。

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生态文明观念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于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其主要意义在于:一是在经济建设中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公正平等地分配经济建设成果,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建设和谐社会;二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排除环境污染、避免资源短缺,保证经济建设的良好环境条件和充足的资源供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点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举措。

2.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是全面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其内涵包括:一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的问题,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二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解决能源和其他各种资源的供应问题,建设经济繁荣、人民丰衣足食的美好家园;三是解决人与人的各种矛盾,建设社会和谐、精神和道德高尚的太平盛世。经济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此,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因此,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是全面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需要。

3.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是确保经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以非循环、线性生产为主要特征,其工艺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这是一种线性的非循环性生产。这种生产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大量排放废弃物,是一种原料高投入、产品低产出、环境高污染的生产,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生产方式以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因而没有价值为思想前提,不考虑资源节约的问题,对自然资源过度开采、滥用和浪费,过量排放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从而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问题。为了确保经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至上、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着力发展生态技术和工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二、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应有措施

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须用一系列彼此相关的措施来保证,以下是应有的几条主要措施。

1.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在美丽富饶的中国大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根据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因地制宜地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首先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其次,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此外,还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2.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要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要发展科学技术,推

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要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要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3.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力度

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对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的污染防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尽其能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应认真落实,提高森林覆盖率。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建设一个山清水秀的太平家园。

4.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一步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此,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建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加快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真正做到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形成人人关心、人人珍惜、人人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环境权利。人民不仅有基本的政治、经济和发展权利,还应当有基本的环境权利:有权获得良好的生活环境,有权不遭受污染的危害,有权参与对影响环境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

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方式,它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是生产者、劳动对象和生产技术的有机结合,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建设生态文明首先需要实现生产方式变革,当前要着力做好如下五方面的工作。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价值观和技术工艺

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实现生产方式转变是主线,通过超越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来创造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首先需要实现价值观和技术工艺方向的转变。

(1) 生态文明融入生产方式的价值观

人类中心主义是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这里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全人类为尺度,更不是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它不考虑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它只是以个人(或少数人)为尺度,从极少数权贵阶层的利益出发,其本质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行为的哲学基础。美国学者加勒特·哈丁把地球想象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牧场,每一个牧民都寻求自身财富最大化,无节制地增加畜群,当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时,必将导致牧场的完全崩溃。^[2] 经济发展也一样,如果人们争相从自己获得最大利益出发,不断增加资源开发力度,而不进行资源保护和改善的投资,最后必将导致资源破坏现象不断加剧。世界资源全面短缺和资源危机正是如此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生态领域的“公地悲剧”,更使社会领域由于争夺资源而出现矛盾、纷争和战争,这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以资本最大增殖为目标。为了资本增殖,一是需要不断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二是需要不断加重对自然资源的剥削,两种剥削不断加强。工业文明尽管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现

代化的生活,但也制造了人与人的社会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生态矛盾,导致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全球性爆发。

工业文明遵循的是自然界没有价值的价值观。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中,只有资本有价值,劳动有很低的价值,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表现为市场经济中资本高价而劳动力低价;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的价值是物质生产中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自然资源没有价值,社会物质生产使用自然资源无需付费,表现为市场上商品高价而资源低价。否认自然价值是人类长期以来掠夺、浪费和滥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基础。工业文明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否认自然价值的思想,是现代社会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根源。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产方式转变,首先要超越工业文明的价值观,确立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摒弃“资源无限,用之不竭”的观点,确认资源有限、节约和合理使用的观点;摒弃“资源无价,可以无偿使用”的观点,确认资源有价值的观点,实行有偿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摒弃“资源无主,可以谁采谁有”的观点,树立“当代人和后代同样重要”的观点,实施“资源国有”和“资源共享”的经济政策。

(2) 生态文明融入生产方式的生产技术工艺

依据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可以无限制地开采和免费使用的观点,工业文明的社会物质生产遵循现代哲学还原论分析思维,采取线性非循环的生产工艺,发展线性非循环经济。这种生产是一种原料高投入、产品低产出、环境高污染的生产。就这种生产方式的运行而言,社会生产从自然界取得的物质中,被利用的仅占3%~4%,而其余96%则以有毒物质和废物的形式被重新抛回自然界。工业发达国家每人每年要消耗大约30吨物资,其中仅有1%~1.5%变为消费品,而剩下的则成为对整个自然界极其有害的废物。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紧张的、而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危险的关系;这种情景对于未来的人类文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3]

也就是说,工业文明的生产采用线性非循环工艺路径,它耗尽资源而不讲效益和环境破坏,它的生产工艺是一种高度浪费型的工艺,它的物质生产是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损害资源的生产。地球没有能力支持这种生产方式和技术形式的无限发展。

生产方式转变,在生产技术和工艺上,主要是改变线性、非循环的生产工艺,创造非线性、循环的生产工艺。它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

……这是运用生物圈的发展规律,模拟生物圈物质运动过程,以整体最优化的形式实现社会物质生产无废料生产过程,创造和实施生态工艺的生产方式。生态工艺是应用生态学观点,主要是生态学中物种共生和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的原理,运用系统工程优化方法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设计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的产业技术体系。这种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形成的是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形态。

2. 实现经济发展基本目标的“三个转变”

经济发展目标决定经济发展道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目标需要实现“三个转变”,这是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

(1)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协同拉动转变

投资与消费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居民消费增长是经济发展重要动力。工业发达国家重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例如德国国家消费占GDP的57%,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70%。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2010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4%。居民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所占比重过低,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又助长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从生态文明的价值观看,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需要注意“削高补低”:一是减少和抑制过量消费和奢侈消费,二是补足穷人被迫的消费不足,解决广大居民的温饱、居住条件、医疗卫生服务、孩子上学、社会保障等问题。如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多数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大多数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

(2)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实现“三产统一”

工业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其三次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依次为2%、28%、7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2011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依次为10.1%、46.8%、43.1%,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做大第三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管理推进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走发展生态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其次,要不失时机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在继续发展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住宅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再次,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依托重大项目,集中力量攻关,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等传统产业,发展生态工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3)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管理创新转变

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特别是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必须把节能减排作为重要措施,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抓紧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

态环境的法律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节能、节水、节材机制。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加快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实施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的污染防治,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实现经济发展基本目标的“三个转变”,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加快推进“三个转变”,逐步形成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相协调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3. 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按照生态文明观,实现“三个转变”需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当前经济结构调整要抓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主要路径是从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着力发展第三产业,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我国第三产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据报道,2011年虽然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在三次产业中已上升为第一位,占劳动人口的35.7%,已高于农业34.8%和工业29.5%的比例,但与日本、韩国、巴西和俄罗斯等国相比仍显落后——韩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劳动人口的比例1995年已达到65%,日本1987已达到60%,俄罗斯2009年这一比例为62%,同年巴西为61%。可见,中国的第三产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2)实现“三产一体化”

人类文明发展中,农业文明社会的经济主要由第一产业——农业(含畜牧业)发展推动,这是“一产时代”。工业文明社会的经济主要由第二产业——工业(制造业)发展推动。进入现代社会,服

务业兴起后,经济结构明确划分为三个主要产业: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彼此分工明确,各自独立发展,具有很高的效率,创造了巨大经济财富和完善的公共服务,成为“三产时代”。

生态文明的社会,经济结构从“三产”分别发展向“三产一体化”发展,生态产业成为社会中心产业。生态文明的经济结构虽然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但是它们经过生态技术和工艺改造,超越了工业文明时代的结构和属性,具有“三产统一”的整体性,因而是“三产统一”的时代。比如,江西安吉培育竹林产出毛竹,这是第一产业;全竹利用,这是制造业即第二产业;依托竹子博览园和“中国大竹海”等景区发展旅游业,兴办“竹海人家”之类的农家乐,生产出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文化,此时竹业又是第三产业。这样,三产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发展了县域经济,富裕了人民生活;满山毛竹良性生产,增添了安吉的美丽;竹文化成为推动安吉经济—政治—文化—自然协调发展的支点。

4. 将节能减排与资源再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

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两个严重问题。2007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节能降耗、污染减排政策,普遍建立节能减排责任制。”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提出节能减排的实施对策。

“节能”是指节约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解决能源和其他资源短缺问题;“减排”是减少“三废”和噪声等对环境有害物质的排放,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高消耗、高能耗和高排放。我国工业化发展起步晚,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和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又较低,节能减排面临严峻形势。据有关部门统计,2011年我国GDP为47.15亿元,占世界GDP总量的9.5%,但是消耗34.8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19.3%;消耗钢材8.4亿吨,占世界的46.9%;消耗水泥20.7亿吨,占世界的54%。GDP增长以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消耗为代价,社会终端产品仅占原材料总投入的20%~30%,大量原材料变成了“三废”排放,污染了环境,河流、湖泊和地下水受到了严重污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16个,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10%。

我国能源依存度不到50%,需要进口大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来支持经济发展。但是能源利用率不高,如果以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计算,我国能源消耗是美国的4.7倍,德国的7倍,日本的11.5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环境污染和资源能源短缺形势在不断恶化,越来越成为损害人体健康和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

因为节能减排问题太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挑战太尖锐,问题太重要,需要解决的时间太紧迫,因而要把它作为突破口。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即到2015年,单位GDP其CO₂排放降低17%;单位GDP能耗下降16%;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从8.3%提高到11.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10%。在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我们已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中国碳排放要比2005年减少40%~50%。

为了解决以上两大问题,我国政府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根据这两个指标,如中国GDP年均增长一成,5年内就需要节能6亿吨标准煤,减排SO₂约620多万吨、化学需氧量570多万吨。

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也仅仅是突破口,突破以后要继续前进。这是更加艰难、更加重要的任务。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最终解决节能减排问题。

工业文明的生产模式不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标,向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转变是必然的。生态文明采用非线性的、循环的生产方式,以原料的最大限度利用或循环利用为特征。生态文明的生产,使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成为统一的生产过程,是真正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将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现今的资源短缺或枯竭的形势,预示着我们需要面临资源利用模式转变的问题。工业文明的发展中,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工业生产采用“矿产—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生产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化生产,通过资源再生,采用“矿产—产品—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生产模式,是可持续的。也就是说,按新的思维方式,资源开发从“资源开采型”向“资源再生型”转变,这是现实的需要。“资源再生”是资源开发的新途径,将为人类矿产资源利

用提供无限的可能性。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也大致是这样。它是一种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总之,节能减排,要依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依靠科技发展,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强化技术创新模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设备;加快发展循环经济,通过“节约”和“资源再生”并举,实现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5. 将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来抓

党的十八大非常重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强调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制定了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规划和计划,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以及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科技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高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是建设生态文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建设,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落实十八大精神,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需要,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迫切需要。

工业文明是以科学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中,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人们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改变了世界,推动了社会进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要重视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第

二,要注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负面作用。学术界在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时,提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注意到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不良应用密切相关。

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关性,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戴森认为,美国科学社群要对都市社会与公众的道德沉沦负责任,因为科学实验输出的产品成为有钱人的玩具,很少顾及穷人的基本需要,科学家成了贫富之间鸿沟日益扩大的帮凶;他们扶植成立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并协助贫富不均由国家规模扩大到国际规模,使公众对科学的愤怒愈演愈烈,忌恨愈加深沉;科学社群应当多多投资在那些可使各阶层民众都能同蒙其利的计划上,使科学朝着对各地民众都有益的科技创造方向前进。^[4]美国生态学家康芒纳说:“在每一个例子上,新技术都加剧了环境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5](P122)}“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5](P120)}出现这种现象,不是由技术本身(技术本性)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目标决定的。康芒纳说:“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在完成它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既定的目标上。”^{[5](P148)}这是对工业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宝贵的经验总结。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提高和改善了人民生活,这是科学技术的成功;但同时,它也制造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制造了生态危机,这是科学技术的失败。而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科学技术价值观的转变,即通过科学技术发展生态化来实现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我们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应用工业文明的成果,包括物质成果、科技成果、思想理论成果等文化成果。生态文明不是否定现代科学技术,而是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生态化,实现科学技术价值观、世界观和科学观的变革。

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以整体论世界观作指导,从分化走向综合,发展以综合性为特征的科学技术。如在推动生产方式转变中,创造生态工艺,开发生态技术,建设生态产业,最终解决困扰我们的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第一步,开发污染物清除的技术,实现对有害有毒废弃物的净化处理;第二步,开发废弃物再利用技术,实现废弃物资源化;第三步,开发不产生污染物质的技术,实现清洁生产;第四步,开发无废料生产技术,模仿生物圈物质循环的生

产,开创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新的技术形式。这样,我们将会走上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四、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落脚点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党的十八大描绘的我国发展战略蓝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落脚点是加快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节能经济、低碳经济。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

1.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生态学相结合。它的主要特征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仅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而且必须有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的目标,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发展生态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从技术和工艺的角度,需要发展新型产业,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生态旅游等。它以生态工艺或生态技术的应用为特征,以改变高消耗、低效益、高污染的生产形式,实现原料低消耗、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的生产。从区域经济的角度讲,就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生态设计,如山东威海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生态化海滨城市,广东珠海建设现代化花园式生态市,辽宁大连园林化生态市建设等。这种经济转变的关键是以“自然价值”概念为基础,重新设计人类经济活动,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实现这种转变,发展可持续经济,既保证生产足够多的财富,以及财富的公平分配,不断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又保证有较好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潜力;既不对后代的发展造成损害,又不对生态安全造成损害。因而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展生态经济的主要原则有两条。

(1) 遵从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统一的原则。运用科学的生态学思维,我们一要遵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使生产力结构与地理结构相适应,根据生态资源的特点设计生产力布局,在经济发展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要遵从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再生产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因而,经济发展不能损害自然再生产过程,对可更新资源的开发不能超过它的再生能

力。要使物质循环概念成为社会目标,使通常意义上的废物重新进入经济过程,降低资源消耗速度,减少废料排放,实现资源充分而合理的利用。三要遵从经济与生态平衡发展的规律。一定的生态潜力是一定经济潜力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人对自然的需要不能“取走的比送回的多”;保持生态潜力的积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每一次大量使用资源,社会必须投入相应的用于资源保护的基金,对资源消耗进行补偿,以维持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平衡,以社会劳动和自然潜力的最小消耗取得最好的生态经济效益。

(2) 遵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生态经济最重要的概念,实现三者统一是发展生态经济的目标。如为了解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矛盾,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注意改善生态状况、取得生态效益,在取得生态效益的同时要注意经济效益,通过经济效益提高增强改善生态效益的力量,通过建立对我们更加有利的生态关系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

为了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需要重新定义传统经济模式中有关财富、利润、效率等概念。财富,不仅仅是经济财富,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人和精神)和自然财富(环境和资源);不仅社会物质生产(人类劳动)创造价值,自然界物质生产(生态过程)也创造价值,要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利润,可用“利益”概念来替代,例如“企业最大利益原则”,不仅仅是企业的利润,而且包括社会利益、生命和自然界利益,是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不能以损害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代价去实现企业的最大利润。效率,如果只是以企业实现多少利润计算,那是不全面的。如在现行经济模式中,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可以免费使用,不计入生产成本,这样计算出来的效率是扭曲的。

1997年5月14日路透社以《研究发现,我们每年欠地球33万亿美元》为题报道说,美国国立生态分析和综合研究中心一个由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估算了地球的生态价值,包括空气、海洋、河流和岩石的价值,例如,森林为人类提供新鲜空气每年每公顷的价值为141美元,气候、气流、水、土壤形成与物质循环,以及垃圾处理、生物控制、粮食生产、原材料、消遣与文化娱乐,每年每公顷的价值为969美元。“就整个生物圈来说,每年它向

人类提供物质的价值估计在 16 万亿至 54 万亿美元之间,平均每年为 33 万亿美元。这肯定是个最低估计。这些物质大多数是市场上买不到的。”“如果没有生态学生命保障系统的贡献,地球的经济就将停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地球对经济贡献的总价值是无限的。”

但是现在的世界经济是在没有考虑地球的生态价值的情况下计算效率的。它没有准备为使用自然价值付款。如果真正按照生态系统对全球经济贡献的价值计算效率,并付出代价,那么全球价格体制将与现行的体制迥然不同。随着自然资本和生态贡献在将来越来越受重视和变得更加匮乏,其价值只会不断增加。这样,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其经济效率便会大大降低。

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一,人类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

2.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由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1997 年,日本通产省产业结构协会提出“循环经济构想”,要求发展循环经济,到 2010 年使日本新的环境保护产业创造约 37 万亿日元产值,提供 1 400 个就业机会。2000 年 6 月,日本制定《促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目的是脱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模式,建设循环型社会,促进生产、流通和消费中物资的有效利用或循环利用,以限制资源浪费和降低环境负担。依据这一基本法又相继出台《家电循环法》《汽车循环法》《建设循环法》等法律,并将废弃物零排放作为企业经营理念,逐步实现以清洁生产和资源节约为目标的产业结构。1996 年,德国颁布实施《循环经济与垃圾处理法》,随后又制定《包装条例》《限制废车条例》《循环经济法》等法律,成立专门组织对包装等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回收利用,试图将生产和消费改造成统一的循环经济系统。

我国水利部资源司原司长吴季松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的“三 R”原则是:(1)减量化(Reduce):从传统的经济活动源头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理念,扩展到降低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使之合理化。认为应该满足的是需求而不是“欲望”,把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的概念扩展到“知识人”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自然资源供需平衡。(2)再利用(Reuse):从传统的延长产品使用周期、一物多用的理念,扩展到基础设施与信息资

源共享,建立以废弃物为原料的再制造产业,尽可能利用再生资源替代短缺资源。只有这样,才能留给下一代更多的可利用资源,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3)再循环(Recycle):从传统的利用生产废物为生产原料的理念,扩展到把传统工业经济“提取原料—制造产品—排出废物”的产业体系,改造为“提取原料—制造产品—排出废物—变为其他产业原料”的循环产业体系。^[6]

进入 21 世纪,发展循环经济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取向。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设想,即通过循环经济建设,走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人与自然双赢的道路。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我国经济建设走向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要求。

与传统经济模式比较,循环经济具有三个重要特点和优势:(1)可以充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2)可以实现社会、经济 and 环境的共赢发展;(3)在不同层面上,将生产和消费纳入一个有机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中,包括企业内部通过清洁生产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企业和产业之间通过生态工业网络的资源循环利用,以及社区和整个社会通过废弃物回收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这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解决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统筹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关系,实现两者协调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已在上述三个层次开展循环经济实践:(1)2002 年我国颁布《清洁生产促进法》,目前在 20 多个省市区的 20 多个行业、400 多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 20 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有 5 000 多家企业通过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几百个产品获得环保标志;(2)在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或开发区建立了生态工业园区,园区内上游企业的废料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实现了资源最佳配置和综合利用;(3)在辽宁、贵阳等省市开始探索区域层次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7]

3. 努力发展低碳经济

2009 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是: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特别是大量燃烧煤炭和石油,向大气排放 CO₂,产生地球“温室效应”,导致地球增温,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

威胁。

工业化以前,大气中 CO_2 含量为 0.028%,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每年进入大气的 CO_2 有 1 500 亿吨以上,使大气中 CO_2 含量从 0.033% 增长为 0.037 9%,2000—2006 年 CO_2 年排放量达 2 340 亿吨,大气中 CO_2 含量达到 0.050 0%。大气中 CO_2 浓度增加,导致地球增温,地球冰川和两极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一些岛国和沿海地带将成为泽国。科学家报告说,如果不减少 CO_2 排放,本世纪内全球气温将升高 1.5~4℃,水平面将上升 0.8~1.8 m,菲律宾的马尼拉的大部分可能位于 1 m 深的水下,雅加达、湄公河三角洲、孟加拉等地将有大量居民撤离,出现全球难民潮。地球增温导致气候带改变,灾害性天气增加,将严重损害生命和自然界利益。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人们认识到,必须立即改变高碳经济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冯之浚等^[8]认为,所谓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称。它的基本特征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基本要求是减少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生态平衡,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应有的措施主要有: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开发低碳技术,加强科技储备;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如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等;改善土地利用,扩大碳汇潜力,提高森林、耕地和草地对温室气体吸收和减少排放,并保持或增加它们的碳库容量;大力节约能源使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能源消耗大国,又是 CO_2 排放大户,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承担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需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2007 年 9 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 APEC 第 15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 4 个“碳”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并建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2008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首次把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学习内容。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

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我国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而不懈努力。

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定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政策规定、规划、方案和具体指标,描绘了国家发展“低碳经济路线图”。^[8]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0% 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 的约束性指标。这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国家制定和实施发展低碳经济路线图,表明我国正在走上低碳经济发展的轨道,正向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前进。

生态经济、环境经济、节能经济、低碳经济,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称为“新经济”。它区别于工业文明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从原料高投入、产品低产出、废物高排放、环境高污染的浪费型经济,向原料低投入、产品高产出、废物低排放、环境低污染的节约型经济发展。“新经济”的技术路线是:应用生态工艺和生态工程,开发生态技术,建设生态化产业,生产方式从线性非循环生产向非线性循环生产发展。它优于现代技术:其一,在价值观上,它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还包含环境保护目标。它不是以当代人的利益为唯一尺度,而是既满足人的需要又有益于生态平衡,其应用要兼顾当代人的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及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利益,因而它不是“反自然”的,而是“尊重自然”的。其二,它的科学观是整体论的。传统工业技术依据分析性思维,追求单一生产过程和单一产品生产最优化,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生态工艺运用整体性思维,通过生态学与其他基础科学的结合,通过跨科学的综合研究创造综合性技术,并朝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其三,它的组织原则是非线性的和循环的。因为它不再以单项过程和生产单一产品的最优化为目标,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整个生产过程的综合性生产以及多种产品产出的最优化为目标,以资源分层利用或循环利用为特征。其四,在社会功能上,由于实现资源的多层次分级利用,社会物质生产中,物质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在工业生态系统中循环,进入系统的物质都是有用的,以多种产品输出和废物最少化的方式完成生产过程。在这样的生产中,污染被认为是设计上的缺陷,即未能充分利用某种可利用的资源,一旦出现污染将在生产中被排除。

“新经济”是生态文明时代生产方式的主要方面。生态文明社会的中心产业是生态产业,以生态

产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及其经济基础、性质和结构向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经济基础、性质和结构转变,向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基础和文化转变。建设“新经济”是迈进生态文明社会的主要路径。

五、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需要绿色消费的支持

消费是发展经济的直接目的,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战略,非常重视推进生活方式转变,倡导绿色消费,并把它看做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工业文明的消费生活,以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享乐主义为主要特征,它是一种高消费的生活;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则以绿色消费为主要特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需要绿色消费的支持,我们要推动人类消费从高消费向绿色消费转变,创造一种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

1. 绿色生活方式是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遵循大自然法则、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它包括5个方面: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绿色消费,环保选购;重复使用,多次利用;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万物共存。

绿色生活以简朴和健康的生活为目标,在物质消费中,偏爱和推崇绿色产品;享受方面,在满足生命基本需求的基础上,重视精神和社会需求的满足。绿色产品是指其生产和消费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生态无害,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产品。如绿色食品是无污染、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品,其食品原料产地具有良好的未受污染的生态环境;食品原料作物的生产过程,以及水、肥、土等条件符合无公害(无污染)的标准;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送的全过程符合食品卫生法规。此外,如生态时装、绿色汽车、绿色电器、生态房屋、绿色家庭、生态饭店、生态旅游、生态银行等,都是绿色消费的内容。绿色消费成为生活新时尚,引导一个新兴市场——绿色市场。在绿色市场上,商品上贴有“环境标志”或“绿色标签”,表示它是绿色产品。

现在,绿色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定义,它已经是人们的生活要求、生活目标、生活实践,成为一种亲近自然、注重环保、尊重生命、关爱社会、分享快乐、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的目标是,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社会关系更加公平正义,和谐平安;自然结构更加有序,更富生机和活力,建设

“人—社会—自然”稳定、健全和繁荣的复合生态系统。

现代社会的消费价值观是“增加、拥有和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就多一分幸福”,“充分享受更丰富的物质即为美”的价值观;它的口号是“更多、更大、更好”;它的实践是高消费。实际上,高消费或过度消费并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幸福感并不随着消费的增加而增加。英国经济学家柯蒂斯·伊顿和穆凯什·埃斯瓦兰依据他们创建的数学模型提出一种理论: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一旦达到某一合理标准,财富的继续增加非但不会给其人民带来更多的益处,相反还可能让民众感到更不幸。他们说:“炫耀性消费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幸福,还会损害经济发展的前景。”^[9]现在,发达国家对财富的痴迷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绿色生活才是我们需要的生活,它简单、宽容、健康、舒适、安全、和谐。

2. 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之特征

工业文明的消费生活,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是一种过度消费,它大大超过人的基本需要,成为“异化消费”;它不仅没有为人类带来快乐、幸福和安康,而且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损害,是不可持续的。新的生活方式超越过度消费,因而是一种简朴生活;超越浪费型消费,因而是一种低碳生活;超越它的不公正性,因而是一种公正生活。

(1) 简朴生活,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标准

简朴生活是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目标,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的适度消费的生活。“生活质量”更关注人的生活舒适、便利的程度,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和乐趣。简朴生活以节约为本,拒绝高消费,抑制贪欲和浪费,反对豪华、奢侈和挥霍。

勤劳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古代哲人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老子主张约养持生、崇俭抑奢,自然无为,行为要单纯,心地要纯正,生活要俭朴,过一种淳厚质朴、淡漠静心、同自然完美统一的生活。《老子》第19章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59章说,“治人事天莫若嗇”;第29章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35章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平安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第67章说,“我恒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老子认为,不要以追求物质欲望为乐,盼望享尽天下之美如权势、珠宝、声色、安逸、奢华是愚蠢的。《老子》第12章说:“五色令人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

畋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他主张无欲,“知足常乐”,“知足不争”,这才是快乐,这才会有幸福。

道家主张,平为福,其理想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为此,又提出生活的5项要求:“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公而不党,易而无私……齐万物以为首”;“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庄子·天下》)。因此,道家主张“重生轻利”,过一种纯朴的生活,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基础上重视满足精神文化需要。庄子说:“道之真以治身……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能尊生者,虽宝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忘其身,岂不惑哉?……重生则利轻。”(《庄子·让王》)

(2) 低碳生活,崇尚勤俭和节约

低碳生活是一种简朴的生活,是低消耗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生活。它一方面需要靠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使大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自然责任;另一方面,需要对人的低碳行为以税收的形式加以引导和驱动。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是公有财产,它们是有价值的。生活消费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条件(碳排放增加),是在消耗自然价值,支付相应的赋税是完全合理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8年6月发表报告说,实行低碳生活将使“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并对个人采取低碳生活方式提出了具体意见:用传统发条式闹钟替代电子钟,每天减少CO₂排放48g;把电动跑步机上的锻炼改为到附近公园慢跑可以减少近1kg的CO₂排放;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而是自然晾干,可以减少2.3kg的CO₂排放;在午餐休息时间和下班后关闭电脑和显示器,可以减少1/3的CO₂排放;改用节水型沐浴喷头,不仅节水还可以减少1/2的CO₂排放量。

(3) 公正生活,推崇消费平等公正

从建设生态文明的角度,生活方式转型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解决大多数人消费不足的问题,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解决“异化消费”的问题,抑制高消费和过度消费。

现代消费生活,高消费与消费不足两种生活同时存在。生产者创造了丰富的产品,为有钱人的高

消费和过度消费创造了条件,自己却买不起产品,常常消费不足。两者反差非常突出,这是不公正的。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才是公正的。

生活方式公正是道德问题和社会责任问题。在社会生产领域,企业追求最大利润,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或者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增殖利润,这是不道德的,违背了社会责任,违背了自然责任;在社会生活领域,有钱人的高消费和过度消费,也是不道德的,违背社会责任,违背自然责任。因此,我们要大力倡导简朴生活、低碳生活和公正生活。

3. 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之结构

简朴生活、低碳生活和公正生活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它的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这种生活方式对于个人是简单、方便和舒适,对于社会是高尚、公正和平等,对于后代是爱、责任和希望,对于自然是热爱、尊重和奉献。可持续的生活,既要满足人(现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基本需要,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需要,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和深度要维持在地球生态系统可承受的范围内,使现代人、子孙后代、地球上千百万物种共存共荣共享地球资源。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结构。

(1) 人类可持续的绿色生活路线图

人类可持续的绿色生活需要社会的强力支持,要在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指导下,确立公正平等的社会关系,发明创造有利于绿色生活的高新技术和生产工艺,壮大绿色企业,进行绿色制造和绿色生产,开发绿色市场,动员绿色消费。反过来,绿色消费推动绿色市场,绿色市场以绿色消费为动力,推动绿色制造和绿色生产的发展,绿色制造和绿色生产推动绿色科技的发展,推动生态文明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巩固和发展。绿色生活建构的路线图是:绿色消费→绿色技术→绿色制造→绿色产品→绿色市场→绿色采购→绿色消费;反之亦然。这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良性循环发展的绿色生活的完整体系,构成新的生活方式。绿色科技,如创造生态工艺,实现能量分层利用、物质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的生产;创造绿色能源和节能的生产和工艺,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聚变能等。绿色制造和绿色生产,需要政府和公众支持、鼓励和奖赏企业进行绿色制造,生产绿色产品,发展循环经济。绿色市场,通过绿色消费,鼓励和支持绿色营销和绿色采购,生产推广有机食品,天然化妆品、服饰、家具,节

能住宅、酒店设备等。从科学技术到产品生产,从产品到市场,从市场到生活消费,形成绿色生活的完整结构,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2) 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方式

关于“可持续消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94年《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提出的定义是:“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要。”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强调人的基本需要和生活质量以及后代的利益。

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是简朴生活、低碳生活和公正生活。

其一,它以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代替物质主义的价值。工业文明下的消费生活注重物质享受,以高消费表征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可持续的绿色生活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更加强调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将成为生态文明社会的时尚行为。

其二,它以适度消费取代过度消费,以简朴生活取代奢侈浪费。可持续的绿色消费,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青睐绿色产品;其格言是“回收利用,重复利用,更新”。

其三,它以多样性取代单一性。现代社会“多样性是效益的敌人,单一性统治一切。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在世界各地规定着消费尺度。这种强制统一的独裁统治比任何一种独裁统治都更具横扫千军的力量。它迫使整个世界奉行同一种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像复制模范消费者一样再造人类”^[10]。在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下,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层次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消费需求,厂家和商家要生产和销售多样性的商品,以满足消费需求

多样化;商品和服务种类、质量和数量多样化,以适应消费者个人兴趣和爱好;人们有更多选择的自由,有利于消费者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

其四,以崇尚社会价值和精神需求取代崇尚物质享受。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是一种简朴的物质生活加丰富的精神生活,超越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崇尚社会价值和精神审美需求,人们乐于享受较高的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信仰生活。这更符合人的本性,更符合自然本性,更适应时代的潮流,是有更高质量的新生活。

简朴生活、低碳生活和公正生活是更高级的生活方式,是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以这种生活方式生活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初衷,也是其目的,是未来新生活的潮流。

[参 考 文 献]

- [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美]维西林,冈恩. 工程、伦理与环境[M]. 吴晓东,翁端,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15.
- [3] [苏]弗罗洛夫. 人的前景[M]. 王思斌,潘信之,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49.
- [4] [美]戴森 F J. 宇宙波澜: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M]. 邱显正,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
- [5] [美]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M]. 侯文惠,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6] 吴季松. 略论新循环经济学[J]. 人民论坛,2005(9):84.
- [7] 解振华.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J]. 求是,2003(13):53.
- [8] 冯之浚,周荣,张倩. 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J]. 中国软科学,2009(12):23.
- [9] 杰米·道尔德. 国家越富裕 幸福感越低[N]. 参考消息,2010-03-16.
- [10]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消费帝国:一个诱杀傻瓜的陷阱[J]. 绿叶,2009(3):1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16-05

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协同与实现路径

夏梁省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室, 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冲突。生态约束倒逼民营企业树立生态协同发展理念。推动民营企业建立利益追逐与生态约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应在民营企业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内在化处理;同时,应寻求规制框架下生态文化理念的实现路径,强调产权约束下的生态治理和生态评价考核的常态化,注重纳入法制轨道的生态理念塑造以及民营企业生态文化素养的培育。

[关键词]民营企业;利益协调;生态理念;产权约束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2

经济利益与环境因素密不可分,环境在为生产经营提供活动场所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由利益分割所带来的相互冲突。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一般不会自动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协同考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要求共赢和共识同时存在。共赢对利益共同体而言是必要条件,而共识则是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充分条件或者可行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民营企业发展的利益范式更多的是忽略环境成本基础上的利益寻租,而以公共环境为代表的公共利益具有弱化特征。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探究民营企业的生态理念逻辑建构空间。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冲突,而生态约束又倒逼民营企业树立生态协同发展理念。要推动民营企业建立利益追逐与生态约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就应在民营企业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到均衡点。

一、生态约束会倒逼民营企业树立生态协同发展理念

生态约束带来民营企业环境成本上升,减少民营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利益寻租,倒逼民营企业改善生产结构,提高生产技术,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积极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比如通过引进发展低

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产品,减少或叫停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生产项目,加快生产技术、装备设施与产品的转型换代升级,以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实现生产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进入循环经济发展业态。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民营企业也应该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产品生态设计、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清洁生产等举措,加快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工艺改进和管理创新,通过节能减排,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民营企业要走上循环经济业态主要是靠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以及无害化生产三条技术路线,通过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达到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减少向大自然的索取,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发展道路。从目前来看,我国普遍存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倾向于解决复合型生态问题,而实践形式也主要是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等,目的是通过这些实践措施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在循环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做法主要是以解决废弃物问题为出发点,坚持3R(减量化 reduce、再利用 reuse、再循环 recycle)原则,进而向企业生产的上游延伸,改变大量生产、消费与废弃模式。综合比较分析,我国民

[收稿日期]2013-08-20

[作者简介]夏梁省(1986—),男,安徽省阜阳市人,中共台州市委党校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土地财政。

营企业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发展经验,实现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针对生产废弃物做到从利用废物到减少废物的质的飞跃。民营企业在进入循环经济业态过程中,要兼顾成本与资金要素,实现物质资源与能量循环在时间、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同。

二、推动民营企业建构利益追逐与生态约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

民营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能否树立生态发展的理念,关键是在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到平衡点,而理论上的逻辑建构空间就在于利益追逐与生态约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就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民营企业的流程管理与过程控制,确保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内在化处理;二是加强社会外力的监控,推动民营企业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1. 通过企业内部控制协同企业利益与公共环境利益

从协同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应该坚持环境“三同时”制度(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性开发建设项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实行环境管理目标责任制。重点加强民营企业环境污染内控制度建设,注重过程管理,将企业生态体系的管理贯穿于企业生产运作的各个环节。首先,从产品设计开始即融入生态设计理念;同时,要重视并加强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环保工艺设计与清洁生产过程管理。通过过程管理等措施,减少产品在服务、原料、能源上的使用量,达到削减污染物排放的目的,加强物质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在产业集聚层次上,要依照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工业生态学的发展理念,实现不同产业层次上的企业与周边环境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废弃物的导入导出在集聚区内形成生产资源聚合、能源汇聚、要素集聚与信息共享。

由于不少民营企业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会对周边环境或者其他居民群体产生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而民营企业却没有为之承担必要的成本费用,从而产生不正常获利,这就是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是指社会公众无法通过市场行为或者某种交易制度获得相应的负外部性补偿,或者说让产生负外部性

的主体通过支付补偿金承担相应的外部成本。于是,在逃避负外部性责任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往往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社会公共利益中获取更多的个体收益。如图1所示,当存在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时,民营企业通常没有为其造成的环境污染或者所获的公共收益支付相应费用,因此,在最优产量 Q_0 时,民营企业的边际收益就等于其应该支付而未付的边际外部环境成本。此时, A 面积就为最佳的社会净收益, B 面积为最优外部效应,而 $A+B$ 则为民营企业最佳的私人净收益。一般情况下,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边际外部环境成本通常为正值,也就是说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破坏生态环境而获取生产活动的额外收益,这就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净利润总额在某一固定时期不会达到最大规模,出于利益的考虑,民营企业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一直到边际外部环境成本 $P_{EMC}=0$,这时就达到了民营企业的最大生产规模 Q_1 ,而 $Q_1=A+B+C$ (C 为对社会无益的私人净收益),大于先前的 $A+B$,由于此时外部环境成本为 $B+C+D$ (D 为生产规模超过均衡点时所产生的社会公共福利净损失),于是社会净收益为 $(A+B+C)-(B+C+D)=A-D$,小于先前的社会净收益 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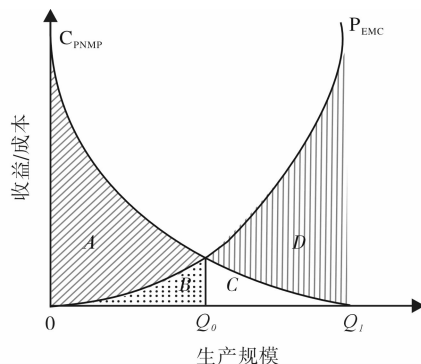


图1 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

对于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要通过消除 $C+D$ 来实现环境污染控制的目标。而在政府调控缺失与制度管控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消除 $C+D$ 的关键就在于民营企业的生态理念。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生态理念普遍处于缺位状态,个体利益与生态意识不协调,不能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做到兼顾生态保护的有效流程管理与过程控制,从而导致众多民营企业出现生产活动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

通过对民营企业污染事件的总结分析可知,许多污染事故的源头都在于民营企业的污染防控缺乏前期、中期、后期的过程管理,导致企业污染的外部

性问题凸显,对区域内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在生产过程中加强管理。重点进行民营企业的污染防控的过程管理,将民营企业产生污染的外部性问题进行内在化处理。在前期,对民营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生产环评、生产工艺环保设计、环保材料审核等,做好源头防控;在中期,加强各个生产环节的监控与整改,主要采取生产监控、污染排查、生产工艺革新等措施,确保不会由生产环节产生外部污染问题;在后期,主要做好污染物的应急处置,避免污染产生外部性问题,防止危及周边环境与居民生活环境。同时,要进行污染物源头追溯、生产改进分析,并及时向上游生产管理进行15信息反馈。

2. 借助社会力量推进民营企业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是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需要依靠社会多方力量的支持。要构筑由民间环保团体、环保志愿者组成的民间环保联盟,在环境监测、环境跟踪保护、环境治理等方面发挥社会力量的推动作用。通过深入民营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考察调研,详细了解民营企业的生产过程,研究分析哪些生产环节容易对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并针对企业产生的污染物制定行之有效的处置方案,使民营企业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小到最低程度。另外,要组织开展更广范围的社会环保行动,鼓励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并及时制止民营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如由台州市政府环保部门、环保组织与环保志愿者联合发起的关注人居水环境的“清源行动”,通过实地勘测与检验,对市内3个水系、2个饮用水库开展污染源调查、垃圾处理、环保宣传、污染受害者维权等,并对造成污染的民营企业进行了责任回溯追究,迫使产生严重污染的企业进行整改。同时,为了建立长效保护机制,成功举办了社区回收废油脂、黄岩XXX村水源保护点挂牌、灵江水系源头的污染状况调查等多项活动,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

三、规制框架下推进民营企业生态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有效的经济组织、经济活动与行动观念的形成,需要在制度、规则上做

出安排,才能实现个人私益与社会公共收益的趋近。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理念的形成不能仅依靠道德规范的约束,应主要依赖相应的法律法规与制度安排。因此,要通过有效的规制系统规范社会生产、生活,严格监督管理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规制民营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逼迫民营企业的生产活动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1. 生态评价考核常态化

生态文化理念的形成,必须依托完善的生态评价考核体系,构建能够对民营企业生产管理起到规范作用的评价体系,按照合理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应用实施科学的生态学方法,对民营企业所在区域环境状况、生态环境质量的等级状况进行考察评估。实施重点是地方环保部门主导建立由自然或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评价考核体系,对民营企业的生产污染状况进行生态评价考核常态化管控。比如,根据浙江省环保厅《关于开展2010年度浙江省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定的通知》,2011年台州市选取主控因子PH、COD、BOD、NH₄-N、VOC、SO₂、氨氮、硫化物、苯系物、磷化物、氰化物等,对辖区内322家的污染状况进行等级评定,将处于不同污染状况的民营企业从好到差,依次划分为绿色企业(22家)、蓝色企业(199家)、黄色企业(88家)、红色企业(10家)、黑色企业(3家)5个级别,同时以黄色评级作为环保部门介入的临界点,污染状况为黄色、红色、黑色的企业是重点监控与提出整改措施的对象;同时,按照《台州市污染源分类监管工作规定》,对排污企业进行分类监管,以增加污染管控的针对性,及时发现行业与企业。另外,还应组织对环境质量监测和污染源监督性监测,重点监督管理废气、废水、废弃物、粉尘、有毒化学品、噪声、辐射以及机动车污染。这些环保政策举措的实施,能够对民营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规范化、常态化的管理,从而促使民营企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贯彻生态发展的理念。因此,从生态评价考核的常态化开始,使民营企业的环保成本支出预期与政府对污染的严格防控预期相协调,从而迫使民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做出污染防控的管理安排与程序安排,进而在外部压力下形成稳定的生态文化理念。

另外,从建立完善的生态评价考核体系角度出发,要针对生产企业的项目建设与生产活动,建立完善的项目监测指标,并采取科学的污染评价方法。根据国家环保主管部门制定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

管理规定(暂行)》,结合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研究确定具体的污染监测项目及其方法,从而实现污染监测的规范化与生态评价考核的常态化。

2. 加强产权约束下的生态治理

对于工业生产型的民营企业来说,排污权也是一项重要的产权,事关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但是这一权利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所有权,它不是企业因财产或物而获得的权利,而是由社会所赋予的一项公权利。因此,排污权的获得是有成本的,民营企业必须在履行一定义务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排污权,从规范民营企业排污权利与义务的角度考虑,应该对民营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产权界定。这里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以排污费缴纳与排污权获得为核心的产权治理,二是排污权交易。

(1) 产权治理

民营企业排污权的产权治理,主要是明确企业的排污缴费义务以及排污权的获得应该履行的要件。如台州市环保局针对向环境排放各种污染物的企业和个体户明确界定了其义务,规定对特定的排污主体强制征收排污费,这些主体包括向大气超标排放SO₂等气体污染物的生产企业、不具备污水处理设施或处理不达标而向水体排放超标污染物的生产企业、对周边环境的噪声污染超过国家标准的生产企业、向环境排放固体废弃物及具有危险性放射性污染物的生产企业等。为了确保排污企业履行缴费义务,台州市环保局对排污企业进行银行账户专项管理。台州市环保局与工商银行签订网上收款服务协议,专门用来对排污企业进行排污收费;而排污企业也在对应的银行开设专门的缴费账户,使得环保部门能够通过网银对排污费缴纳企业实行电子收费。

另外,民营企业在履行排污费缴纳义务的基础上,向环保部门申领(换领)排污许可证,但进行排放污染物申报时,必须提供上年度排污费缴纳总额、年度与季度用水总量、用煤总量、年产值、固定资产原值、环保设施与装置原值等数据材料;有污水治理设施的,需要提供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运行费用以及环境违法违规被罚款数额等数据材料;有废气处理装置的,需要提供废气处理设施处理能力、全年利税总额、运行费用、脱硫设施数、脱硫能力等数据材料;有排污许可证的,需要提供排污许可证编号、发放日期、上年度产量、原辅材料用量等数据材料,以随时掌控民营企业污染状况的变化,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排污收费标准。

(2) 排污权交易

从污染物总量控制和减排的角度出发,规范发展排污权交易行为,首先要构建以化学需氧量和SO₂等污染物为交易标的的排污权市场。同时,对可交易排污权进行界定,如规定生产经营者按照一定时期内实际完成的污染物减排量减去环保部门分配的减排任务的余额,记为可交易排污权。另外,要在政府授权和指导下组织成立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并迫使排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在储备中心交易平台进行排污权交易,达到严格监控排污权交易行为的目的。

其次,必须对可交易排污权做出科学认定,如对于已经采取工程治理、工艺改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企业,在完成污染物排放削减任务后,有多余指标就可以进行交易;对于城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单位以及农牧畜禽养殖场的污水经达标治理后削减下来的化学需氧量也能进行交易。而且要对可交易排污权认定程序进行规范化设计,按照必要程序即排污企业提交排污材料—书面申请—正式受理—现场核查—公示—审核确认—责任追究等程序进行。如果经过程序化审核,发现某些民营生产企业曾经是造成特大或者重大环境事故的主要责任单位,应该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重点考察这些企业的长效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是否稳定以及污染物是否存在超标或超总量排放问题。只有在这些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可交易排污权的认定。

最后,要对民营企业的排污总量进行核定。对于排污总量的核定是确定企业初始排污权的关键,也是控制区域环境污染总量的基础,有利于全面掌握各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具体情况,便于进一步优化配置环境资源。因此,要按照总量削减原则、达标原则、从严从紧原则对各个民营企业排污总量做出核定,具体方法设计如下:

①工业企业有行业内的排水定额或限额时,以企业的生产产品数量、排水定额、废水排放浓度来计算该企业的排放限值

$$N_i = E_i \times F_i \times G_i$$

N_i 为第*i*个工业污染源在定额排放情况下的排放限值; E_i 为第*i*个工业污染源基准年的产品数量(或近3年平均产品数量); F_i 为第*i*个工业污染源所属行业单位产品最高排水定额; G_i 为第*i*个工业污染源废水允许排放浓度。

②工业企业有行业内污染物排放定额或限额

时,以企业的生产产品数量和污染物排放定额来计算该企业排放限值

$$N_i = E_i \times D_i$$

D_i 为第 i 个工业污染源单位产品排放污染物的限值。

③工业企业既无排水定额也无污染物排放定额时,就以工业企业的生产产品数量、用水定额、排水系数和废水允许排放浓度来计算该企业排放限值

$$N_i = E_i \times A_i \times Q \times G_i$$

A_i 为第 i 个工业污染源单位产品用水定额; Q 为排水系数,一般按 0.7~0.9 计算。

④企业所属行业内无排水定额、用水定额、排污定额等相应具体数值时,采用基准年排水量和废水允许排放浓度来计算该企业排放限值

$$N_i = Q_i \times G_i$$

Q_i 为第 i 个工业污染源基准年排水量。

3. 培育民营企业的生态文化素养

民营企业是在国家的宽松政策鼓励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而它们的发展多是粗放式的,是建立在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高额社会代价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如早在 2003 年,台州市椒江 XXX 化工区排放的化工废水、黑色沉积物在椒江周边形成严重的色斑,以致江水染成“七彩河”,严重破坏了周边生态环境,因而受到国务院点名批评,并令其整改。这说明,民营企业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普遍存在生态环保意识淡薄、生态文化素养缺乏的问题。

因此,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增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文化理念融入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并落实到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中,使其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民营企业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经济细胞,其经营者生态文化素养的高低,是决定民营企业能否牢固树立生态发展理念的关键。为了提升民营企业的生态文化素养,必须引导民营企业自律,强调尊重与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针对民营企业广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倡导生态文明,营造企业主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二是强化社会舆论监督,督促民营企业公开生产排污、环境治理等具体信息,赋予公众对民营企业的环保情况以应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健全民营企业与

公众的协调参与机制。

4. 塑造纳入法制轨道的生态理念

由于企业的生态文化理念形成不会天然地具有自觉性,必须借助外在的强制力,而最具代表性的外在调控力就是环保法制、法规。生态理念的塑造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一方面要加强环境立法,通过环保法规的贯彻实施,查处重大违法的环境污染事故与生态破坏事件,并为区域内出现的环境污染纠纷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是重点完善环保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依法行政,通过强化执法部门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明确环保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权限和职责。

例如,2011 年台州市环保局在各级环保部门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并印发了《台州市排污权有偿使用收入管理暂行办法》《台州市金属熔炼行业环境污染整治指导意见》等地方性政策文件,同时还制定了《台州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方案》,选定临海市 XXX 医化园区 5 家民营企业作为试点,督促试点企业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按照合同条款内容开展绿色环保工作。另外通过开展依法执政先进单位创建活动,规范行政许可审批、处罚程序,确保环保工作有序进行,使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这些措施有力地提升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态保护意识。可见,法制化轨道是塑造民营企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生态理念的有效途径。通过环保行政执法,以环境污染整治为工作重点,强化环境法治的保障作用,监督民营企业的生产过程与污染状况,更有利于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标,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另外,在生态保护法制化框架下,民营企业必须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才能提高应对环境污染事故和风险的能力,规避环保法制的惩罚,以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环境权益得到保障。

[参 考 文 献]

- [1] 万林葳. 生态文明理念下企业环保投资博弈分析与建议[J]. 甘肃社会科学, 2012(1): 242.
- [2] 蒋云霞, 肖华茂. 循环经济理念下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J]. 商业研究, 2010(2): 7.
- [3] 方时姣. 以生态文明为基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 经济管理, 2011(6): 24.
- [4] 邢伟, 张晓明. 基于首要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民营企业生态责任[J]. 财经论丛, 2010(3): 92.
- [5] 邓建平, 曾勇. 金融生态环境、银行关联与债务融资——基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 2011(12): 3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21-04

扎实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路径思考

尚丽娟

(中共泰安市委党校 哲学和科社教研部,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文化强国应具备4个特质:文化精品力作持续涌现,文化精英巨匠不断产生;主流文化旗帜鲜明,核心价值体系作用尽显;国民文化素质整体较高,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文化创新力强劲,文化影响力强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采取上下结合、内外兼修、软硬兼备的方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人素质,把文化产业打造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励全员参与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

[关键词]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3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论述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强调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1](P33)}这是继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我们党又一次把文化强国列入党的行动纲领,充分说明领导层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需要深刻理解文化强国的内涵、深刻把握文化强国的实现路径。目前,关于文化强国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对文化强国的内涵阐释、意义分析,推进文化强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其实文化强国不仅体现在文化经济价值的彰显上,更体现在其精神层面吸引力、感召力的升华上。本文拟在阐释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文化强国的衡量标准、探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原则和途径。

一、文化大国与文化强国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文化强国的论述勾勒出从

“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彰显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坚定决心。

何为文化大国?笔者认为文化大国有三层面的标志:一是文化资源丰富。我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国当今文化发展的基础。二是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异彩纷呈,流传深远。现在,我们的文化表现形式更加多姿多彩,展示着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三是文化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吸引别国主动学习、模仿和传播。

文化强国何以凭借文化而强盛?实现强国目标的文化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文化强国不可能仅仅靠一种文化来实现,只有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繁荣,才能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也就是说,文化强国的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集合。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我们要发展的“文化强国”之文化建设不仅包括弘扬中国优

[收稿日期]2013-08-02

[作者简介]尚丽娟(1976—),女,山东省泰安市人,中共泰安市委党校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大力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并积极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西方文化之精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才有生命力、才有前途,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多元文化的共荣共生。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原因。

文化强国强调的是文化自身强还是文化助国强?党的十八大报告有这样一段论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1](P30)}这就说明我们所要建设的文化强国应该涵盖两个层面:一是实现文化自身的发展与繁荣,把文化作为目的,建成文化强国。比如,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活力迸发、文化创新力提升等。二是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把文化作为手段,靠文化强国。比如,提高素养、更新观念、凝聚人心、振奋精神,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既要实现好文化自身的发展繁荣,又要发挥好文化的积极作用。

总之,文化大国与文化强国关系密切,但又有本质的区别。文化大国是走向文化强国的基础,但文化大国不等同于文化强国。我们不能以文化大国沾沾自喜,没有文化大国质的提升,很难走向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文化强国建设,正是基于文化大国与文化强国的这种内在关联,激发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梦想。

二、文化强国的衡量标准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文化强国做了这样的表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2]考察国外的相关情况,世界一些文化强国在构建文化评估指标体系多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设置一些衡量指标:一是关于环境改善的文化指标,反映了文化建设对自然与社会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二是关于个

人福利与发展的文化指标,反映了文化造福人类,提高生活质量水平的能力;三是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建设的文化指标,反映了文化建设对社会财富创造及社会凝聚力提升的重要作用;四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文化指标,反映了文化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动机”;五是关于文化活力的指标,反映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及全民文化参与度;六是文化行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指标,用来衡量文化事业及产业的运行状况。^[3]结合我国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我们要建设的文化强国应该具备以下特质。

第一,文化精品力作持续涌现、文化精英巨匠不断产生。一个民族只有创作出对世界文明带来深远影响的精品力作,拥有影响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文化大师或文化巨匠,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强国。例如,我国唐朝时期是古典诗歌的极盛时期,被誉为“诗国”,名篇佳作影响至今,诗坛巨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享誉海内外,唐代的中国不愧为那个时代的文化强国。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如果缺少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经典和文化大师,就不是真正的文化强国。

第二,主流文化旗帜鲜明,核心价值体系作用尽显。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性,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一种多元复合的文化,所有国家都有代表本国特质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当一个国家的文化表现出比物质更加强大的力量,当国家的政治经济更能体现出这个民族的文化品格,这个国家就能成为一个文化强国。所以,文化强国必然要拥有旗帜鲜明的主流文化,以表明自身的文化态度。一般来说,主流文化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质。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化的构建,其价值观念都居于核心地位。鉴于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旗帜鲜明的中国特色的主流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的发挥。

第三,国民文化素质整体较高,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一方面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文化强国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是文化强国的显著标志。文化发展是为了人民、文化发展离不开人民。只有全体国民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具有较强的科学、民主、法制意识等现代意识,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目的,

才能更好地助推文化的发展繁荣。文化的终极是社会文明。^[4]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不是在思想上强大、观念上超前、价值上先进、道德上高尚、素质上优秀、精神上凝聚,那就很难称得上是文化强国。文化强国离不开高素质的国民、离不开高层次的社会文明。

第四,文化创新力强劲,文化影响力强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创新只有复制,没有精品只有仿品,是难以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跨越的。我国一直以来是文化资源大国,也是文化产品生产大国,之所以还不算不上文化强国,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创新活力有待激发。此外,一国是否是文化强国,还要看本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如果一国文化能够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欣赏、所喜爱、所认同甚至所追随,国家形象能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认可,那么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文化强国。

三、扎实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路径探析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采取上下结合、内外兼修、软硬兼备的方略。一是上下结合。从国家、各级政府、领导者层面讲,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改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进文化微观运行机制,为文化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体制环境,焕发文化的生机和活力;从文化创造主体的角度讲,文化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讲,应主动吸收先进文化,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积极参与文化创造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助推文化强国建设。上下结合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二是内外兼修。文化强国的衡量离不开纵向、横向两个维度的比较。从纵向的角度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强盛的时期;从横向的角度看,我们所要建设的文化强国是要能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更好地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文化更深入人心和更持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为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内外兼修,一方面要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激发文化的创造活力,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提升文化的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算真正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化的强国。三是软硬兼备。从上文对文化强国的内涵分析中我们知

道文化强国不仅包含文化“量”的增加,还有文化“质”的提升。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要看文化作品的多少、文化设施的多寡、文化产业园区的数目、文化产品输出的数量,还要看这些要素品质的优劣,更要看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否带来社会风尚的好转、是否促进人们人文素养的提升、是否利于整个社会文明度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所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既要注重文化“量”的扩张,更要注重文化“质”的累积。只有量没有质不可能成为文化强国。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具体路径在于坚持好一条道路、完成好一项根本任务、选择好一处落脚点、建设好一个支柱产业、利用好一个动力源泉、营造好一种良好氛围。

1. 坚持好一条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开篇指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1](P1)}主题鲜明地回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精神状态、朝什么目标前进的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4个核心问题,这也是我们做好文化工作的指针。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曾经,我们过多地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制约了文化的快速发展;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不断改变以往对文化属性的看法,承认文化也具有商品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我们更多地关注了文化的商品属性:文化产品、文化市场、文化产业、文化经济价值……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否退居其次呢?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实际上,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都是文化最鲜明、最本质的特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约、引导、规范着文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是马克思文学理论批评家之“珍品”的特瑞·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文化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的问题。^[5]文化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就会像一只无形的手,以一种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力量,把人的行为拉入文化价值设定的制度规范的轨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

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2. 完成好一项根本任务: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P31)}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看成是兴国之魂,并把它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中,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使其渗透进思想理论、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3. 选择好一处落脚点: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人素质

人民创造了文化,文化属于人民。我们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这一执政理念出发,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就是为了提升人们的素质,促进全体国民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其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动力。因为国民素质与文化强国息息相关。强国必须强人,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强国就像空中楼阁,缺乏坚实的人力基础和长久发展后劲。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物质匮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报告又特别强调要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并重点论述了如何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近年来许多模范人物的事迹感动国人,可歌可泣,但是价值失落、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问题,亦令人触目惊心。因此,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提升全体国

民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公民道德素质。而这需要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4. 建设好一个支柱产业:把文化产业打造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文化产业发展快慢、文化产业竞争力强弱、文化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高低是衡量一国是否为文化强国的重要指标。目前文化强国大多是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我们提出把文化产业打造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正是看到了文化产业对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作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标志是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3%,而一些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早已超过10%,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激活两大动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文化科技创新;需要实施三大战略:文化精品战略、重大项目带动战略、文化走出去战略;需要构建四大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体系。

5. 利用好一个动力源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明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中外文化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文化要有活力、实力、竞争力,归根到底要激发创造力。创造力的涌现离不开改革创新。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1](P31)}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需做好4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培育合格市场主体;二是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三是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推动政企分开、政

(下转第29页)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5-0025-05

城乡关联发展中的文化整合

——以青岛市为样本

潘娜娜¹, 任成金²

(1.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教研室, 山东 青岛 266071;

2. 山东科技大学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要] 城市化既不是单一的城市发展,也不是单一的农村发展,而是城乡的关联发展,其中文化整合是城乡关联发展的核心。城乡文化整合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乡村文化的内在要求,是医治现代城市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必然途径。目前,青岛市在城乡文化和谐发展中存在原有的乡村文化遭遇冲击、原有的乡村认同模式逐渐崩溃、村民自我身份无从确立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公共文化服务失衡使得一些农村陷入文化贫困的境地、在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中优秀传统文化缺位等。要实现青岛市城乡文化的和谐发展,需要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资源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对其进行整合,在突出双方优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符合区域发展又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精神,既注重文化整体性、又兼顾城乡文化差异性和可持续性,使市民、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其他流动人口的思想价值观念趋于一致,在精神塑造和素质能力的培养等方面得到整合,在民俗民风、生活习惯和传统工艺等方面各有特色,最终形成二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关键词] 城乡关联发展;文化整合;城市文化;乡村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4

关于城乡文化整合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研究,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如《论城乡关联发展与文化整合》^[1]《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文化整合》^[2]《论城乡网络化发展与文化整合——城市化的后现代视点》^[3]等,但这些成果很少具体到青岛市的城乡关联发展中的文化整合问题。本文拟就此做一些拓展性研究,给出青岛市城乡关联发展中的文化整合路径建议。

一、城乡关联发展中文化整合的战略意义

1. 城乡文化整合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乡村文化的内在要求

所谓城乡文化整合,是指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

通过接触、融合、吸收、调和等方式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共同体的过程。它不是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简单适应,也不是双方对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而是对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文化知识体系、文化思维方式和文化体制的思维解构活动,也就是创建一种既适应现代化又具有地区特色的新型文化。^[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为青岛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前进方向。青岛市要建成“文化品位高雅、文化底蕴丰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的现代海洋文化名城”^[5],势必要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汲取有益成分,而乡村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是

[收稿日期] 2013-08-08

[基金项目] 山东省党校系统课题;青岛市双百调研工程(2013-B-36)

[作者简介] 潘娜娜(1983—),女,山西省晋城市人,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归宿和精神家园”^[6]。中国历史发展和现实告诉我们,任何理论的指导和经验的借鉴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农民人口比重很大,革命和建设都必须考虑这个实际,现代化建设也只有让农民真正受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若没有乡村文化的发展,没有城乡文化整合,所谓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是一句空话。

2. 城乡文化整合是医治现代城市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专题论述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要医治现代工业文明病和大城市病,而要医治城市病,无论是借鉴美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都离不开乡镇,前者突出城市功能的郊区化和卫星城镇的发展,后者强调城市与乡镇的均衡发展。城镇的文化性、便利性、创新性与城市的发展同等重要,规模与宜居同等重要。著名经济学家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指出:对“大”的追求使人类成为利润和机器的附庸,而小巧的工作单元、适中的资源取用,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可以说,城市的发展需要乡村文化的影响,人与自然统一的中国传统乡村的生存理念和消费方式,对于医治城市病有着独特的作用。当然,乡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发展的文化理念,如果乡村安于现状,裹足不前,满足于老祖宗留下的历史遗产和文化风味,不在现代性上下工夫,结果必然是日渐凋零。

3. 城乡文化整合是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必然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城乡关联发展在实践理念上常被解读为城市代替乡村的消灭乡村文明之路,这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误读。统筹城乡发展是城市与乡村相互影响,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接触融合过程中,既能认同或汲取对方文化,又能够保持自身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是城乡和谐发展的过程。然而,就当前城乡发展的现状而言,一方面,城乡的同质性和相似性越来越严重,表现在建筑风格相似、消费方式和娱乐方式雷同等方面;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还出现了一个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模糊地带,这使得同城差别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些都需

要城乡文化的整合,既要在城乡公共服务和居民身份认同方面推进一体化,又要在文化消费和娱乐方面推进特色化,以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因此,城乡文化整合是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必然途径。

二、青岛市城乡关联发展中文化整合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青岛市委、市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城乡互动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2006年)、《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实施意见》(2006年)和《关于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见》(2012年),就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文化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在这些意见的指导下,青岛市城乡文化整合的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2002年以来,市政府投资26亿多元兴建或改扩建了青岛大剧院、人民会堂、青岛音乐厅、市图书馆、市博物馆和市美术馆等一大批文化设施,并启动实施了“益民书屋3+2”工程规划(即建设面向农村农民的“农家书屋”、面向城镇居民的“社区书屋”、面向进城务工经商人员的“新市民书屋”3种书屋和组织适用图书编辑出版、推进全民阅读2项活动);2005—2008年,市财政累计投资4.6亿元,改扩建160处街道社区文化中心、449处街道社区图书室、84处镇综合文化站和3600个村文化活动室。2008年,青岛市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和基层服务点2707个。^[7]目前,青岛市共有47处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向社会开放,已建成“农家书屋”6040个,基本实现村村有文化活动室。^[8]然而,就文化整合力度而言,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乡村文化遭遇城市化的冲击。青岛城乡关联发展主要是通过中心城区的辐射来推动郊区和农村的城市化,而在实践上往往演变为城区规模不断扩展。在城区规模扩展的过程中,乡村文化遭到破坏。就乡村物态文化而言,古老的城墙、街道、古桥等被千篇一律的居民楼所代替;就乡村行为文化而言,传统的观念习俗和社会约定不断消解,新的文化习惯尚在磨合;就乡村精神文化而言,茂腔、柳腔等不少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后继无人,濒临消亡,一些民间庙会已演化为经贸交易会,一些闻名遐迩的民间文艺表演失去了原有的品位和魅力。乡村生活城市化本无可厚非,然而,城市文化以其强势地位不断向乡村社会扩张,乡村原有的价值理念和文化风俗遭到破坏,而优秀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完全为乡村所吸收,致使乡村文化出现了青黄

不接的现象。

二是原有的乡村认同模式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崩溃。随着“全域统筹、三城联动、轴带展开、生态间隔、组团发展”的大青岛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提出,青岛市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这一进程中,由于城区空间布局的调整和人们居住形态的变化,原有的乡村认同模式受到了冲击。就外界对乡村的认同而言,乡村不再被认为是人们衣锦还乡的归属地,不再是人们的精神寄托之地,而被认为是落后与贫穷的代名词。就乡村的自我认同而言,不论是城中村、城市边缘的乡村还是传统乡村,原有的组织形态、传统权威被不加辨别地否认,原有的价值体系逐渐崩溃,导致自我认同危机的出现,并且日趋严重。

三是城市化引发村民自我身份无从确立。在城乡关联发展过程中,青岛市始终面临着如何将乡村原先的传统势力与城市化的意图有效整合起来,以便把乡村纳入工业化体系的问题,而村民也始终面临着身份认同和角色适应的问题。对传统乡村的村民而言,尽管他们通过集中搬迁的方式成为了社区居民,但是随着生存空间的转换、生计模式的改变和规则意识的重建,他们感到焦虑和迷茫;对短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而言,由于熟人和血缘关系在其打工生涯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而他们更倾向于乡土社会的认同,可是乡土文化的沦陷让他们无从确立自我身份,因而常常觉得无所适从;对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农民而言,由于无法与市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对城市的认同难以建立,而长期生活在城市里又使得他们成为被村庄遗忘的人,这让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分析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

1. 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早在青岛被德国占领初期,德国殖民者按照“华欧分治”的政策将租借地划分为欧人区和华人区,前者为重点发展区域,几乎所有的投资与建设都集中在此,而中国商人和穷苦劳动人民居住的大鲍岛、小鲍岛、台东镇和台西镇等地,连基本的功能分区都没有,更谈不上基础设施建设了。换句话说,城乡发展失衡早就存在。到1930年代,市区成了模范都市,而乡间仍保留着中国传统农村的形式,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据统计,当时农民渔民的人均年收入为13元、支出为9元,而当时市区内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为8~15元。^[9]尽管沈鸿烈就任青岛市市长

(1931—1937)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缩小城乡差距的措施,然而由于他任职时间短暂,再加上1937年抗战爆发,城乡失衡的状态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的户籍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青岛一直采取以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资金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集中在中心城市,致使次中心城市及农村发展不足。近几年,青岛市虽然出台了向重点乡镇倾斜的宏观政策,促进了重点乡镇的快速发展,但实践中仍是中心城市发展最快,城乡差距持续拉大。

2. 公共文化服务失衡使得一些农村陷入文化贫困的境地

自2011年5月青岛市被文化部、财政部命名为“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以来,公共文化设施体系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然而从城乡关联发展的视角来看,公共文化服务失衡仍然存在,一是文化基础设施“城强村弱”,如市图书馆新馆、城市博物馆、市群众艺术馆、市美术馆、演艺大厦、市档案馆新馆都集中在青岛城区,规划建设的11个区市级市民文化中心项目大部分也都集中在城区。而6040个农家书屋相对于313.1万非农业人口而言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二是公共文化服务与需求错位,如2012年全市农村放映公益电影7万多场,实现了每个行政村平均每月至少放映1场电影的目标^[10],但是这些电影老片多,新片少;2012年青岛市歌舞剧院等9个专业艺术院团深入广大农村和社区为广大群众演出500多场次^[11],但是这些演出精致度不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这使得一些农村陷入文化贫困的境地,一些农民思想颓废,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

3. 在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中优秀传统文化缺位

青岛市在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中,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不是整体移入,而是选取融合多种文化的片段。多重的、分裂的、依赖于环境的认同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流行。^[12]由于青岛历史的特殊性,青岛既试图保持传统文化的纯粹性和自我特征,又在西方的影响下走向现代化,结果造成了现代与传统、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杂陈的特殊形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里,传统的民间文化在从原生态乡土社会向城市环境的迁移过程中,民俗节庆、信仰和道德观念等乡村文化中最稳固的优秀成分在城市文化建设中长期缺位,而外域文化尤其是西方的节庆、宗教信仰和消费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的文化模式。在这

种情况下,传统村民、进城务工人员 and 城中村居民逐渐失去他们对原有语言和文化习惯的执着,个人认同被支解。

三、青岛市城乡关联发展中文化整合的路径选择

1. 物质文化整合

物质文化整合要从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入手,合理利用城乡空间,使城乡各具特色、共享现代文明。青岛市需抓住建设文化强市的机遇,从破除形式主义入手,不仅要重质量,看投入了多少资金、修了多少图书馆和活动室,以及有线电视的普及率、网络普及率,图书馆的面积、藏书量、光盘量等,而且要抓质量和效率,加强监督和日常维护。在具体措施上,一是要建立新的绩效评价标准,将文化基础设施管理纳入评价体系,对管理质量每年评估一次或者几年评估一次。二是要明确责任,坚持“谁投资,谁负责”的原则,实行责任制和问责制,对于国家和集体投资的项目,由政府承担管护责任,负责后续投入资金;对于企业投资的项目,由企业 with 村民自治组织承担管护责任,负责后续投入资金;对于小型的基础设施,可以采取承包、租赁和转让等形式,明确管护责任。同时还要结合乡村山水风貌、乡村群落和建筑风格,因地制宜,在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对城镇的功能区进行合理规划,使城市和乡村成为充分体现城市意愿和乡村需求的一种共享空间。

2. 资源文化整合

资源文化整合,即利用好城市文化下乡、农村节庆文化、民俗文化和旅游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扩大农村文化消费,吸引城乡居民自觉参与文化整合。一方面,扩大农村文化消费,既要立足农村实际,创作适合农民观赏阅读、农民喜闻乐见且消费得起的文化产品,又要扶持农民成立文化企业或者文化剧团、文化艺术团、文化经纪人等文化服务团体,带动农村文化通过展演、调演、交流等方式多进城、常进城,在与城市文化交流、融合中进一步弘扬特色,凸现个性。另一方面,利用农村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遗产(传统的节庆习俗、民间艺术和民间独特的文化形态)和农业产业化观光园区吸引城市,如通过推出古镇游、生态游、农家乐等民俗旅游项目,戏曲、杂技、花灯、龙舟、舞狮舞龙等民间艺术项目,吸引城里人到乡村旅游和居住,扩大农村文化的影响力;通过搭建“招商引资”、“展示交易”和“成果转化”等服务管理平台,实施品牌战略、创

新营销模式,把以单个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剪纸、绘画、陶瓷、泥塑、雕刻、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转变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家庭企业共同运转经营的产业发展模式,真正实现城乡文化的互动交融和共建共享。

3. 制度文化整合

如果没有制度文化整合,城乡文化整合就是一句空话。制度文化整合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只不过是一种人口登记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赋予了过多的含义。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把户籍与社会待遇脱钩,逐步降低人口迁移的门槛,使得农村的农民、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城市的农民工以及其他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青岛市在《十二五社会管理体系改革与发展规划中》提出逐步减少户口迁移限制,逐步放宽七区落户政策,全面放开县域内户口迁移,放宽农民工在五市和城镇落户条件,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权益,引导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有序转移,这为青岛市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二是增加农村教育投入。通过建立城乡学校帮扶制度,建立市域内、城乡间校长与教师的合理流动制度和全市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交流与合作等制度,提高义务教育公平满意度;通过改变教育结构、发展多元化教育、增加现代职业技能教育和完善农村成人教育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4. 精神文化整合

精神文化整合是城乡关联发展的关键环节。一方面,通过举办专门针对农民的培训班和跨文化交流等活动,帮助农民理解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增强他们文化整合的意识;立足农村,设立农村文化博物馆,积极培养农民文艺骨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充分发挥民间艺人和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保持农村文化的特性。另一方面,发挥广播、影视剧、出版社和互联网等传播媒体的作用,帮助城市市民了解并理解乡村文化,通过政策引导、文化交流和学校教育,促使城市文化吸收乡村重精神、重礼仪、重道德、崇自然的精神,以弥补城市人际关系淡漠、功利倾向明显的缺陷。

总之,近年来,青岛市城乡文化整合的进程不断加快。然而,城乡文化和谐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分化——重组——整合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需要二者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资源文化和精神文

化等方面的整合,在突出双方优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符合区域发展又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精神,既注重文化整体性、又兼顾城乡文化差异性和可持续性,使市民、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其他流动人口的思想价值观念趋势于一致,在精神塑造和素质能力的培养等方面得到整合,在民俗民风、生活习惯和传统工艺等方面各有特色,最终形成二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参 考 文 献]

- [1] 曾菊新,祝影.论城乡关联发展与文化整合[J].人文地理,2002(4):6.
- [2] 兰勇,陈忠洋.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文化整合[J].人文地理,2006(6):45.
- [3] 祝影,包惠.论城乡网络化发展与文化整合——城市化的后现代视点[J].经济问题探索,2005(12):21.
- [4] 任成金,潘娜娜.城乡文化整合的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J].深圳大学学报,2013(4):120.
- [5] 青岛新闻网.青岛打造现代海洋文化名城[EB/OL].(2012-02-14)[2013-07-21].http://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12-02/14/content_9114623.htm.

- [6] 张孝德.不能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J].行政管理改革,2012(9):11.
- [7] 青岛市人大常委会.60年青岛文化繁花似锦[EB/OL].(2009-10-12)[2013-07-21].<http://rdcwh.qingdao.gov.cn/n8146584/n8356839/10312137.html>.
- [8] 青宣网.青岛市落实“文化惠民、服务群众”12件实事情况[EB/OL].(2013-01-14)[2013-07-21].http://www.qdxc.gov.cn/content/2013-01/14/content_9572077.htm.
- [9] 屠绍祯.青岛的合作[J].青岛工商季刊,1934(2):2.
- [10] 和讯网.没有围墙的剧场欢动青岛[EB/OL].(2013-09-04)[2013-09-06].<http://news.hexun.com/2013-09-04/157710110.htm>.
- [11] 新华网.山东省青岛市: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升级版[EB/OL].(2013-07-23)[2013-07-28].http://www.sd.xinhuanet.com/whsdw/2013-07/23/c_116647018.htm.
- [12] 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03.

(上接第24页)

事分开,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四是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6. 营造好一种良性氛围:鼓励全员参与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事业,需要激发全民的创造活力和参与热情。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形成文化建设强大合力;另一方面为社会团体、民间力量和广大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创造者提供广阔舞台,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和参与热情得到充分发挥和释放。

[参 考 文 献]

-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人民网.十七届六中全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EB/OL].(2011-10-18)[2013-08-07].<http://www.people.com.cn/h/2011/1018/c25408-1-27309-81261.html>.
- [3] 李志,李建玲,金莹.国外文化强国评估指标的研究现状及启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01.
- [4] 中国新闻网.冯骥才:“文化强国”是高素质、文明的社会[EB/OL].(2012-03-08)[2013-08-07].<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03-08/3728741.shtml>.
- [5] [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4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5-0030-05

当代黄梅戏演出市场的现状与前景

——以安庆市为例

李怡洁

(中国传媒大学 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 北京 100024)

[摘要]近几年来,作为我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整个黄梅戏演出市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黄梅戏演出市场体系完善,演出形式多样,传播渠道多元化。其发展虽然迅速,却依旧弱小,同时还面临着重重困境:创作人才匮乏,专业团队有待整合;优秀剧目不足,时代新剧有待挖掘;演出票价过高,行业法规有待健全;资金投入不够,政府支持有待加大;产业发展滞后,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为了更好地促进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需加强人才培养,促进黄梅戏队伍完善化;建立剧目机制,促进黄梅戏作品优质化;加大资金投入,促进黄梅戏发展科学化;增加市场竞争力,促进黄梅戏发展产业化。

[关键词] 黄梅戏;演出市场;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 J82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5

黄梅戏起源于唐初,它是在皖、鄂、赣三省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地区和湖北省黄梅地区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戏,其确切发源地尚未有统一说法,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剧种形式产生、成长并兴盛于安徽省安庆地区。黄梅戏属于板式变化体,有花腔、彩腔、主调三大腔系,其唱腔与念白均采用安庆方言,通俗易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黄梅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至今日,黄梅戏已经走过1400年的历程,已从早期自唱自乐的民间歌曲形式发展成为独立的全国性剧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最近20多年,黄梅戏借着高新技术的投入使用、传播媒介的巨大变革以及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的大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是剧目剧本、演员素质,还是演出环境、宣传方式较以前都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革紧扣当今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主题,一方面给其带来机遇,促进了黄梅戏及其演出市场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也给黄梅戏的发展带来挑战,其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目前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于黄梅戏

本体及相关剧目的探究上,对于黄梅戏当下的演出市场及其前景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因此,如何在当今这个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行发展的信息爆炸时代找出一条适合诸如黄梅戏这样传统艺术演出市场发展的可行之路,已成为当前研究重点。本文拟立足于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对黄梅戏自身及其在当前市场形势的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分析,找出一条黄梅戏演出市场未来发展的可行之路。

一、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现状

1. 演出市场体系渐趋完善化

据1981年上半年统计,全国(除台湾省)县以上黄梅戏剧团共有50个,计:安徽省36个,江西省5个,湖北省3个,江苏省4个,福建省1个,浙江省1个。^[1]这是发表于1982年《黄梅戏艺术》上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据。时过境迁,如今安庆市拥有的黄梅戏正规剧团数量虽然减少了,但与之相关的艺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黄梅戏演出市场体系逐步健全完善(见表1)。

[收稿日期] 2013-08-06

[作者简介] 李怡洁(1990—),女,安徽省安庆市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传媒音乐。

虽然专业剧团数量减少,但研究所、博物馆、戏剧创作室的建立使得整个黄梅戏演出市场呈现繁荣景象。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安庆市市直3个黄梅戏剧团每年完成的演出场次都在80场以上,如果算上小型的招待演出,应在100场左右,演出收入在30万元以上。^[2]收入虽然不能算多,但对于相对冷落的戏曲市场来说也算不错了,不过仍然有很大上升空间。在演出市场体系化逐渐建立的同时,安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黄梅戏艺术的产业化发展,于1992年创办首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并从2003年第三届起定为每3年一届,至2012年已成功举办6届艺术节。与艺术节相关的摄影、音像制品、旅游等行业以黄梅戏为依托,获得了长足发展。就整体发展态势来看,黄梅戏演出市场日益规范化、体系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表1 黄梅戏发展今昔对比

| 对比项 | 1981年 | 2013年 |
|-----------------|---------------------------------|--|
| 黄梅戏剧团 |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 |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 |
| |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二团 |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二团 |
| | 百花黄梅戏剧团 |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三团 |
| | 安庆地区黄梅戏一团 |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 |
| | 安庆地区黄梅戏二团 | 望江县黄梅戏剧团 |
| |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 | 潜山县黄梅戏剧团 |
| | 望江县黄梅戏剧团 | 宿松县黄梅戏剧团 |
| | 潜山县黄梅戏剧团 | 太湖县黄梅戏剧团 |
| | 宿松县黄梅戏剧团 | 岳西县黄梅戏剧团 |
| | 太湖县黄梅戏剧团 | 桐城县黄梅戏剧团 |
| | 岳西县黄梅戏剧团 | 枞阳县黄梅戏剧团 |
| | 桐城县黄梅戏剧团 | (注:东至与贵池两县现已划入池州市管辖范围,安庆地区黄梅戏一、二团与安庆市贵池县黄梅戏剧团) |
| | 枞阳县黄梅戏剧团 | |
| 东至县黄梅戏剧团 | | |
| 贵池县黄梅戏剧团 | | |
| 相关艺术机构 | 安徽黄梅戏学校(1958年) | |
| | 安徽黄梅戏技术职业学院(前身是安徽黄梅戏学校,2011年更名) | |
| | 安庆大学黄梅戏艺术学院 | |
| | 安徽中国黄梅戏博物馆(1个) | |
| | 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1个) | |
| |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1个) | |
| 安庆市黄梅戏戏剧创作室(1个) | | |
| 发行刊物 | 《黄梅戏艺术》 | 《黄梅戏艺术》 |

注:1981年的相关信息根据文献[1]归纳,2013年的相关信息根据安庆新闻网2013年5月6日发表的文章《安庆非遗知多少》归纳整理。

2. 演出形式呈现多样化

近年来,黄梅戏演出形式在保留一贯的传统方

式的同时,合理利用高新科技手段,积极顺应大众审美趣味,做了多种大胆尝试和创新。一方面,坚持剧场演出与民间演出并存的传统形式。在城市,除了黄梅戏艺术剧院、黄梅戏会馆的每周定点演出以外,在市民广场及人流如潮的街头,都会有市民忘情地欣赏黄梅戏表演,在迎江寺、茶社、书社等场所也会不定期举行黄梅戏演出。如果赶上黄梅戏艺术节,黄梅戏的热闹气氛就会更加浓重,整个城市张灯结彩,大街小巷都在哼唱黄梅戏。在农村,主要以广场式演出为主。农历上半年的正月初四到五月,下半年的十一月到腊月二十是演出的旺季。每天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有的时候甚至一天3场,上午、下午、晚上都演。^[3]这里的演出有的是出于响应政府送戏下乡活动、宣传政府政策的演出,而更多的是民间自发的请戏,请戏的事由之中以节庆和纯粹的娱乐活动为主。另一方面,除了传统的演出形式,剧院还根据新时期高科技的发展以及观众审美的变化,创造性地将绚丽的灯光、灵活的舞美、逼真的实景,甚至最新的3D科技,加入到黄梅戏演出之中。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和澳门杨氏设计网络动画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出品的3D全息黄梅戏舞台剧《牛郎织女》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观众戴上专用的3D眼镜,眼前的一切不禁令人叹为观止:衣袂飘飘的牛郎、织女踏云而至,苍山、白云、瑶池、南天门仿佛触手可及,令人顿生如在画中之感。^[4]诸如这般将3D技术运用于戏曲舞台尚属首例,它在安庆石化剧院的上演不仅座无虚席,掌声连连,更赢得了众多80后、90后,甚至00后新生代观众的追捧,是黄梅戏艺术走向市场的一次极具积极意义的尝试。同时,安庆市还将旅游业与黄梅戏演出相结合,潜山县的黄梅阁就是这样一个产物。潜山县拥有国家5A级景区天柱山风景区,同时又是《孔雀东南飞》的发生地、七仙女的故乡,众多的文化资源为黄梅阁的诞生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这座仿古式楼阁建筑在3年间演出黄梅戏800多场,成为天柱山下的一道靓丽风景。如此多样的演出形式拓展了黄梅戏的受众群,为其演出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3. 传播渠道更为多元化

随着媒介的革新,黄梅戏的传播渠道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早期的人际传播逐渐过渡到有规模有组织的大众传播,尤其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黄

黄梅戏的传播渠道更加多元。近几年,为将安庆市打造成文化强市,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在保留传统宣传方式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构建信息网络平台,不仅为每一个黄梅戏剧团建立了官方网站,公布演出安排及剧目信息,同时链接到全国各省黄梅戏剧院官网、黄梅戏名角微博、贴吧,方便广大受众及时了解黄梅戏演出的相关信息。除了继续与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推出黄梅戏宣传节目以外,部分黄梅戏剧团还开设了自己的微信(如潜山黄梅戏剧团)、微博公共平台(如黄梅戏艺术节开通了新浪官方微博)和人人网公共主页。这些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尤其在三网融合的大趋势下,这些全新传播渠道的应用,让观众能随时随地了解黄梅戏演出及演员的最新资讯,让观众足不出户即可欣赏到一整场大型黄梅戏演出,开启了黄梅戏演出市场的新局面。

二、黄梅戏演出市场面临的困境

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虽然呈良好的上升趋势,但整体还比较弱小,所面临的困境不可小觑。

1. 创作人才匮乏,专业团队有待整合

从自身因素来看,创作人才的匮乏是制约黄梅戏演出市场发展的首要因素。一方面受事业单位编制的限制,很多优秀人才无法引进;另一方面又由于待遇不高,很多优秀人才流失。在市区,目前演员的平均年龄仍在30多岁,乐队人员的平均年龄则在40多岁,舞美、后期制作、导演等人才都很稀缺,剧团每排一个戏,要么是请退休人员,要么是出高酬外请^[2]。而在农村,情况就更严重了。民间剧团的演员大部分是艺术表演爱好者或者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很难适应市场需求。据不完全统计,在安庆市100多家民间剧团的1000多人的从业人员中,受过专业训练或从事过这项职业的不到5%,演出水平低,流动性大,无法整合成黄梅戏的普及队伍。^[2]面对这种情况,安庆市委、市政府也做出了努力,不仅扩大了安徽黄梅戏技术职业学院的招生,更在安庆大学开设了黄梅戏艺术学院,但从毕业生的就业来看,依旧是困难重重。安庆大学黄梅戏艺术学院从2007年起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如今2007、2008两届学生已经毕业,改行的多、坚持唱黄梅戏的少,2008届14个毕业生中只有2人仍从事黄梅戏表演,一个去了再芬剧院,一个去

了安庆黄梅戏艺术剧院^[5],其他人均转行另谋他业。如此境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没有专业的创作人员,没有整体的创作团队,黄梅戏剧团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前景更加令人堪忧。

2. 优秀剧目不足,时代新剧有待挖掘

制约黄梅戏演出市场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紧跟时代步伐的优秀剧目不足。好的剧目是一个剧种发展的根基,黄梅戏的经典剧目无外乎《天仙配》《女驸马》《打猪草》等,但这些剧目反映的是农耕时代的生活,符合1950年代的审美需求,如今已经很难满足观众的要求了。而且,同一剧目反复演出还会使得原本兴致盎然的观众产生厌烦心理,更别提花钱进剧院看了。事实上,最近几年也创作了不少的新剧本,如《徽州女人》《六尺巷》《徐锡麟》等,虽然也取得了不错的演出效果,但都达不到《天仙配》《女驸马》那样的高水平,并未形成黄梅戏的品牌效应。除剧目陈旧之外,就剧本数量来看,与黄梅戏市场的需求也存在着一定差距。目前,安庆市直剧团正常上演的剧目大戏在10本左右,小戏在20本左右,县级剧团除望江县有40多本大小戏,其他剧团比市级剧团情况更糟。而据资深经纪人介绍,一个剧团想要真正满足市场需求,至少需要有50本(大戏在30本,小戏在20本)左右^[2]。以这个为标准,目前安庆市的黄梅戏剧团还相差甚远。显然,黄梅戏演出市场还面临着巨大挑战,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大众审美的时代新剧亟待挖掘创作。

3. 演出票价过高,行业法规有待健全

从客观因素来看,票价过高、行业无规无疑是制约黄梅戏演出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演出业法规很不健全,只有国务院颁布的《营业性演出条例》和文化部颁布的《营业性演出条例实施办法》《涉外文化艺术表演及展览管理规定》等几部演出业法规。安庆市虽于2009年依据《营业性演出条例》拟定发布了《安庆市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取代2005年发布的《实施细则》),但并未对不同剧场的具体票价做出统一规定,致使票价完全由出票方或剧场自行决定,加之人情社会关系复杂,赠票现象严重,使得演出方为挣得利润不得不把赠票的损失转嫁到购票观众头上,从而抬高了售卖门票的价格。就安庆市黄梅戏会馆来说,一般的折子戏专场一晚上演出的票价是每位38元,但有的大

戏则要一百多元一张票。虽然这一百多元跟北京、上海等地的三四百元门票相比不算贵,但与本地普通百姓的收入相比,确实是有些偏高的。同时,安庆市出台的《实施细则》里也没有对观众的权利与义务进行详细说明,使得观众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由于舞台演出是一种艺术欣赏,其演出质量的好坏很难衡量,观众只要买票入场就等于完成了消费行为,如果整场演出以次充好,那也只能自认倒霉,很难因为演出质量的问题而退票或者得到相应补偿。因此,门票价格亟待规范,行业法规急需完善。演出市场要想得到长远发展,行业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步伐,如果总是拖着后腿,演出市场要想展翅高飞是不可能的。

4. 资金投入不够,政府支持有待加大

一般三线城市,对文化的投入肯定不如对经济建设的投入,而在安庆众多文化产业中,对于黄梅戏市场的投入就更小了。安庆市几个黄梅戏专业剧团2007年改革前二级演员的财政拨付工资每月只有800元^[6],改革后薪资虽然翻了一番,但每月1600元的薪资水平较其他行业工作人员相差甚远。虽然安庆市每年用于黄梅戏的财政支出在2000万元以上,但其中大部分是人头费,事业费只是象征性的。省财政对黄梅戏的支持主要表现为对省直剧团的支持,而作为中国黄梅戏发展基地的安庆市基本未列上^[6]。正是由于政府每年拨给剧团的演出经费严重不足,加上行业法规不完善,才会出现安庆市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即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三团)在合肥安家不到一年又撤回安庆的尴尬局面。2010年10月1日,再芬黄梅艺术剧院进驻省会合肥,并把合肥大剧院一楼的多功能厅租了下来作为演出场地。厅内共有360个座位,租金为每天9000元,如果每场演出上座率很高,剧院也可以很好地经营下去。但是,由于票价过高(30元到280元不等),每天观众只有100多人,而剧院每天还有四五十人的演职人员需要开销,成本很高,因此只坚持了近一年,就撤出了合肥。黄梅戏演出市场本身就不如流行音乐市场受欢迎,如果政府部门再不加大资金投入,给予政策支持,将难以继续发展。

5. 产业发展滞后,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

虽然黄梅戏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它的演出市场依然十分冷淡,至今尚未形成一条完整的、系统的产业链。一方面,现在的剧团虽然

初具规模,但大多处于被动状态,并没有去主动探索市场、开发市场,在市场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另一方面,虽然有黄梅戏创作人员,但仅靠创作是远远不够的。要把黄梅戏打出去,“产”和“销”必须做到融合,而这方面还十分欠缺,缺少一批既懂黄梅戏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的黄梅戏工作者,要么是在黄梅戏方面很有造诣,但是对市场、经济学、管理学丝毫不通的戏曲专业人才;要么是在市场营销方面很有经验但对戏曲行业不甚精通的经济型人才。如何将两者合二为一,真正培养出能把黄梅戏演出市场拓展开来的人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黄梅戏市场产业链的建立,除了需其自身的多方面努力之外,如何在众多行业中找到能够配合黄梅戏市场且能促进其发展的相关产业,也是当务之急。安庆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虽然黄梅阁的建立、潜山黄梅村的构建,已经体现出政府决定将黄梅戏演出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的战略,但就目前来看,黄梅戏市场与旅游业还并未找到很好的结合方式和运行机制。黄梅戏产业在旅游业中开发的空間还很大,诸如《印象·刘三姐》《大宋·东京梦华》这样成功的实景演出范例,也可以运用于黄梅戏之中,相信黄梅戏以其自身不同于他者的戏曲特色,定会为这种山水实景表演增添一丝神奇梦幻气息,也会对黄梅戏演出产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三、未来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策略

1. 加强人才培养,促进黄梅戏队伍完善化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黄梅戏演出市场中同样如此。加强人才的培养,是未来黄梅戏市场得以发展壮大关键因素。这里的人才一方面指的是黄梅戏方面的专业人才,是热爱黄梅戏、学习黄梅戏并有意致力于黄梅戏表演的科班人员,尤其是青年后备军。可以用丰厚的师资力量吸引优秀的生源,以加强黄梅戏学校教育,为学生提供完善的教学服务,同时加大对黄梅戏专业学生的就业扶持政策,做到学校教育与剧团培养相结合,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为已经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平台,促进他们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在演出市场中完善自身。另一方面,还需要大力培

养精通黄梅戏与市场营销的复合型经理人,即黄梅戏职业经理人。通过他们的市场运作和营销,结合黄梅戏自身的特点,找出黄梅戏适合市场发展的特点,帮助黄梅戏大胆地、科学地与市场接轨,与受众接轨。一旦各大黄梅戏剧团拥有自己的复合型经理人才,就等于在剧目创作与市场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这样不仅能大大减少黄梅戏进军市场的盲目性,同时也能大大节省黄梅戏市场运作的成本,为其更好的市场化发展奠定基础。

2. 建立剧目机制,促进黄梅戏作品优质化

虽然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兴盛不能只靠剧目的创新,但优秀剧目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演出市场成败的基础条件。有了好的剧目,才有推广到市场上的可能,也才有在市场中受到大众认可的可能。因此,剧目机制的建立十分必要。然而要建立良好的剧目机制,首先就要做好市场调研,摸清观众需要什么、喜爱什么,在顺应观众审美中积极创作剧目,在剧目演出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艺术创新,推出精品佳作,以优质作品拉动黄梅戏市场的大发展。其次,还需要建立起庞大的剧目库,使黄梅戏摆脱当下“老戏老演、老演老戏”的局面。近几年,安庆市大力进行黄梅戏剧目创新,创作排演了《为奴隶的母亲》《六尺巷》《红楼探春》《徐锡麟》《江淮儿男》等大戏,及《告洞房》《过关》《借丈夫》《打纸牌》等小戏。第六届黄梅戏艺术节期间,又相继推出了《半个月亮》《寸草心》《珍珠汤》《榴花不开盼哥回》等21台全新剧目,均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尽管这些剧目较为优秀,但都未达到如《天仙配》般经典的程度。因此,在优秀剧目的创作道路上,仍需继续努力,不断前行,创作出真正适合新时代发展的经典佳作。

3. 加大资金投入,促进黄梅戏发展科学化

充足的资金是黄梅戏演出市场发展的外部保障。唯有资金充足,黄梅戏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专注于自身革新与发展。因此,黄梅戏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金投入,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配合。可以借鉴浙江越剧建设发展的有益经验,省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建,同时吸收社会资金投入,维护演剧活动的正常运转。^[7]另一方面,设立形式灵活、应用广泛的专项基金库也是维护黄梅戏市场稳健发展的有效途径,不管是国有剧团还是民间剧团,只要有好的剧目,都可以从这个基金库里申请经

费支持,而这笔基金的来源并不仅仅依靠国家每年的财政拨款,更多地要仰仗社会力量的支持,尤其可以效仿国外的“艺术赞助人”制度,吸引大中型企业的资金注入。当然,这笔基金必须保证专款专用,切不可挪为他用,惟其如此才能发挥好基金的最大效能,为黄梅戏演出市场的发展打好经济基础。

4. 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黄梅戏行业规范化

就目前情势来看,我国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比较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但具体到演出业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就安庆市来说,切实可行的演出条例仅仅只有《安庆市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其中大多还是对演出主体、具体演出情况、演出证进行规范和管理,并未有涉及观众权益、票价及场地费等相关规定。文艺演出是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方式,只有得到观众的认可才有可能继续发展下去。因此,只有高度关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其提供优秀高质的文化产品,让观众看着放心、听着舒心,黄梅戏才真正演有所值。在关注观众权益的同时,还应重视黄梅戏演出行业的全面规范化,注重全行业的法制建设,加强演出业立法,保证其有法可依;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使广大演出从业者做到有法必依;提高演出业相关司法机关的执法水平,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有加强全行业的法制建设,使黄梅戏演出行业规范化、科学化,才能确保黄梅戏的长久发展。

5. 增加市场竞争力,促进黄梅戏发展产业化

双拳难敌四腿,单兵独将即使再强大也敌不过一条产业链的整体发展,黄梅戏演出市场的产业化发展是未来黄梅戏演出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打造好黄梅戏品牌,建设“文化安庆、黄梅安庆、旅游安庆”是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为此,构建创作、宣传、演出、反馈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扩大黄梅戏的社会影响力,强化黄梅戏的品牌发展应是当务之急。就目前来看,应当首先加强黄梅戏自身建设,除了继续支持国有剧团发展之外,还应有计划地扶持民间黄梅戏团体的发展,改变过去上下脱节、相互分割、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其次,还应认识到黄梅戏产业的发展必须跳出过去自我封闭、自求发展的思维,必须推动艺术与经济的联合,借势借台发展自己^[6]。

(下转第39页)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5-0035-05

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周良发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 安徽 淮南 232007)

[摘要]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关键词] 儒学复兴;现代新儒学;大陆新儒学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6

现代新儒学即将落幕之际,大陆新儒学悄然兴起,成为学界关注和探讨的热门话题。本文中的所谓大陆新儒学,是指现代新儒学式微之后,大陆地区兴起的新的儒学体系重构思潮。与现代新儒学不同,大陆新儒学没有统一的致思路向,有的汲汲于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的热衷于现实的政治进路,有的致力于儒学的生活化,有的尝试于儒学的宗教进路,其代表人物有蒋庆、黄玉顺、陈明、张祥龙等。虽然大陆新儒学没有统一的理论宣言,但它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儒学思想的再度复兴。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主张儒学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1](P39)};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构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2](P55)};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才是儒学发展的现实路径^[3]。纵观大陆新儒学研究之现状,学界对此领域尚未展开系统的学理疏解。鉴于此,本文拟对上述几种理论体系进行初步分析,以管窥大陆新儒学的内在特质和基本风貌。

一、儒学的消沉与落寞

对于中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喧

哗与骚动、震荡与激变、启蒙与救亡并存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蓬勃涌现,围绕“中国走向何处”“中国的现代性”等问题展开激烈的探讨与争鸣。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的命运与未来前景自然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议题。

首先是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儒学解体的原因,余英时认为首先是“硬件”方面已体之不存,即持续2000多年的帝王制度的崩溃,使其丧失栖身之所^[4]。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即从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种跃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其间虽因佛教、道教的冲击与挤压而曾经遭到过冷遇,但始终未能动摇其主体地位。然清末民初政权更迭,帝制王朝的分崩析使儒学失去制度层面的支撑,儒学日见式微,走向衰落。帝制崩溃与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亦使儒学失去长足发展的内源动力。科举取士是为统治阶级网罗人才,考试内容以儒家学说为根本,通过科举出仕的士大夫对传统儒学的研读和发挥,无疑为儒学的持续发展输送了绵延不绝的新鲜血液。1905年,清廷取缔科举转而采取新的教育和考试制度,显然切断了儒学与读书人之间的直接关

[收稿日期] 2013-08-15

[作者简介] 周良发(1979—),男,安徽省六安市人,安徽理工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

联。需要指出的是,儒学解体之后并未因现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而获得些许生存空间,反而在经历20世纪数次激烈反传统浪潮之后,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清算和荡涤,曾经显赫数千年之久、作为独立文化形态的儒学,其时“似乎成为一堆万劫不复的死灰”^[5]。

其次是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五四新文化派对儒家传统的无情批判,激起了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度思考。1921年梁漱溟推出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是这种思考的理论成果,它基于现代社会对儒家传统的重新诠释,拉开了现代新儒学的序幕。尽管现代新儒家认同民主与科学,但与新文化派迥异的是,他们认为传统儒学早已蕴含科学、民主的因子,并不需要从西方引进,即“内圣”可以开出新的“外王”事业。为此,他们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放眼世界和未来,通过消融西方文化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力图寻找到儒家思想新的慧命。现代新儒家四代学人不仅“坐而论道”,还“立而行道”,但在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始终没有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改变“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现实窘境,而且当时一流学者很少关注儒学。1995年,牟宗三的遽然离世,标志着现代新儒学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走完了这个现代新儒学的圆圈全程”。李泽厚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恐怕难得再有后来者能在这块基地上开拓出多少真正哲学的新东西来了。这个圆圈是无可怀疑地终结了。”^[6]时光流转,梁漱溟曾以几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精辟解答,也早已被人遗忘了。这并不是因为梁漱溟的观点不够深刻,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在很短时间内仅凭学理探讨就能解决的。面对新的时代,现代新儒家的孤寂与落寞并非偶然,而是古老的儒学应对乏术,无法搭建一条沟通传统儒学与现代民主的桥梁。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已有百年之久,唯其独尊的时代早已远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富,民主政治也成为当今主流的政治安排,但随之人们又患上了现代性焦虑症。于是,挣扎于现实的人们将目光投向儒家文化,这又为大陆新儒学的勃兴提供了时代机缘。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几成儒学展开的基本向度,于是大陆再现儒学复兴的迹象。

二、大陆新儒学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新儒家纷纷移居港台及海

外,留在大陆的老辈学人也基本上停止了儒学研究,转而关注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文化研究热潮的勃兴,儒学传统及其现代命运才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和民族自信力的提升,大陆儒学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新的儒学体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里以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人文儒学为例加以解析,以探究其底蕴。

1. 政治儒学

政治儒学的产生与现代新儒学的致思路向密切相关。蒋庆认为,现代新儒学所以没有产生太大的社会影响,乃是源于其自身的理论偏误,可将其归纳概括为个人化倾向、形上化倾向、内在化倾向、超越化倾向。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只深掘儒学的心性和生命面向(蒋庆称之为“心性儒学”),而忽视了它的政治面向(即“政治儒学”)。基于对新儒家的这种认识,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当代儒学的发展应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1](P11)}在他看来,政治儒学可以弥补心性儒学现实层面之不足。它关注社会现实、重视政治实践,这无疑彰显了儒学的政治理想。由于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政治儒学从一问世即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引起学界热议。

那么,政治儒学到底有何独特之处?换句话说,其内在特质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析。在理论阐释上,蒋庆从历史深处入手寻找原始依据。在他看来,政治儒学源于儒家之经学,其源头可追溯至周礼与春秋。在先秦,能将周礼与春秋之微言大义发扬出来的,唯有春秋公羊学,“故儒家的政治儒学主要指春秋公羊学”。它源于孔子、兴于公羊、成于荀子、光大于两汉(董仲舒)、复兴于清末(康有为)。这条一脉相承、有别于心性儒学的儒学传统,即是儒学的政治面向^{[1](P28)}。有识于此,他认为政治儒学不屑于形上体系的建构,而扎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认为道不在抽象概念的推演中,而在具体的政治现实中^{[1](P42)}。所以,蒋庆试图改变现代新儒家以个体生命为关怀对象、以道德理性为理论依据的致思路向,转而以社会政治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理性为理论依据,并致力于政治实践的具体落实。

实践上,蒋庆结合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提出“三重合法性”构想,并将其发展为“议会三院制”。首先,蒋庆借鉴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对《中庸》“王天下有三重”进行创造性转化,提出“三重合法性”的构想。具体来说,他把《中庸》“王天下”之

“三重”的“议礼”、“制度”和“考文”，改造成“天道”、“历史”与“民意”三项，以分别对应“天”、“地”、“人”这三重维度，这是其政治儒学的核心理念。如果蒋庆对传统政治哲学的发挥仅至于此，那么“三重合法性”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此论所以引起众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强烈驳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它对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解和融摄，进而以“议会三院制”实践其政治维度。所谓“三院”，即庶民院、国体院和通儒院，其制度设计为：庶民院代表公众民意，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通儒院代表儒教价值。凭借“三院制”，蒋庆构建的“天道”、“历史”、“民意”之“三重合法性”便辐射到政治生活中。这种路径设计充分显示出其强烈的政治诉求。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蒋庆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实践“议会三院制”的目标就是儒学国教化^[7]。而儒学国教化正是民国初年康有为等人所倡，目的在于重构国民的儒学信仰，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剖析，可以感知政治儒学浓烈的政治化倾向。尽管康有为等人的儒学国教化没有成功，政治儒学也难免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但都没有动摇政治儒学的立场。

2. 生活儒学

关于生活儒学，学界现有两种不同提法：一是大陆学者黄玉顺的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二是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日常生活化的儒学。前者热衷于儒学体系的构建，后者致力于儒学的大众化。因本文主要探讨大陆新儒学，故后者略去不谈。关于生活儒学的体系建构，黄玉顺本人曾多次撰文，就其概念内涵和构建思路展开论述。

一是概念内涵。何谓“生活儒学”？黄玉顺没有直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先对“生活”和“儒学”加以界定。先说“儒学”。提及儒学，大家肯定会想起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之类的话语，但到底“什么是儒学”？即便儒学界给出的回答也不尽相同。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似乎与儒家传统隔膜甚深。黄玉顺认为有必要回到原始儒家，涤荡其理论构架，夯实其理论根基，重构新的儒学体系^[8]。再说“生活”。这是“生活儒学”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地方，因为一谈起“生活”，人们必定想到现实生活，自然也就把生活儒学理解成将儒学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了消除误解，黄玉顺指出，生活儒学之“生活”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人在轴心时代之前关于“生活”的观念；二是海德格尔

存在论哲学对“存在”的阐述。海德格尔厘清了“生存”与“存在”的关系，认为人的生存只能是此在^[9]。倘若我们将这个“此在”去掉，回到“此在”之前，那么“生存”等同于“存在”，也就叫“生活”（life）。基于这种认识，黄玉顺指出：生活儒学就是以生活为本源，面向生活的儒学。^{[1] (P55)}

二是构建思路。回顾20世纪的儒学发展，黄玉顺认为它始终没有超越“西学东渐”的理论预设，当代儒学体系的构建应当避免这种倾向，创设具有当代思想视域的新儒学。为此，他从3个层面构建理论体系：其一，回归生活本源。黄玉顺承认，生活儒学受到海德格尔的启示，但绝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为了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区别开来，黄玉顺以“生活”指称“存在”或“生存”。在他看来，作为当下的存在，其实就是生活，并对“生活”作了如下界定：“生活”不是任何对象的存在，它只是存在本身；而具体的生活方式，则只是“存在的生活”的一种显现方式。在他看来，构建新的儒学体系，只有回归生活本源，才能阐释其形上与形下的可能性。其二，重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显然无法回避形而上学。但问题是怎样重建？黄玉顺坦言应秉持中道立场，既拒绝现代新儒家的纯粹哲学思辨，又拒绝大陆新儒家的原教旨主义。他认为形而上学者的源头在于人们当下生活中的生活感悟。在形上体系的创设上，他把重建主体性和范畴表放在首要位置，并将后者视为形上与形下的过渡环节。其三重建形而下学。学界关于形上与形下的划分，一般常用佛教术语“此岸”与“彼岸”加以区别。由于具有强烈的人世倾向，儒家自古以来注重此岸，具体表现在制度伦理和正义理论上。黄玉顺指出，儒家正义伦理具有两个原则：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在他看来，通过提炼正义伦理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当代儒学构建回归生活的诉求：如果说正义性所挺立的制度规范的生活情感是生活存在的原初显现，适宜性所奠定的制度伦理的生活方式是生活存在的再度显现，那么可以说这两者均来自生活，且归于生活。^[8]

综观上述，生活儒学打破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形而下学”模式，构建“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形而上学→重建形而下学”的框架，不仅夯实了儒学本体形态的理论根基，还为当代儒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向度。

3. 人文儒学

在儒学体系的构建上，人文儒学既没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也没有透过西学阐释儒家传统。通过对

儒家思想正本清源的历史钩沉,李承贵发现人文主义才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并将人文儒学确立为儒家思想的本体形态。

人文儒学何以成为儒家的本体形态?李承贵提供了五点理论支撑。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其一,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儒学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其内在特质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内涵虽有争议,然其核心义理大体相同,即肯定人的主体性,高扬人的价值及意义,追求个性解放,崇尚人格尊严。孔子提出“仁”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肯定了人的价值及人生意义。这样的例子普遍存在于儒家典籍中,说明人文主义无疑是儒家思想基本内容。

其二,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生长之源。这里的“生长之源”是说,人文主义是儒学生成与发展的源头或种子。首先,“仁”是儒家思想生长的源头。在儒学体系的众多核心概念中,“仁”最具生命力也最具创造力,儒学的历次更替与创新,无不从重新释“仁”开始。其次,儒学的丰富和发展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在儒学发展史上,无论是生生思想,还是自强精神,抑或厚德意识,无不洋溢着浓厚的人文关怀。

其三,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开掘之匙。此处的“开掘之匙”意指,人文儒学是诠释和评价儒家思想的最佳方法,并为20世纪儒学研究的实践所证明。举例来说,无论是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还是自由主义者胡适,抑或当代大哲张岱年,不仅肯定了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还运用人文主义方法对儒家人文理念进行整理、诠释和评价。

其四,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学科化之果。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儒学从传统儒学悄然转向人文儒学,致使原本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被分别纳入中文、历史、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学范畴之中。如此以来,传统的儒家体系就不复存在,但人文儒学由此凸显。所以说,人文儒学是儒家思想现代学科化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儒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但这恰是儒学确立身份,使其走下独尊的神坛,重新挺立儒家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机缘。

其五,人文儒学是儒家应对挑战之法。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李承贵认为,若从人文儒学角度思考,可使儒学成功应对挑战。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一,是儒学功能过多所致。由于传统儒学体系过于庞杂,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

面,在功能方面有着广泛的诉求。而人文儒学仅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发挥作用,可以有效地化解儒学的生存危机。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一是,儒学外王事业所致。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乃是现代新儒家的毕生祈愿,却终究未能实现。但对人文儒学而言,开出科学与民主,是内在的诉求;开不出科学与民主,也是它的特性所规定。^[3]儒学被挑战的原因之一是,质疑儒学价值所致。近代以来,儒学之所以受到国人的质疑和批判,正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与科学、民主相悖。作为由数千年积淀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儒学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人文儒学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对个体尊严的维护,显然与民主观念兼容不悖。

经过以上5个方面的学理疏解,李承贵说:只有人文儒学才能担当起儒学的现代使命,人文儒学是儒学当之无愧的本体形态。^[3]乍看之下,似无疑义,但细心揣摩,会觉得人文儒学的根基不够牢固,因为人文主义显然无法作为本体撑起体系庞大且内容繁杂的儒学。所以,此论一出即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纷纷著文与李承贵展开论争。依笔者之愚见,人文儒学的论证和推理不乏精湛之处,但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更无法展开社会实践。

三、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

不管认同与否,近年来儒学复兴已成无可争议的事实,尤其是大陆新儒学对儒学体系的构建作了有益的探索。除了上述政治儒学、生活儒学与人文儒学,影响较大的还有文化儒学(陈明)、制度儒学(干春松)、公民儒学(林安梧)、经济儒学(盛洪),以及近来郭齐勇关注较多的民间儒学。这些儒学体系的构架,是否表明儒学已经度过近代以来的持久落寞,再现昔日的辉煌气象?笔者认为尚需历史作出理性的评判。细致阅读大陆新儒学倡导者的学术论著,笔者就当前的儒学复兴思潮略谈两点浅见。

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厘清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儒学对当代社会究竟有无价值,其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是儒学复兴的意义及前景所在。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虽然有广泛的研究,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袁伟时先生曾发出疑问“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10]大陆新儒家们虽然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但他们显然是肯定儒学的现代价值的。可是仅止于此还不够,对于新儒学提倡者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倾心于儒学体系的构建,而是彻底理清儒学的现代意义到底体现在哪些领域,其未

来前景又当何如?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当代社会为它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安顿之所。

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儒学复兴的现实路径是什么,是否如大陆新儒学所描绘的那样?大陆新儒学虽然已经初具一定的理论形态,但仍有诸多不足之处:政治儒学的政治诉求带给儒学的也许是毁灭性打击,生活儒学回归原典重构儒学体系可行性不大,而人文儒学将人文主义作为儒学的本体形态根本就不成立。关于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笔者赞同杨庆中教授的观点,即充分利用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回归原典、开发原典,是否构建儒学的理论体系并不重要。所谓“回归”,就是基于新的时代特征重新诠释原典,以此确立历史与现实交会的当下存在状态。之所以回归原典、重释原典,是因为原典是一个民族最基本存在形式的最经典的诠释文本。^[1]儒学复兴虽不是喊几句简单的口号、掀起几场读经活动、构建几种理论体系就能实现的,但儒学复兴的曙光毕竟已经出现:表现之一是单独的西学或中学解释不了当前国人的生存形式,表现之二是大陆新儒学对儒学未来前景的形上思辨为儒学复兴作了有力的理论尝试。

[参 考 文 献]

[1] 蒋庆. 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

(上接第34页)

可积极发挥安庆市历史文化名城的社会效应,促进黄梅戏与人文资源、旅游资源、纪念品市场的结合,打造“印象·黄梅”、“印象·天柱山”等大型山水实景演出;促进黄梅戏与影视剧产业结合,推出各类黄梅戏影视、音像制品,尤其可与新兴的动漫产业结合,打造黄梅戏动画片、动漫电影,或以舞台剧、音乐剧形式将黄梅风味呈现出来,形成黄梅戏相关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促进黄梅戏与餐饮服务业结合,构建黄梅山庄、黄梅茶社、黄梅书社等关联产业,加大黄梅戏产业化建设,提高其传播效应,使黄梅戏演出与各个行业在发展中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以带动黄梅戏演出市场的繁荣,并最终实现黄梅戏的大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黄研. 全国有多少专业黄梅戏剧团? [J]. 黄梅戏艺术, 1982(1): 174.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2] 黄玉顺. 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 [3] 李承贵. 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J]. 学术月刊, 2009(12): 34.
- [4] 余英时.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2.
- [5] 封祖盛. 当代新儒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1.
- [6]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330-331.
- [7] 蒋庆. 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EB/OL]. (2012-12-23)[2013-09-01].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7296/3969429.html>.
- [8] 黄玉顺. 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J]. 学术月刊, 2012(11): 41.
- [9]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虚无[M]. 王庆节,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12.
- [10] 袁伟时. 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 [EB/OL]. (2013-05-06)[2013-09-02]. <http://cul.qq.com/zt2013/ysd-jt216/index.htm>.
- [11] 杨庆中. 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2012(6): 10.

[2] 李光南. 浅谈黄梅戏如何走市场问题——关于发展安庆市文化产业的一点思考[J]. 黄梅戏艺术, 2007(2): 8.

[3] 马涛涛, 丁亚琼, 熊隽. 民间黄梅戏班社的运营机制——以安庆地区民间黄梅戏班社为例[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4): 77.

[4] 周慧. 在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道路上探索前行——3D全息黄梅戏舞台剧《牛郎织女》创作、演出感悟[J]. 黄梅戏艺术, 2012(1): 5.

[5] 马玲玲, 郭宇. 省黄梅戏剧院院长蒋建国:唱黄梅戏得跟着时代跑[EB/OL]. (2013-05-06)[2013-08-05].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5-06/content_8951810_2.html.

[6] 刘翠, 陆天平. 谈谈黄梅戏产业化发展[J]. 黄梅戏艺术, 2009(1): 3.

[7] 傅润扬. 黄梅戏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策[J]. 大众文艺, 2012(21): 118.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5-0040-05

对西方政治学中两种平等观的评析

朱伟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平等问题是人类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经千百年来的思考,近代以来,平等理论逐渐形成,“结果平等论”和“权利平等论”便是这一理论的两大分支。两种平等理论反映了两种平等观。实践表明,这两种平等理论、平等观都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死结——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讨论平等、正义问题,因而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终极的答案。人与人的平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最终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关键词] 西方政治学;权利平等论;结果平等论;评价

[中图分类号] D50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7

平等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一般来说,平等是指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平等并非简单的数量相等,“平等”偏向“公平(公正平等)”的意义,体现了明显的价值判断的意味,是人类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之一。二战以来,人们对于平等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为结果平等与权利平等之争。后者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其理论自身也存在诸多缺陷。本文拟对这两种理论的演变及冲突原因进行分析,并评价其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平等观念的历史演变

从人类历史来看,平等观念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财富不足,人们为了抵御自然界的威胁而自然地结成群体,平等成为一种自然而非自觉。进入原始社会末期,由于金属工具(青铜器出现)的使用,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群体中出现剩余财富,垄断生产工具者同时也就占有了原本是公有的财富,于是出现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平等”,

“平等”观念应运而生。然而,人们真正地开始理性思考平等问题、“平等论”成为显学则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过程中,张扬的是“自由、平等、博爱”这面大旗,“平等”是他们提出的重要口号之一,关于平等的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重大发展。伏尔泰提出,“凡是具有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1]。卢梭则更全面地提出了平等的原则和要求:人人生而平等;财产应尽可能地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权利人人平等……因此,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是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提出的,首先要求在人格、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等方面实现平等,其平等观对资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

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断加剧,权利平等问题、分配平等问题、机会平等问题、社会保障平等问题……诸如此类的平等问题接踵而至,生活在西方的下层人民纷纷表达出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平等权利的强烈要求,工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罢工,黑人为了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而游行示威,这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近代以来的平等观念。在西方理论界,出现了以罗尔

[收稿日期] 2013-08-18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创新工程基金项目(CXLX13_885)

[作者简介] 朱伟(1990—),男,江苏省南京市人,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斯为代表的倾向于结果平等的理论和以诺齐克、哈耶克为代表的倾向于权利平等的理论之间的争论(注:关于平等问题的理论探讨纷繁复杂,为了便于说明,暂且如此划分;即使诸如德沃金、桑德尔等人对于两者都有批判,但实际上近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论始终是围绕这两者展开的),这两种理论及其争论对现代西方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结果平等论和权利平等论的主要观点

1. 结果平等论的主要观点

资产阶级革命广泛胜利之后,人们逐渐对他们所期待的“美好国家”感到失望,尤其是在下层民众那里,贫穷、失业、种族歧视大量存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二战之后,美国提出“向贫困开战”,欧洲出现了建设“福利国家”的热潮。这些政治实践需要理论支持,而启蒙运动时期的平等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在1960年代,罗尔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了逻辑更为严密、设计更为精致的平等理论,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

罗尔斯认为公平就是正义。理解罗尔斯平等理论的关键在于理解其为达到公平而设立的两条公平原则——第一条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条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差别原则);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2]

这两条原则是平等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之两方面的表现,前者表现为政治权利平等,后者表现为经济权利平等。罗尔斯认为这两个原则存在“词典式序列”,即第一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包含两个原则: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而在第二个原则里面,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于差别原则。从罗尔斯的逻辑推演来看,他并非从一个宏观的角度进行平等制度的架构,恰恰相反,他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最少受惠者的地位——对于整个平等原则作出布置。因此,与其说罗尔斯的公平理论是为了实现每个人的平等,不如说它是在自由权利和社会机会广泛平等的前提下,对最少受惠者实施偏爱和补偿,借此达到社会最终平等之目的,这正是其结果平等论的立场。

具体来说,罗尔斯的第一原则要求每个人拥有

最广泛的合法权利,这是获得一切平等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第一原则,第二原则会成为社会中占优势地位者的特殊权利。而在第一原则基础上,罗尔斯进一步阐述如何解决在自由合法权利基础上的事实不平等问题。罗尔斯认为,若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除了以权利平等作为前提和基础,还必须获得机会上的平等,即种族情况、出生情况、所属阶级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才能”,在相等的机会条件下,杰出者才可以获得更大的物质回报。然而,这期间还有问题,“才能”并非完全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天赋才能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罗尔斯所提出的差别原则便成为整个理论的核心点,差别原则是对权利平等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的重要补充。罗尔斯认为,即使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成为可能,整个社会仍然可能处于一种不平等之中。这种不平等与天赋有关,天赋较优的人将在初次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优势会随着竞争变得越来越大。这种不平等只能通过不平等的分配解决,那么怎样的不平等分配可以使那些处于劣势者获得平等呢?罗尔斯将其表述为“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指出,应当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在他看来,由于天赋等偶然因素带来的收益,并不是道德上应得的,天赋应该被看做一种社会共同的资产而非具有较优天赋者的私人资产,因此,在收入分配的时候应当对那些由于出生或天赋等偶然因素而在社会中受到损失的人予以一定补偿。

2. 权利平等论的主要观点

权利平等论主要是针对结果平等论的弊端而提出的。在结果平等论的指导下,西方许多国家实行福利政策。1970年代,西方风行的福利国家政策陷入困境,人们开始对结果平等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中以诺齐克和哈耶克为代表。

诺齐克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罗尔斯的结果平等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反对罗尔斯的在分配结果中的补偿性再分配,他认为国家的职能不应该包括对于财产再分配的内容,国家只应保护公民的平等权利,任何为了结果平等而进行的再分配,都意味着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财产的侵犯,正如政府无权在未经个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迫某人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拯救另外一个人一样,政府也无权以累进税的方式强制剥夺一个人的财产来救济其他人。^[3]另外,诺齐克还批评了罗尔斯对平等的论证过程。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富有者应为穷人买单的原因是因为富有

者在获得财富之时得到了穷人的配合,而诺齐克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诺齐克认为在不违反法律的社会合作中,富人和穷人是在自愿平等的情况下合作的,双方的收益也是对称的,这一切是自由意志的表现,但在再分配中,罗尔斯却偏向于“最少受惠者”而非保持中立。

哈耶克则认为,结果平等或分配平等本身是非正义的。他认为市场机制下个人收入不平等完全合乎自由精神,而结果平等与保护私有财产制度是矛盾的,对收入结果进行人为补偿显然干预了自由的实现。另外,哈耶克认为市场是效率存在的原因,结果平等论使生产效率大打折扣,收入平等会鼓励懒汉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

在批判结果平等论的基础上,权利平等论提出了自己的平等观。他们认为,平等并不是结果平等论者所提倡的经济事物上的平等,而只能是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同等权利,尤其是在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方面免受侵害的权利。

诺齐克强调个人自由权利的首要性,他认为,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不能为了社会价值和利益去牺牲个人价值和利益。

哈耶克则认为,我们不可能同时获得经济平等和权利平等,如果二者只能存其一,则只能是法律所保证的权利平等。他指出,如果我们平等地对待天赋不平等的人,结果将导致他们仍处于原来的不平等地位或收入水平,而唯一能使他们获得平等地位或收入水平的方法就是区别地对待他们。由此,他得出结论:法律面前的平等和物质方面的平等是相互冲突的,我们所能实现的非此即彼,并不能同时实现两者。显然,哈耶克认为,法律是“我们能够在不摧毁自由的同时所能确保的唯一一种平等”^[4],人生而平等只能限制在自由权利的范畴内。

总之,权利平等论者心目中的平等,只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是人人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平等,是政治权利的人人平等。这种平等承认人们之间天赋能力的差别,从而也承认人们通过自由的努力在社会上所谋求到的有差别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在哈耶克一派看来,这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它不仅有助于保障人们的自由,而且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3. 对权利平等论的再批判

权利平等论的观点对结果平等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对于正在陷入高福利泥潭的许多西方国家具有警示意义,但也仍然受到许多理论家的批判,其所存在的问题有:

其一,将权利抽象化。权利平等论者反复强调,自由一权利应当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个权利优先的国家里,自由和权利只对于那些富裕中产、对政治参与有闲情雅致的绅士们有意义,而对于那些经济窘迫的残疾人、流浪汉们,这种权利的优先性则是一种嘲弄。权利的平等应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抽象的权利优先性只存于思想家的脑海里。

其二,将市场的作用绝对化。权利平等的理论基于一种对于自由市场的完全信任,认为自由市场最符合正义,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符合自愿平等的交换原则,人们应当对由市场交换行为所引起的盈亏(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完全负责。这一观点有明显缺陷:首先,人们进入市场前的地位并不平等,即市场主体并不平等;其次,交换行为不可能遵循最大理性原则,完全平等的情况只能是偶然,自由市场中的大多数交换并不平等;最后,市场具有盲目性、逐利性、不完全竞争性,不可能是最完美的配置手段。

其三,将权利平等与把握权利能力的平等混淆,偷换了概念。权利平等论认为权利平等是其唯一能够认同的平等,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可以保证他们在市场交换中获得平等的交换起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排除人们先天差异的因素,人们仍然无法获得实际的平等权利。这是因为人们在起点之前的不平等导致其在掌握权利能力方面也存在不平等,即社会弱势群体与社会强势群体对于同一权利充分运用的能力完全不同,所以这种将权利平等与把握权利能力平等相混淆甚至等同起来的做法是荒谬的。

其四,权利平等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基于自由市场的权利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发挥人们的潜能、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促进社会快速发展,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平等是以牺牲事实上的平等为代价的。这种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内容上的平等,客观上是对现存的社会不平等的辩护,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现实是,社会精英们打着权利平等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对社会底层人群进行无情的剥削和压迫。

三、权利平等论与结果平等论矛盾冲突的原因

权利平等论和结果平等论是西方“平等论”中的主流派别,之所以发生矛盾冲突,有多方面的

原因。

1. 社会现实矛盾变化引起理论冲突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 政治哲学思想是人们对政治生活思考的总结和抽象,政治哲学思潮的转向反映了政治生活矛盾的变化。

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麦卡锡掀起的反共浪潮、19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及越南战争,使得美国的霸权不断受到挑战,而此时其国内的争取民权运动、黑人抗暴斗争、校园学生运动、大面积的贫困现象加剧,从而使得美国处于一种严峻的政治危机之中,而罗尔斯《正义论》中所探讨的平等自由、公正机会、差别原则等问题,恰以一种理论的方式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或希望。但到了1970年代以后,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方许多国家风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导致经济出现严重的滞胀,贫困问题重新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到1990年代中期,美国接受政府救济的贫困人口已占全部人口的10%,英国更达到16%。^[6] 这种社会矛盾的变化,使理论界开始对过去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提出质疑、做出反思,权力平等理论的主张者认为结果平等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平等理论的内在矛盾

首先,平等与自由存在矛盾。平等和自由都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取向,但其内部却存在矛盾性。人与人的天赋才能、身高外貌、品德性格、家庭情况并不相同,如果遵循自由是唯一至上的原则,人们按照其自身条件自由发展并进入市场竞争中去,则他们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自然是有差别的。如果基于自由至上的考虑,这种差别是合理正义的,而侵犯这种差别的则是不合理不正义的,通过公共力量进行平等分配则更侵害了自由原则。因此,在现代西方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与平等不仅无法达到统一,而且还是相互冲突的,理论界也由此出现分歧,发展为相互矛盾的两大阵营。

其次,平等与效率存在矛盾。一般认为,平等与效率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一般意义上,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是效率产生的前提,收入平等则会滋生懒汉情绪,而降低生产效率,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雄辩地说明了结果平等论的政治主张确实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权利平等论者认为,平等只应当存在于权利而非分配当中,鼓励个人在同等条件下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的物质回报,以此维持社会经济的高效持续发展;该论者也承认这种自由、效率优

先的导向必然会引起社会下层的进一步贫困。结果平等论者认为,平等是人们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以效率的名义侵害平等是人性沦落为财富之奴的表现,是唯生产力论的结果,这使得人的尊严和社会公义遭到践踏。对平等与效率的优先性的不同选择,使结果平等论与权利平等论发生理论分歧。

最后,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存在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人们紧紧地围绕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开展生产劳动。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以自由、民主为名建立起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普通公民成为政治参与的主体。此时,人们基本能够获得形式上的政治权利平等,然而,恰恰相反的是,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市场的自由性变得愈来愈大。这种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形成一种怪异的张力,既对立又统一。结果平等与权利平等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人们对平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不同追求所引起的不同政治思想之间的矛盾。

3.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争论在平等问题领域的延展

在对于自由问题的讨论上,对当代西方影响较深的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争论。罗尔斯和哈耶克分别是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可以认为他们关于平等的争论也是其关于自由问题的争论在平等问题上的延展。新自由主义强调积极的自由观,认为公共权力应当对个人自由有所作为地进行保障;而新保守主义则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行为不仅没有保障公民自由,反而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自由地选择个人自由的权利。双方对于自由的讨论在平等问题上的分歧则表现为:是否应当使用公共力量对自由形成的分配结果进行再调控。

四、对两种平等理论争论的评价

两种平等理论的争论已持续了半个世纪,各自都有其拥护者,事实上,二者也并非非此即彼、完全对立的关系。其争论对于人类探讨平等问题是有益的。

1. 两种理论的争论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

结果平等论与权利平等论之间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现代西方社会在平等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这两种观点都强调了平等的一个方面,并且都对对方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评。

就结果平等论来说,它对社会上的“最少受惠者”表现了特别的关爱,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对

平等问题进行审视,其理论体系之精致、论证之严密令人叹服。权利平等论针对结果平等论的问题,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认为权利平等是唯一可以被承认的平等,除此以外一切通过公共力量来构建平等的方式都是对自由的侵犯,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结果平等论的理论缺陷。两种理论相互批判共同推动了现代平等理论研究的发展。

2. 两种理论的争论是对于重大现实问题的探讨

结果平等论是针对西方社会出现的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而提出的,而权利平等论则是在福利国家政策无以为继、经济严重滞胀的时候提出的,两者具有显著的时代使命感和深刻的现实意义。结果平等论的提出有助于改善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缓和社会矛盾,为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而权利平等论则是针对结果平等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失败而提出来的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某种程度上对于发挥人们的潜能、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促进社会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3. 两种理论的争论并未解开平等问题的症结

结果平等论和权利平等论分别揭示了平等的两个侧面,即事实平等和形式平等,但他们并没有找到使平等的两个侧面统一起来的现实途径。

事实上,社会存在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严重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资料仍然需要通过未必公平的市场竞争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这种阶级不平等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平等要

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7]因此,真正的平等只有在消灭阶级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同时,真实的平等不仅应当表现在形式上而且应当表现在现实上,不仅应当在法律的领域实行,而且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真实的平等只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中,在那里,一切阶级和阶级压迫都消失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能真正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做到平等形式与平等内容的统一。因此,平等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中逐步实现。

[参 考 文 献]

- [1] [法]伏尔泰. 哲学辞典(下册)[M]. 王燕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4.
- [2] [美]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0.
- [3] 姚大志. 自由主义的两个教条——评罗尔斯和诺奇克的两个争论[J]. 哲学研究,1996(9):25.
- [4]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上)[M]. 邓正来,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7:102.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 [6] 李迎生. 西方社会福利问题的四大热点[N]. 学习时报,2003-07-14(5).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4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45-06

论拉美新左翼政权崛起中的美国因素

成晓叶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左翼政权的崛起掀起了一番“粉色浪潮”,这是新千年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新景象。拉美左翼政权的崛起,美国是其关键影响因素:引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是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经济社会条件;美国推动的拉美民主化进程为拉美新左翼政权提供了制度基础;美国战略视线的转移为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外交条件。

[关键词]拉美左翼政权;新自由主义;美国因素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8

“左翼”的概念由来已久。“左翼”和“右翼”作为政治术语在1789—179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就被创造出来了,指的是三级会议上的座次安排:那些坐在左边的人基本上是激进革命的,包括支持建立一个共和的世俗政权^[1];而坐在右边的人支持旧政权的传统体制。1815年法国君主立宪复辟后,人们开始正式使用“左翼”这个术语。这个术语后来也被用在一些革命性的运动之中,比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一些诸如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改革者运动等。左翼这一政治理念范畴涵盖了从中左翼到极左。中左翼概念阐述的是当前主流的政治理念,而极左概念对应的是那些相比之下更加激进的政治立场。中左翼的政党或组织通常包括社会民主党、社会自由党、进步党以及一些民主社会党、绿党(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者)。中左翼政党一般主张采取市场资源配置,这种资源配置一般是建立在重要的公共部门和繁荣的私人企业之上的混合经济。极左政治是左翼政治中程度最高的左翼。持极左政治观念的人寻求创造一种完全的或者是程度较高的社会平等且废除各种形式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特别希望结束那种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局面——尤其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不平等的源头;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是一种财富分配完全平等的社

会,在这种社会里人人平等,没有人有特殊的政治权利或者过多的经济财产。^[2]

许多学者认为拉美左翼的政党、运动和左翼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对平等的承诺;倾向于用国家来平衡市场的力量;笃信民众参与的重要性。例如康奈尔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肯尼斯·M·罗伯茨认为,拉美左翼致力于用国家力量或是民众的参与来缓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并且保护个人和团体,以免受市场不安全因素的影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马修·R·克莱瑞将左翼定义为任何历史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民众社会运动、民粹主义者的社会组织,或其本身将反体系、革命性强和崇尚革新作为目标的政治力量。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麦克斯韦尔·A·卡梅伦认为,拉美左翼的政党、运动以及领导人都寻求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善拉美不平等的状况,增进社会凝聚力,这种方式有时是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有时是领导人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政策举措;无论是代表广泛多阶层的联盟还是应对来自特定社会阶级、部门和团体的需求,他们都主张以国家的力量弱化市场的力量;拉美左翼通常以民众参与的方式来推动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转型。虽然一些左翼领袖忽视或并不重视民主,但仍以民众参与来代替两党制,其他拉美左翼

[收稿日期]2013-06-20

[作者简介]成晓叶(1988—),男,江苏省南通市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拉美左翼政权、英国政治、民族分离主义。

在现行的宪法和法律体系下仍然坚持民主制,他们都致力于选举民主。^[3]

关于拉美左翼崛起的原因,国内学者大部分观点较为一致,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是拉美左翼崛起的最重要因素,国外学者观点各异。墨西哥前外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认为,拉美不平等的现实和民主制度的存在是拉美左翼崛起的原因。拉美地区的社会缺陷驱使拉美的选民将选票投给那些能够让他们变得不再贫穷的政党。拉丁美洲在1980年代就已经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地区了,然而民主化的浪潮赶走了军事独裁政权。^{[4](P179)}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库尔特·维兰德教授认为,拉美左翼政党崛起的环境在于新自由主义未能兑现提高人民的生活这一诺言,并且加剧了本身就恶化的就业问题。^[5]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拉美政治研究的高级讲师弗朗西斯科·潘尼扎认为,拉美左翼崛起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政治变化情况。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左翼政党的力量在军事独裁以及经济改革失败而失去民众支持的情况下受到削弱。同时,1980年代的左翼政党如玻利维亚的民主人民联盟和秘鲁革新党执政时期的失误使得左翼政党信誉受损。但左翼政党这一时期所产生的危机还不是拉美左翼的政治终点,而民主的连续性有助于拉美左翼重新组织起来,也促进了拉美左翼自身的适应和改革。^{[4](P179)}第二,一定程度上与右翼政党的弥合。毫无疑问,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与1998—2002年日益加剧的贫困有关。反对新自由主义似乎是所有拉美中左翼竞选人的论调,但力求成功登上拉美政治图谱的政治目标使得拉美左翼政党的纲领满足范围更广,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中间派选民而不是极左或极右的选民。^{[4](P182-184)}第三,拉美左翼能够协调政治与体制之间的关系。虽然拉美的选举现在已经变得公平自由,但政治体制依然十分脆弱和不稳定。腐败以及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使国家机构和政党的声誉下降,同时也让那些反对现行制度的候选者从中获利。拉美地区政治的局外者总是得到广泛的支持。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末,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秘鲁前总统藤森以及巴西前总统卡多佐还未步入拉美政治圈,而近10来年,查韦斯、莫拉莱斯以及科雷亚则以反抗体制的左翼领袖赢得了选举。1990年代初期至21世纪初期反建制的选举人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也反映在竞选人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当中,1990年代早期的候选人反对政治秩序却无法保证经济的

稳定。而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候选人均反抗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政治体制。^{[4](P184-185)}

尽管学界对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因素各持己见,大部分论述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学术著作几乎异口同声地从不同角度将新自由主义纳入其中。从表面上看,拉美左翼崛起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源于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源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公及就业率低迷等原因,但笔者认为,其本质原因是拉丁美洲“离美国太近、离上帝太远”的地缘政治特点以及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使得美国能够轻易地通过新自由主义中的市场开放来获取拉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当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无法实现当初其给拉美民众许下的诺言时,拉美左翼政权才开始崭露头角。先是1998年查韦斯成功成为拉美的左翼总统;随后,从2002年巴西前总统卢拉的当选以及2006年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2007年阿根廷、危地马拉,2008年萨尔瓦多、巴拉圭左翼政党纷纷成为执政党后,拉丁美洲开始呈现出政治图谱中代表左翼力量的粉红色。拉美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影响到了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各个层面。在社会经济方面,引进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促使拉美左翼政党从选举中脱颖而出;在政治体制方面,美国曾经极力推动的民主化进程为拉美左翼政党走向执政搭起了制度平台;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美国对中东、东南亚地区的关注以及对拉美右翼的忽略也成了拉美政坛出现左转的一个因素。自始至终,在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因素绝对不能忽视,本文拟从三个层面探析拉美左翼政权崛起中的美国因素。

一、引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是拉美左翼政权崛起的经济社会条件

新自由主义理论也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是1930年代后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19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将凯恩斯主义推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前台并取代古典自由主义。但是19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第二次金融危机“滞涨”之后,凯恩斯主义开始失去市场,新自由主义开始浮出水面。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的环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义,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具体措施包括:紧缩货币供给、压低工资、抑制通货膨胀、解除政府部门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减税刺激投资、削减社会福利和打击工会。而在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

国家,新自由主义主要推行的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观点是主张解除对国际商品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的限制。^{[6] (P325-326)}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主要以放松管制、自由贸易、私有化为主,以廉价的劳动力为表象,这为一些跨国公司进入拉美以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肥沃的土地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在1990—2000年的10年间,跨国超市在拉美的零售份额从10%攀升至60%。拉美地区一时间成为金融投资的热土。随着拉美地区融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加深,贸易所占GDP的比重也从1989年的10%上升到1999年的18%。但这看似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拉美真正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同时也给拉美带来了社会不平等、大面积的失业^[7]。芝加哥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分支学派对拉美的经济走势有着不小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哈伯格以及哈耶克都访问了智利并发表了演讲。美国媒体对芝加哥大学的关注以及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1970年代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学派吸引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尤其是拉美国家的留学生,阿根廷在1962—1967年一度选送27名学生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同时,美国政府通过援助机构、国际合作局及其后继者国际发展署和福特基金会、富布莱特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德基金会,为新自由主义的传播牵桥搭线,提供资助。^{[6] (P330)} 此外,1980年代早期拉美拖欠美国的巨额债务让拉美在随后的几年中始终处于停滞的状态。针对拉美的发展困境,美国对拉美采取了减免一部分债务以及债务折扣化的“布雷迪计划”,但这种债务的减免只是扣除措施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要求拉美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倡导的经济调整计划。该计划要求拉美大幅削减政府开支、设置竞争性汇率、通过减少关税为国内生产者提供补贴、向国外公司开放拉美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虽然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范围内国家

监管的放松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提供了条件^{[8] (P576)},却给拉美国家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在拉美运行20年的表现。在综合调查拉美19个国家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拉美的贫困率和总贫困人口在新自由主义运行后的头10年呈直线上升趋势,1990年代后虽然贫困率偶有下降,但是贫困人口总数却在上升,即使贫困率在1990年代偶有下降但与1980年代刚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拉美相比,其基本比率仍然是增长的。同时相较于新自由主义推行20年中拉美贫困率和贫困人口总数的走势而言,拉美绝对贫困人口总量的走势与拉美贫困人口走势大致相似,不同的是绝对贫困率从1990年代之后看似有所下降,但是与1980年代拉美刚刚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时贫困率只有0.1%的区别,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拉美的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曾带来一些繁荣,但实质上削弱了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特别是侵犯了中下阶层的权益,从而导致社会分化、政治混乱等负面结果。对于拉美民众而言,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以及拉美的欠发达,引发了拉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感,而拉美左翼政党异口同声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牢牢地抓住了拉美选民的心。对于西方的观察家而言,美国以及它的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想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将新自由主义强加给拉美国家。一些洞察力更深的观察家从历史的深度来解读这些现象,他们中的一些人联想到了殖民时期,另一些人则联想到了19世纪的巴林危机。但无论经济改革的理由是什么,拉美地区的观察家们都会对经济改革的根源产生不同程度的怀疑情绪;另一些观察家甚至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欧洲幽灵的话转述为一个幽灵,一个自由主义、自由市场以及自由竞争的幽灵在拉丁美洲徘徊^[9]。随着拉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持续反抗,巴西劳工党领导人卢拉2002年在女

表1 1980—1999年拉丁美洲贫困人口和绝对贫困人口变化情况

| 年份 | 贫困人口 | | | | | | 绝对贫困人口 | | | | | |
|------|-------|------|-------|------|-------|------|--------|------|-------|------|-------|------|
| | 总数 | | 城市 | | 乡村 | | 总数 | | 城市 | | 乡村 | |
| | 数量/百万 | 占比/% | 数量/百万 | 占比/% | 数量/百万 | 占比/% | 数量/百万 | 占比/% | 数量/百万 | 占比/% | 数量/百万 | 占比/% |
| 1980 | 135.9 | 40.5 | 62.9 | 29.8 | 73.0 | 59.9 | 62.4 | 18.6 | 22.5 | 10.6 | 39.9 | 32.7 |
| 1990 | 200.2 | 48.3 | 121.7 | 41.4 | 78.5 | 65.4 | 93.4 | 22.5 | 45.0 | 15.3 | 48.4 | 40.4 |
| 1994 | 201.5 | 45.7 | 125.9 | 38.7 | 75.6 | 65.1 | 91.6 | 20.8 | 44.3 | 13.6 | 47.4 | 40.8 |
| 1997 | 203.8 | 43.5 | 125.7 | 36.5 | 78.2 | 63.0 | 88.8 | 19.0 | 42.2 | 12.3 | 46.6 | 37.6 |
| 1999 | 211.4 | 43.8 | 134.2 | 27.1 | 77.2 | 68.3 | 89.4 | 18.5 | 43.0 | 11.5 | 46.4 | 38.3 |

性群体、黑人以及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支持下成功当选总统。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原住民和工会联盟、妇女组织和学生群体一同组织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财政紧缩计划,同时将选票投给了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在委内瑞拉,环保人士、原住民和工会也同样组织起了反对新自由主义、支持查韦斯的选举活动。查韦斯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中包括加强对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国有控制,为国内外反贫困计划筹集资金的项目。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也引起了民众要求关闭银行以及对国外债务进行拖欠为主题的大型街头示威游行。阿根廷贫困的蔓延和政治抗议频繁以及粮食暴动很快将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总统赶下台而选举了民众主义者基什内尔,基什内尔与许多阿根廷人一样,都愤怒地抨击富裕的银行家以及资本家过时的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社会正义学说。^[10]

二、美国推动的拉美民主化进程为拉美新左翼政权提供了制度基础

美国长期对拉美进行干涉,这种干涉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外交领域,也反映在内部政治制度方面。张凡在《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一书中将拉美民主化进程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历史遗产、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国际因素。其中国际因素在推动拉美国家民主化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外部势力甚至直接干预一些国家内部的民主化进程。在拉美国家的民主过渡中,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间接或直接地施加了各种影响,如联合国附属机构、欧洲联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1] 马丁·尼尔森也认为,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转型之内部条件是要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民主化结合在一起,外部因素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也都希望将两者结合起来。而上述内部和外部因素都要求将自由公正的选举同结构性经济改革相结合。美国则通过对国际机构的多边或双边影响促使这些国家创建并发展起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虽然美国有时又是摧毁拉美民主的罪魁祸首,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民主的推崇在拉丁美洲第三次民主浪潮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2] 而拉美方面也不得不接受美国推行的民主秩序。二战以后,拉

美政府为了保持进口替代工业化项目来自美国的贷款和投资,急于向美国展示自己的民主凭据。^{[8](P352)} 此外,美国也从经济上扶持拉美的民主,除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支持拉美的民主以外,美国于1983年创立了全国民主基金会(NED)及其附属机构全国民主研究所、国际共和研究所,意欲通过这些机构来推动民主机构的成立、促进民主价值观的推广,而这些机构最先开始在中美洲运行。^[13] 1974年,美国决定实行并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扩张之后,就开始放弃支持独裁政权的政策转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14] 正如当代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所说:“里根和布什执政期间,美国政府采纳的是一条民主版本的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不允许民主政府被推翻。”^[15]

自查韦斯1998年通过竞选成为委内瑞拉总统以来,其余拉美左翼政党全部通过民主选举方式上台执政。而拉美民主体制的延续与美国以及美国所控制的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不无关系,美国所极力推动的拉美民主化进程又间接地为拉美左翼政党通过民主选举方式执政提供了内部政治体制条件。虽然拉美民主化成因复杂,但从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论述中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因素,美国对拉美民主化进程的推动无形中为拉美左翼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提供了制度条件,因此在拉美左翼政权的崛起中美国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三、美国战略视线的转移为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外交条件

拉美作为美国的“后院”,在21世纪之前几乎都以美国的“马首是瞻”,拉美虽然对美国时有反抗但由于实力差距悬殊仍难以与美国抗衡。二战以后为了抵御苏联对拉美的影响,美国极力扶持拉美右翼独裁政权以此打压支持苏联而又反对美国的拉美左翼力量。1948年,美国与20多个拉美国家在第九次美洲国家会议上改组了泛美同盟,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所谓的来自西半球以外的“共产主义威胁”问题,最终通过了反共决议。美国为了加强对拉美的控制,对拉美许多国家,尤其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权,一直不遗余力地企图推翻,即使这些政权是通过民主合法的方式获得的,如危地马拉的前总统阿本斯以及智利前总统

阿连德等被美国推翻的领导人都是经过合法选举上台的。据不完全统计,1948—1958年间,美国在拉美策划的政变和颠覆活动达16次之多,其中比较重大的有秘鲁、委内瑞拉、古巴、巴西等国的政变或政变阴谋。^{[16](P137)}截至1999年,右翼政权在拉美的前景还显得十分乐观,因为自1990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竞选中失利后,西半球只剩下了古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美国著名学者福山抛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社会将会进入以民主和市场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形式。^{[17](P11)}然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得到验证,相反的情况却发生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9·11”事件的突然爆发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而对于拉美左翼政党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美国所支持的拉美右翼政权被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折磨得苦不堪言,加之“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将视线转向中东地区,将中东恐怖分子视为头号敌人,放松了对拉美右翼的支持,此时拉美的左翼政党领袖查韦斯、科雷亚、卢拉等,通过反对新自由主义、控制贫困以及将大企业国有化的竞选口号纷纷赢得选举,走上拉美的主流政治舞台。美国深陷中东反恐战争泥潭,继续对中东地区投入大量的精力、财力,而在无意中忽视了拉美左翼的崛起,拱手将拉美这块“后院”的控制权让给了拉美左翼势力。

2001年12月,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后,美国对阿根廷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态度,遭到拉美舆论界的一致批评。^{[16](P263)}这进一步加快了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从时间顺序来看,2005年乌拉圭的巴斯克斯,2006年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2007年阿根廷的基什内尔,2008年危地马拉的科洛姆、萨尔瓦多的卡塔赫纳以及巴拉圭的卢戈的,便是拉美左翼崛起的连续性标志。

拉美左翼政党上台执政以后,在国际关系方面倾向于多边合作,处于发展阶段的拉美亟需外部的帮助。以委内瑞拉为例,援助拉美原本是美国的事务,但由于美国专注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而无力经营拉美,委内瑞拉希望从多边关系中寻求帮助,便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保持同欧盟之间的关系等。许多拉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被美国外交政策所边缘化和排斥的国家,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机遇。^[18]与此同时,在拉

美左翼政党执政之后也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一体化进程,政治上有社会党国际,经济上有南方共同体市场、玻利瓦尔替代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和发展部长级会议、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美国家联盟。这些组织和共同体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便是以更独立的方式或是通过减少与美国合作亦或是采取以分化和外部施压的方式来强化离开美国控制之后的自主权。其中,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被媒体称为“没有华盛顿的美洲国家组织”,以此凸显其排美的态度。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必将取代影响力日趋式微的美洲国家组织。”^[19]查韦斯的表态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厄瓜多尔外长帕蒂诺说:“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的最终目的,就是取代美洲国家组织。”^[20]此外,在防务方面,由巴西和委内瑞拉牵头正试图建立一个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的南美防务委员会,南美地区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些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17](P48)}

四、结语

相较于1990年代的拉丁美洲,21世纪的拉丁美洲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一是古巴不再是拉美唯一由左翼执政的国家,更多的拉美左翼政党开始成为执政党,拉丁美洲的政治图谱上也呈现出鲜艳夺目的粉色。二是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也使得拉美左翼之间形成了良好的经济、防务方面的一体化组织。

毋庸置疑,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破产是密不可分的,美国战略视线的转移为拉美左翼政府开展多边合作关系以及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提供了空间,同时美国对拉美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也间接地为拉美左翼政权提供了政治体制基础。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维度抑或是外交层面来剖析拉美左翼政党的崛起,都不能离开美国这一关键的影响因素。

[参 考 文 献]

- [1] Andrew Knapp, Vincent Wright.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France*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2.
- [2] Oliver H Woshinsky. *Explaining Politics: Culture, Institu-*

- tion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45 - 149.
- [3] Maxwell A Cameron.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s: beyond good and bad [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9, 30 (2): 331.
- [4] Francisco Panizza. Contemporary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Beyo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M]. London: Zed Books Ltd, 2009.
- [5] Kurt Weyland, Raúl L Madrid, Wendy Hunter. Leftist Governments in Latin America Successes and Shortcoming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 [6] 徐世澄. 拉丁美洲现代思潮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0.
- [7] William I Robinson. Latin America in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 [R]. SUMMER 2012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2012(45): 2.
- [8] Edwin Williamson. The Penguin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Part Four Towards A New Era [M].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9.
- [9] Sebastian Edwards. Left Behi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 [M].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71.
- [10] Benjamin Keen, Keith Haynes.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EIGHTH EDITION) Independence to the Present [M]. Asia: Cengage Learning, 2008: 288 - 289.
- [11] 张凡. 当代拉丁美洲政治研究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59.
- [12] Manuela Nilsson, Jan Gustafsson. Latin America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80.
- [13] Richard L Millett, Jennifer S Holmes, Orlando J Pérez. Latin American Democracy Emerging Reality or Endangered Species?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38.
- [14] 苏振兴. 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95.
- [15] [美] 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民主化浪潮 [M]. 刘军宁, 译.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8: 48.
- [16] 徐世澄. 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17] Francisco Dominguez. Geraldine Lievesley and Steve Ludlam Right-Wing Politics in the New Latin America: Reaction and Revolt [M]. London: Zed Books Ltd, 2011.
- [18] Shen Ding. To build a "Harmonious World": China's soft power wielding in the global south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J]. Research Gate, 2008, 13(2): 193.
- [19] 网易财经. 查韦斯欲组建拉美“三驾马车” [EB/OL]. (2011 - 12 - 05) [2013 - 06 - 15]. http://money.163.com/11/1205/08/7KG8LN600253B0H_2.html.
- [20] 新华网. 拉美诞生新共同体“抱团”发展 [EB/OL]. (2011 - 12 - 05) [2013 - 06 - 15].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05/c_122378741.htm.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5-0051-09

论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的法律问题

章成¹, 郑金栋²

(1.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2. 南昌大学 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8)

[摘要]中日东海大陆架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与日本的结构性矛盾在海洋划界问题上的尖锐体现。中国对钓鱼岛享有无可辩驳的主权依据,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应尽量对钓鱼岛采取“零效力”的处理方式。通过对中日双方大陆架划界主张的比较,我国主张的法理依据及日方主张的无理性皆显而易见。中国需要在今后的东海划界谈判中更为成熟地运用法律手段,创制适用于东海海域的有关国际法规则,并以此来确保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最终圆满解决。

[关键词] 中国;日本;东海大陆架划界

[中图分类号] D99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09

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近几年随着东海油气田的开发进入实质运作状态,并体现在钓鱼岛主权的争端呈现出新一轮升温。因为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直接关涉我国国家利益的维护,所以当前有关该问题的学术论述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目前我国学界从国际法层面对此问题进行论证的力度仍显不够。因此,本文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东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进行归纳和梳理,以期有助于国内民众对该问题增进了解并澄清过往常见的认识误区,从而为我国国家利益的维护提供可资借鉴的法律参考。

一、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议产生的背景

1. 东海及其大陆架的自然地理条件

东海是一个位于中日韩三国陆地之间的半封闭型边缘海,东中国海(East China Sea)是其在国际上的正式称谓,表明东海位于中国国土以东。国际水道测量组织(IHO)出版物《洋与海的界限》(*Limits*

of Oceans and Seas)对东海的四至进行了界定:东海西界中国大陆海岸线及其沿岸岛屿,东侧经九州岛西南缘与琉球群岛西南面的八重山列岛之间的连线与太平洋相接,东北以济州岛经五岛列岛直至长崎半岛南端的连线与日本海相对,北面以长江入海口北岸到济州岛之间的连线与黄海毗邻,南部以台湾海峡与南海相通。整个东海海域南北长约630海里,东西宽约167~360海里,自然海区的全部面积约为77万平方公里。^[1]

大陆架亦称大陆棚,是指大陆或大岛从邻接海岸的浅海海底到水深200米的海底之间,呈缓缓倾斜如棚状的区域。全球海洋约7.6%属于大陆架。^[2]1945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率先主张美国对邻接海岸公海的大陆架地底和海床拥有控制权。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第1款对大陆架的定义是:“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

[收稿日期] 2013-08-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820004);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FX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3106010202)

[作者简介] 章成(1988—),男,江西省南昌市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基础理论、海洋法、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展到 200 海里的距离。”^[3]关于大陆架的外部界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第 5 款规定: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350 海里,或不应超过连接 2 500 米深度各点的 2 500 米等深线 100 海里。^[3]具体到东海海域而言,东海海底有 2/3 的海床属于平均水深不超过 200 米的大陆架,面积约为 52 万平方公里。从地质结构上讲,东海大陆架的地势走向与中国大陆基本相同,即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其中,东海的主体海域与冲绳海槽海域的面积比例大致为 6:1。东海的主体海域多为水深在 70~150 米之间的浅海,这里渔业资源丰富,是中国海洋生产力最高的海域。不仅如此,东海的陆架平原相当平坦,在东海海域稍稍偏东的大陆架上,有一个发育成熟、油气富集、其他资源储量亦非常可观的复合型沉积盆地,被称为“东海陆架盆地”,其东、南经钓鱼岛隆褶带与冲绳海槽分割,向西、北以浙闽隆褶带和黄海为界,总面积约为 26.7 万平方公里。该陆架盆地的沉积层平均厚达 6 000~9 000 米,已有大量数据充分证明这里的海床底土淤泥带和沉积物具有鲜明的陆源性特点,是由长江、黄河、钱塘江等河流冲流入海的大量泥沙和有机营养物质堆积而成的。所以无论是从地质构造还是就其海底沉积物的成分上来说,这部分海床在性质上都明显属于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东海主体海域海床的东部边缘平均水深 156 米,越往东南水越深,开始由大陆架向大陆坡过渡,直至冲绳海槽为止。接近冲绳岛西侧的冲绳海槽(又称为中琉界沟)是东海的一个特殊地理单元:冲绳海槽是位于东海海域外缘、与琉球群岛走向相同的海底弧形区域,从东北向西南延展约有 600 海里,宽度 60~150 海里,底部的沉积盆地面积约为 14.8 万平方公里。从海底的自然演化上看,冲绳海槽两侧的地质地貌和沉积物来源是明显不同的:冲绳海槽以西以北的大陆架和大陆坡,地形平缓、地壳稳定,海床水深在 200 米以内,由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岛的陆地物质养育形成,是中国东部陆地及山脉的自然延伸;而到了位于钓鱼列岛以南 10 余海里处的冲绳海槽,其海床地形突变,深度陡增,已超过 1 000 米,不少区域的水深甚至在 2 000 米以上,最大深度达 2 719 米(这也是东海的最深处)。与结构稳定的东海主体区域相比,此处的地壳运动非常强烈,亦无任何属于大陆礁层的沉降物证,因此,冲绳海槽两侧的海底陆地在地质属性上没有关联。从地质科学上讲,冲绳海槽是把中国大陆领土自然延伸的东海大陆架、大陆坡与日本的琉球群岛岛架截

然分开的天然分界线。^[4]

2. 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议的由来与演变

目前,中日东海划界争端从性质上可以分为 3 类:首先是中日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其次是中日关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及相关渔业资源的捕捞利用争议,最后是中日关于东海大陆架的划界争议。在以上 3 类划界争议问题中,东海大陆架的划界争议是中日东海划界之争的核心问题。东海大陆架的划界争议并不是随着大陆架概念的出笼而同步出现的,而是 1960 年代初,东海的油气资源前景引起有关专家的注意后而出现的。新野弘于 1961 年提出东海海域可能蕴藏有石油资源的设想,由此触动了日本政府抢占资源的敏感神经。1966 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UNECAFE)设立了一个专门勘测东亚近海资源的“亚洲近海矿物资源联合勘测协调委员会”(CCOP),日本在第一时间宣布加入。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赞助下,1969 年 4 月,由美日学者埃默里和新野弘牵头,包括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专家在内的调查组对东海、黄海海域进行了联合实地勘测,并在历时半年多的实地勘测基础上,发布了著名的调查报告即“埃默里报告”(Emery Report),明确预言“在台湾与日本之间的这片浅海海域将来也许会成为最有远景的世界规模的产油区,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波斯湾”。^[5]这个结论在贫油的东亚地区引起了广泛的震动。特别是此后不久的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了世界性的石油供应危机,作为潜在油田开发对象的东海也就受到了各国的广泛关注,各类矿藏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更是对其垂涎三尺。根据引起广泛反响的“埃默里报告”的估计,东海蕴藏着 60~70 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相当于黑海油田的储存量,有望成为第二个中东。据日方估计,大部分石油埋藏在日本单方面划定的“东海中间线”的日方一侧。因此日本自然觊觎东海潜藏的富饶资源。如果日本能将东海海域的油、气、锰、钴、镍以及其他各类矿物资源和渔业资源尽数据为己有,那么日本就将永远摆脱资源小国的发展桎梏,而跃居资源大国行列。而在中国,李四光先生也很早就指出,我国海域的油气以东海最好。^[6]

大陆架划界争端的核心是主权权利之争,其焦点是大陆架矿藏资源的归属和利用。东海大陆架划界争议的法律实质,同样也是主权权利的归属和利用问题。东海大陆架原本就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在其之上的一切主权性权利皆归属于中国。

这些主权性权利的内涵既可见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7条的明文规定,也延展到其他不为公约所载、但与大陆架有紧密联系的海洋剩余权利。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7条的规定,“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并不取决于有效或象征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3],中国对于东海大陆架拥有永久性的固有主权权利,即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对此并未有明确的宣示或实质性的行使。然而由于海洋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大陆架上的丰富海洋资源对于当代各国的发展关系重大,因此各国为了自身利益而极力争夺大陆架上的海洋资源。目前中日东海划界争议的本质,即是日本基于自身经济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利益的考虑,无端指责和干预中国在东海大陆架上的正常勘探与开发活动,并公然争夺原本就属于中国的主权权益。由此可见,东海海域资源开发的潜藏价值是周边各方对该海域海底资源及岛屿主权产生争议的一大诱因,这足以验证汉斯·摩根索的那句经典论断:“利益是衡量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7]在此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东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并非仅仅具有单纯的法律特征,因为东海大陆架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其蕴藏有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它也是攸关我国国家安全的海洋战略要地。日本抢占东海大陆架的企图蓄谋已久,即便是明知其并无有利的法律依据,也依然要千方百计地混淆视听,完全无视国际海洋法的基本规则并不惜损害中日关系的发展大局。其中固然有追逐经济利益的现实动机,但中日两国在东海战略利益上的结构性矛盾才是争执产生的根源。因此,尽管纯粹意义上的法律分析并不足以实现东海大陆架划界纠纷的彻底解决,但以国际法为武器,可以更充分地揭露日方主张的非法性并有力驳斥其无理逻辑,从而有助于在法律和道义上支持我国在此问题上所进行的合法合理斗争。

二、钓鱼岛主权归属争议及其对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的影响

1. 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与台湾岛同处东海大陆架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位于东海南部、台湾东北部、中琉界沟(俗称“黑水沟”)的西北侧、冲绳诸岛以西、八重山列岛以北的岛群,主要包括有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北岩、南岩、飞岩等8座岛礁,陆地总面积约6.344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主岛呈番薯形,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面积约4.5平

方公里。

钓鱼岛的主权自古属于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早在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就见于由明朝前往琉球的使臣所明文记载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当时被称为“钓鱼屿”。明朝戚继光抗倭时期钓鱼屿为中国海防的前哨。倭患平息后,钓鱼岛成为中国与琉球航路往来的海上航标。钓鱼岛的归属早在中国明清时期就是十分清楚的:中国属国琉球国在其琉球36岛全图中并不包括钓鱼岛。1786年日本仙台藩的林子平在其制作的《三国通览图说》之《琉球国全图》中,也将钓鱼岛标注为中国的版图。日本真正开始觊觎钓鱼岛是在其非法并吞琉球国之后。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在钓鱼岛上收集鸟粪,进而声称其“发现”了钓鱼岛,向时任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申请在岛上建立灯塔及其他可标识为日本的国标。山县有朋为此与时任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磋商,井上馨认为:“此岛屿近清国之境,较之前番勘察已毕之大东岛方圆甚小,且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报纸等,风传我政府欲占台湾近旁之清国所属岛屿云云,对我国心怀猜疑,我国已屡遭清政府之警示。此时若公然骤施立国标诸策,则易为清国所疑。窃以为目下可暂使其实地勘察,细报港湾之形状及有无开发土地、物产之望,建立国标、开发诸事可留待他日。”^[8]因此日本在表面上暂缓了其窃占钓鱼岛的计划,直到1895年日本在甲午对华侵略战争中获胜,通过《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岛,而附属于台湾的钓鱼岛则被日本划入冲绳县管辖。1945年日本战败,冲绳被美军直接托管,钓鱼岛则被美军当成靶场使用。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内容,钓鱼岛本该像台湾一样回归祖国的怀抱,但战后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从压制到扶持的180度大转弯。1951年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片面对日媾和,却将中国(包括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和苏联排除在外。1953年由美国直接管理的琉球当局将其“施政范围”擅自扩张到钓鱼岛。1971年冲绳结束托管,美国本欲将钓鱼岛计入冲绳群岛之内直接移交给日本,日本也趁机借势配合,大造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的舆论声势。日美在钓鱼岛问题上狼狈为奸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全球华人的强烈抗议,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由此展开。中国政府也在第一时间关注到了钓鱼岛的地位及权属问题。1970年12月,新华社、人民日报纷纷发表评论员文

章,强调“台湾省及其所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在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9]美国见状不再提钓鱼岛的主权移交,玩起了其向日本移交的只是对钓鱼岛的“施政权”即行政管辖权的诡辩措辞,但其并未真正改变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私相授受的实际行为。自此广大海内外爱国人士开始了以“登岛”为主旨诉求的前赴后继的保钓行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在正式场合多次表达了对日本窃占钓鱼岛行为的严正抗议。2010年9月,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了一艘中国渔船,并将船长押到日本审判。此后,中国的渔政和海监力量开始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常态化的护渔巡航。2012年9月,日本野田政府悍然颁布了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法令,再次激化了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矛盾。中国海监护航编队加强了对钓鱼岛的巡航力度和频次,以实际行动打破了日本声称的其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与此同时,中国加强了以法律手段维护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的力度,在积极开展对钓鱼岛的常态化巡航与监控的同时,公布了钓鱼岛的领海基线并划定了12海里的领海范围,同时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外大陆架划界申请,从而将钓鱼岛的主权议题及东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推向了以法律武器为斗争手段的新高度。

2. 中国对钓鱼岛享有无可辩驳的主权依据

首先,从国际法上领土的先占取得的角度上讲,日本有意混淆“无人地”和“无主地”的本质区别。日本声称,其“发现”了钓鱼岛,因此对钓鱼岛享有主权的依据是先占,因为日本曾反复确认过,钓鱼岛上没有清朝统治过的痕迹。然而,无人地未必一定无主,在传统国际法上,只有无主地才能适用领土的先占取得。钓鱼岛的自然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但这不妨碍其权属有主。最早发现钓鱼岛的中国人要比最早发现钓鱼岛的日本人早400多年。根据中国史籍的记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发现时间不会晚于明初,甚至有可能更早。另一个证据也可以证明日本所谓的“发现钓鱼岛”的主张根本站不住脚:在1900年前,日本对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早期纪录,均采用的是中文名称,其中主岛钓鱼岛被称为“鱼钓岛”(Uotsuri),其余群岛亦采用“赤尾屿”、“黄尾屿”等中文名称。现在日本对钓鱼岛冠以“尖阁列岛”的日文称谓,实际上最早是来源于1884年英国海军在形容钓鱼岛诸岛一带的礁石时,所首次采用的“Pinnacle Islands Group”(尖阁岛群)一词。这

种称谓在1900年被日本冲绳县师范学校一位名叫黑岩恒的教师翻译成日文“尖阁列岛”(Senkaku Retto),但直到1950年代,日本外交部在“日本外交文书”中才首次将尖阁列岛确定为日本对钓鱼岛的官方称谓。^[10]

其次,日本不认为钓鱼岛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其主权移转与1895年日本从清朝手中割占台湾不同;《马关条约》全文无一处提到钓鱼岛。日本还认为,台湾在日据时代归日本驻台总督府管辖,而钓鱼岛则归属于日本本土的冲绳县石垣市。显而易见的是,日本这一条论据还是以所谓“钓鱼岛是无主地”的说法为基础的。日本声称钓鱼岛是“无主地”的另一条理由是其内阁于1895年1月14日所通过的内阁秘密决议,决定在钓鱼岛建立国标并正式划入日本版图。但根据国际法上主权的自然转移理论,主权自然转移的前提,必须为“和平而稳定”,同时必须对外“公开”其占据行为。日裔学者Unryu Suganuma就指出日本政府占领时通过的是秘密决议,并未公开颁布占领钓鱼岛的法令,这就难以说服国际社会相信1895年后中日两国关系是处于“和平而稳定”的状态。在1885年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给冲绳的复函中,也多次强调古贺辰四郎的事件“勿让传媒得悉”。

综合上文所述,无论是地理、历史论据还是法律论证都可以说明,中国对钓鱼岛享有无可辩驳的主权,日方各项主张无论是从历史依据上还是从法理依据上都十分匮乏。

3. 钓鱼岛主权归属对东海大陆架划界的影响

钓鱼岛的主权历来毋庸置疑属于中国,但现为日本所非法控制。钓鱼岛问题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议中并不具有全局意义,但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向来是国际法上所有国家间争议问题中最基本最首要的问题。更何况东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直接牵涉到我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因此钓鱼岛问题的存在,也将不可避免地给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由于中国向来主张冲绳海槽构成了中日大陆架的天然边界,而日本则认为中日是大陆架共架国,冲绳海槽仅构成中日两国相连大陆架中的一个偶然凹陷,并且强烈坚持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原则应以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为首要基准。但冲绳海槽附近的地质地貌形态无疑是日本主张的一大硬伤。因此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把希望寄托在它对于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上。日本相信,因为钓鱼岛位于冲绳海槽以西,如果日本能顺利获得对钓鱼岛的主权及实

际掌控,那么日本就可以以钓鱼岛为基点,在冲绳海槽以西划出大面积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就意味着中日确实是东海大陆架的共架国,自然延伸的划界原则就不能得以顺利适用,从而大幅度削弱中国关于其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的观点。但中国与欧美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各岛因淡水不足、泥土不厚、风浪较大,不适合人类定居,为无人岛,不能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的规定,钓鱼岛只能享有内水、领海而不能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由此可知,无论钓鱼岛的最终主权归属如何,其对东海海域的整体划界工作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理当忽略不计。因此,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与东海大陆架的整体划界脱钩,并在中日两国的东海大陆架划界谈判中对其采以“零效力”的处理方式是比较妥当的。这既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相契合,同时也有助于东海大陆架划界谈判工作的实际推进。

三、中日关于东海大陆架划界的主张比较

公平原则作为一项得到普遍承认的大陆架划界基础原则,是大陆架划界的首要原则,同时也是指导性的原则。^[11]它产生于国际实践。该原则最早是由美国发表的《杜鲁门公告》提出的,它指出:如果大陆架延伸到其他国家的海岸或者是与其他国家共处于同一大陆架,那么应与其他相关国家依据公平原则来确定边界界限。^[12]此后,国际法院通过北海大陆架案、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原则。^[13]无论是从公平原则刚提出来时所体现的理论精髓被人认可,还是其后有关国际法院判例中的适用,均表明公平原则拥有合乎事物逻辑和规律的正确性以及无可比拟的实际操作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3条第1款指出:“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线,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3]公平原则并非指表面上的形式意义上的、绝对的公平,公平原则的核心内涵乃是追求公正的划界结果。^[14]为此,大陆架划界公平原则,是指相邻或相向国家间的大陆架划界,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依据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并考虑一切相关情况,选择适用恰当的方法,以取得公平结果为目的。^[15]而分配结果的平等是大陆架划分界限的核心内容,同时它也可以指对合理差异的普遍确认并在

此基础上对效果平等的追求。自然延伸是公平原则考虑的一大重要考量因素。自然延伸原则也是海洋划界重要的依据,它同样也来源于《杜鲁门公告》,该公告指出,“大陆架可以被认为是沿海国陆地领土的延伸,因而自然属于它”^[16]。而在之后的北海大陆架案件的判决中,国际法院通过最终的判决书具体阐述了这一原则。^[13]

1. 中国的东海大陆架划界主张及法理依据

中国认为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和自然延伸原则,以冲绳海槽作为两国间划分大陆架的天然界限。中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大陆架自然延伸的规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确立了自然延伸原则。1998年6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关于划界原则,该法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在海洋划界问题上坚持公平原则。“我国与海岸相邻或者相向国家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是重叠的,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界限”。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属经济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200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至大陆边外缘的距离不足200海里,则扩展至200海里。”

中方主张的冲绳海槽是两国间的大陆架界限是有国际法依据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第76条第5款规定:划定大陆架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线各定点,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应超过连接2500米深度各点的2500米等深线100海里。^[3]由此可以看出,大陆架的划界标准深度为2500米,而冲绳海槽的深度为2940米,是当然的中国大陆架与日本琉球群岛岛架之间的分界线。按照这个原则,冲绳海槽应当作为两国间大陆架划界的天然界线。在2012年11月中国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所提交的超过200海里的大陆架划界申请案中,中国也继续坚持冲绳海槽和自然延伸原则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2. 日本的东海大陆架划界主张及其无理性

日本则坚持最早源于1958年《大陆架公约》所采用的等距离中间线划分方法。《大陆架公约》第6

条第1款和第2款对大陆架划界做出以下规定：“同一大陆架邻接两个或两个以上海岸相对的国家时，则分属各有关国家的大陆架的界限由这些国家协商决定。如无决定，除根据特殊情况可以另定界线外，分界线应采用每点均与划定各国领海宽度的基线最近点距离相等的中线”；“同一大陆架邻接两个领土相邻的国家时，其界线应采用每点均与划定两国中领海宽度的基线最近点距离相等的中线”。^[17]日本依照上述规定，制定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确立了“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作为同相邻国家之间海洋划界争端的指导性原则和划界方法。在中日之间的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单方面拟定出了一条中间线，以此作为两国间大陆架划分的界线。

然而，1958年《大陆架公约》中虽然规定了等距离中间线的划分方法，但是它绝不是唯一的首要的划分方法，等距离中间线划分方法必须考虑其他因素才能适用。因为《大陆架公约》规定两国的划界争端首先应当通过协商解决，其次还必须考虑特殊情况，这里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指与地理相关的因素，最后才是采用等距离中间线划分方法。

在1982年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大会上，单一的等距离中间线划界方法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大会所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文本对1958年的《大陆架公约》的大陆架划界规则进行了修正，指出等距离中间线只是划分海洋界限的一种方法，不应把它视为必须采取的方法，更不应把这种方法确定为必须和首要采用的方法。海洋划界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公平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采用等距离中间线的方法能够达到公平合理的划界结果时，有关国家可以通过协议加以使用。但反对在有关国家未达成划界协议前单方面将中间线或等距离线强加于另一方”。^[3]等距离中间线原则虽具有确定性，但它只是从属于公平原则的一种划界方法。在大陆架划界问题上，之所以应以公平原则为最高标准，就是为了避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采用等距离中间线划分方法来划界而产生结果不公平。

就中日两国间的划界争端来讲，仅使用等距离中间线方法是不妥的，因为两国间的海岸线存在差异，冲绳海槽就是存在的特殊地理因素。摒弃其他因素仅采用中间线划分，一定会导致出现不公平的结果，不能只是为了方便而简单地采用中间线的划分方法。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并非1958年《大陆架公约》的签署国；而且即使是适用1958年

《大陆架公约》的规定，采用等距离中间线划界方法划定东海大陆架的边界，也必须首先经过中日两国的平等协商，而绝不是任由日本将其单方面划定的“中间线”强加给中国。对于日本所主张的等距离中间线划分方法，中方在1978年4月的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明确表示：“等距离线中间线只是划分海洋界线的一种方法，不应把它规定为必须采用的方法，更不应把这种方法规定为划界的原则。海洋划界应遵循的根本原则，应该是公平原则。”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公平原则的视角下，日本所谓的“中间线”是一条漏洞百出的“非法线”。

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紧咬大陆架划界“中间线原则”不放的最重要原因是：东海大陆架存在丰富的油气资源。从地理学的角度讲，大陆架有丰富的光照和陆地河流带来的营养物质，本来就是海洋生物良好的栖息地，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岛国，其自然资源极其匮乏，但是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工业极度发达所需的能源又极多，其能源严重依赖进口，而作为日本主要进口地的中东，局势又越来越不稳定，因此日本极力扩展其在东海的权利，分一杯羹。这也正是日本极力要将其海洋边界（包括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向西推进的原因。

四、解决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可行办法探讨

1. 以法律手段解决东海大陆架划界争议

东海大陆架的划界争端从很大程度上与东海丰厚的能源经济利益分配问题有直接的关联。因此在实践中，将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东海油气开发问题相分开，不仅务实可取，有利于将法律属性成分更高的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从其他性质的东海争端中剥离，同时也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以及其倡导以法律手段解决海洋划界争议的精神。解决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法律形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通过划界谈判缔结双边条约。2008年6月18日，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了《东海问题原则共识》，这也是两国划界谈判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协商成果。但从法律性质来说，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性质的政治协议式安排，而非正式的海洋划界条约或协定。正式的海洋划界双边条约需要通过更加严格的划界谈判程序才能完成。首先是谈判的目的必须明确和公开，以缔结正式的划界条约为最终目标；其

次是双方的谈判代表需要有国际习惯法上所公认的国家授权。在此基础上,为实现最终划界条约的签署而进行的双边谈判,还需要经过十余轮甚至是数十轮的递进式谈判程序才有可能最终完成。而在条约书面文本最终形成之后,尚需两国国内权力机关的批准和核准,才可正式确定双方之间的法定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可见,以缔结正式的双边条约为目的的海洋划界谈判,其程序将十分延宕复杂,对于各种矛盾盘根错节的东海划界问题更是如此。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日两国在短时间内将很难就东海划界问题缔结正式的双边书面条约。

其二,递交国际司法机构裁决。将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递交权威性的国际司法机构加以审理和裁决,如国际法院、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国际海洋法庭或国际常设仲裁院等。与进程久拖不决的双边划界谈判相比,该形式能够较为有效地做到排除政治因素对法律进程的干扰,使争议双方多年的困扰化为无形。但以司法形式解决东海划界问题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对于中日之间的东海划界争端并没有强制性或任择性的管辖权,而且一旦国际司法机构的审理结果对于争端一方不利,如何面对不利一方的政治反弹及其国内民意的压力,这对于从未有过将双边争议提交到国际司法机构的东亚各国来说,也是一大考验。因此,在目前中日双方都不接受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情况下,试图以司法途径争取双方争议一劳永逸的解决,也将十分困难。

从法律形式上来看,海洋划界争端解决方式中最好的可能就是双方达成协议,共同提交国际法院裁决。但是这一种方式的弊端就是耗时长,并且可能得出的结果令双方都不会满意。但是,以法律手段如能解决东海划界问题,这对于双方而言都将产生确定的约束力,并且可以使耗时日长的东海划界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2. 解决东海大陆架上油气资源开发问题的相关方案

(1)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若干可行方案

中方在2005年首次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论观点在东海资源开发问题上的具体落实方案,希望同日本一起合作,共同开发东海的油气资源。但日本利用两国对话与谈判的场合,不断采取各种会外伎俩和无理纠缠的策略,企图以“共同开发”的名义诱使中国承认其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所提出的片面主张。尽管如此,中方提出的“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原则仍然具有形成若干可行方案的参考价值。其中包括如下几种选择:其一是将东海共同开发区分成两部分,双方各自采用本国法律在其中一个分区块进行管辖;其二是两国共同管辖东海共同开发区;其三是由作业者的国籍国实行属人管辖。^[18]

在上述3种可供参考的方案选择中,第1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行性,实践中曾有过泰国与马来西亚分区块达成合作管辖安排的先例,但中日接受这种方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此一来,双方将陷入如何划分“区块”的细节争论,从而困扰两国谈判的进程。第2种方案是在共同开发区内组成一个类似于超国家的管理机构,由双方在其中派驻同等数目的代表委员,在共同开发区内适用统一的法律制度。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倘若中日两国能有足够的耐心和诚意对此达成一致,该种方案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一种选择。但就其现实可行性而言,其被最终采纳的可能性很低,盖因制订一套与两国原有法律均不相同、单独适用于东海共同开发区块内的全新法律制度,是一项既消耗时间和精力,又亟须双方拥有相互妥协的足够远见和智慧的过程。这对于因2012年钓鱼岛争端而跌入谷底的中日关系而言,显然是很难实现的。相对而言,第3种方案,即由作业者所属国对位于东海共同开发区内的作业者进行属人管辖,应是最为现实的选择路径。这种方式清楚且简单易行,对于双方来说都可获得平等适用法律的机会,在实践中已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19]

(2)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案解决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利弊分析

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可行性的,是迄今解决东海大陆架上有关油气争端最好的方案之一,其理由如下。

首先,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中东局势的日趋紧张和动荡,石油资源也不再仅仅依赖从中东进口,各国面临着本国经济发展迅速、油气资源消耗巨大的情况,尤其是中日两国。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均在努力拓展本土的油气资源,东海的油气资源争端也由此而产生。但是,两国间的僵持不下,最终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谁也不能开采到东海的油气资源,谁也不敢轻易踏出第一步;而如果采用“共同开发”的提议,则两国都可以利用到东海的油气资源。

其次,在海洋上开采油气资源是一项投资巨大、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中日两国在海上油气资源

的勘探上各有优势和劣势,如果双方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那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合作,利用对方技术等优势共同开采东海油气资源,从而达到共赢。

最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如今双方僵持不下尴尬局面的最好方式,通过相互合作,利用彼此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取得稳妥的实惠利益,同时也可以避免采用诉讼方式所带来的耗时长等弊端。^[20]

但在中日东海争端的相关谈判中,如果我方不重视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法律属性研究,而是一味着重于各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案,则有可能步入误区。由于政治方法具有秘密性和不稳定性^[21],因此以政治方法所达成的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谊之海”的明确共识,既需要双方尤其是日方的谈判诚意,也需要日方的执行诚意。但现实情况是,日本往往借政治谈判的场合,屡屡提出过分要求,不断得寸进尺,甚至阻挠中国在日本单方面划定所谓“中间线”以西的无争议海区的资源勘探与活动。如:日本频频干扰中国对春晓油气田的开采活动,频繁派出飞机和舰船到春晓油气田附近进行拍照和监视,还利用谈判的场合不断混淆视听、横生枝节,企图在“中间线”以西及靠近上海、浙江的东海海域分一杯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和东海大陆架界限的划定对于中国意义重大,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坚持原则,在关键的场合加强法律途径的运用能力,而不能单纯为了所谓的“灵活性”图一时政策性协议的达成,从而轻易在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更不能毫无原则地混淆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实质区别,盲目地与日方搞共同开发区,从而在日后增添中方在运用国际法手段维护国家利益时的困难。笔者相信,中日东海划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在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实力以及中国以实力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中国需要在今后的东海划界谈判中更为成熟地运用法律手段、创制适用于东海海域的有关国际法规则,并以此来确保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最终圆满解决。

五、结语

综上,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工作不仅事关东海资源的开采与分配,同时还与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有极大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除经济发展和能源战略安全的需要之外,东海的海洋划界进展还牵涉到台湾问题这一核心国家利益。^[22]尤其是“东海非沿

岸国的沿岸国”美国对东海问题的幕后插手,更是增添了东海划界问题的复杂性和发展走势的不确定性。从巩固我国海洋国防的总体安全形势来看,东海海域的大陆架划界问题有助于明晰中日东海争端的全景。因为在中国所面临的紧迫海洋形势中,东海问题虽未必如南海问题那么复杂,但与南海声索国相比,与我国发生东海划界争议的是国力与中国最为接近的强敌日本,韩国在东海东北部直至冲绳海槽部分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旦在东海海域发生武装冲突,我们也绝不能排除美国以美日军事同盟者身份介入的可能性。可以说,东海划界问题未必是中国所面临的海洋权益纷争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但一定是解决难度最大、有可能延宕时间最长的问题。广袤的海洋本就是中国人最不熟悉的战略领域,而21世纪又是海洋的世纪,开发利用海洋已成为21世纪的现实和迫切需要,因此,国家对于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重视程度必须提高到长远战略的高度。深入海洋、探索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利用海洋,对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早就是一项长期国策,而对于以海立国的日本而言更是如此。日本民族向来以准备细致和充满危机感著称,对于其海洋利益的关注更是未雨绸缪。尽管日本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许多主张不具有合理性,在法理论据上也是极其匮乏的,但日本在边海问题上的“先知先觉”和细致缜密的筹划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并认真加以研究,反过来这也更加凸显了我国所面临的海洋维权问题的极端紧迫性。我国既是拥有漫长海岸线的海洋大国,又是海洋地缘环境相当不利的半封闭海域国家。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我们都没有理由不去重视我国所面临的紧迫边海形势,我国所面临的几个海域都与我国的国防战略关系密切,而海洋的安全和开发使用,也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海洋问题的回避与忽视,自近代以来已给我国带来了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如今,中国海洋意识正处于觉醒中,海洋国土观亦正逐步深植于国人心中。现在就切实重视海洋,改变“重陆轻海”的固有思想观念,增强海洋意识,尚为时不晚。强于世界者必胜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败于海洋。所以说,对于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我国的决策者必须具有全球博弈的视野,从战略意义与价值的高度来全面认识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对于我国的重要性,积极运用法律手段来确保该问题的最终圆满解决。

[参 考 文 献]

- [1]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Limits of Oceans and Seas[Z]. 3rd ed. IHO-Publications No. 23, 1953:31.
- [2] Evans Malcolm D. Relevant Circumstances and Maritime Delimitati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56.
- [3] 百度文库.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EB/OL]. (2013-03-26) [2013-07-10]. http://wenku.baidu.com/view/of_be710de87101f69f31-9503.html.
- [4] 王虎华. 国际公法学[M]. 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93.
- [5] Feulner G R. Delimita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jurisdiction between states: The effect of physic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natural continental shelf[J].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6:113.
- [6] 肖建国. 东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历程回顾[C]//高之国, 贾宇, 张海文. 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5:108-115.
- [7]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M].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6:24-25.
- [8] 张海文. 中日东海争议所涉及的主要海洋法律问题[C]//高之国, 贾宇, 张海文. 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5:116-120.
- [9] 《人民日报》评论员. 决不容许美日反动派掠夺我国的海底资源[N]. 人民日报, 1970-12-29(11).
- [10] 马英九. 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岛与东海划界问题[M]. 台北: 正中书局, 1986:128-129.
- [11] 张卫彬. 公平原则及相关情况规则探讨——兼析中国东海大陆架划界基本主张[J]. 当代亚太, 2010(1):147.
- [12] 杨光坤. 大陆架划界之公平原则的产生与发展[EB/OL]. (2012-09-17) [2013-07-10]. http://www.qstheory.cn/lg/clzt/201209/t20120917_182032.htm.
- [13] 李超. 论大陆架划界公平原则——兼划界问题在公平原则下的考察[J]. 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3):3.
- [14] 傅岷成. 中国周边大陆架的划界方法与问题[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3):5.
- [15] Kolb Robert. Case Law Equitable Maritime Delimitation: Digest and Commentaries[M].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40.
- [16] 高健军. 国际海洋划界论——有关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的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32.
- [17] 国际法委员会. 大陆架公约[EB/OL]. (2013-07-10) [2013-07-10]. <http://www.un.org/chinese/law/ill/contin.htm>.
- [18] 余民才. 国际法的当代实践[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68.
- [19] 肖建国. 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06:150.
- [20] 季国兴. 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两种制度及中日东海划界[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5):14.
- [21] Prescott Victor, Schofield Clive. The Maritime Political Boundaries of the World[M].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43.
- [22] 顾兴斌, 章成. 论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J]. 南昌航空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3):6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5-0060-07

在线解决纠纷机制的基本制度研究

——基于民事诉讼对应制度的比较

郑世保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新型的网络民事纠纷催生了在线解决纠纷机制(ODR)。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价值是依靠“屏对屏”的方式,便捷、便宜、高效地解决纠纷。ODR的价值定位与理念预设和诉讼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二者的运行机理有很大的差异:ODR机制中回避的对象范围较窄,需要回避的情形较少,回避的重要性较弱;ODR机制中ODR网站和裁决人一律实行无因回避;ODR机制的裁决过程无法向普通网民公开,民事诉讼公开审判的核心价值无法在ODR机制中移植;ODR机制中应大力推广运行裁决方式,其裁决结果应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基础上尽可能详细公开;ODR当事人在审判组织的构成上仅具有相对的权利;ODR机制实行独任制为主、合议制为例外的原则,无需陪审制度;ODR机制可以借鉴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发现程序的做法选派裁决人或者由ODR系统管理员来主持完成该发现程序。需要说明的是,ODR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而仅仅是当事人面对网络民事纠纷时的另一种选择。随着对网络认识的加深,网络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会更加多元化。

[关键词] ODR;回避制度;公开裁判制度;审判组织制度

[中图分类号] DF7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10

有人的地方必然有纠纷。网络诞生以后,人类的足迹由实体的物理世界拓展到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在网络世界里,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各类网络民事纠纷呈快速增长趋势。而绝大多数网络民事纠纷的标的额较小、当事人之间的物理距离相对遥远,用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来解决这类网络民事纠纷将会遭遇“会面成本高于标的额”等尴尬。为应对网络民事纠纷对诉讼和ADR所带来的挑战,美国人开始尝试利用网络资源来化解网络民事纠纷,以实现“网上纠纷网上解决”的设想。^[1]1996年春季3个试验性的解决网络民事纠纷的网站(The Virtual Magistrate Project、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Online Mediation Projec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Online

Ombuds Office)正式运行。这些网站解决纠纷的程序大致为:裁决者在网络上建立一个网站,申请人先把自己的“起诉书”通过网络“起诉”到该网站,网站把该“起诉书”通过网络“送达”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通过网络提交“答辩状”。纠纷解决的其他程序如证据的提交、证据的认证、质证、开庭、合议、判决书的送达等,也依据网络信息技术主要在网上完成。^[2]这种利用网络资源来化解纠纷的机制就是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英文缩写为ODR,译为“在线解决纠纷机制”。

ODR的出现是民事纠纷解决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人类由物理世界的“面对面”纠纷解决方式向虚拟世界的“屏对屏”(当事人双方以及裁决人、证人等均在电脑屏幕前)的纠纷解决方式的

[收稿日期] 2013-08-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FX063);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12SFB2031);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郑世保(1969—),男,河南省光山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转变。纠纷解决环境的巨大变化势必导致 ODR 与民事诉讼在纠纷解决原则、制度、规范以及其背后的理念等方面出现诸多差异。本文拟选取 ODR 机制中的 3 项基本制度——回避制度、公开裁判制度、审判组织制度——展开研究,以民事诉讼的对应制度作为参照物,从二者对比中展示 ODR 机制在这 3 项基本制度上的个性。

一、ODR 的回避制度

ODR 机制实质上是依靠网络资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化解纠纷,因此 ODR 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利用网络的便捷性在世界各地海选 ODR 裁决人。而当事人、裁决人等 ODR 主体之间的交流也主要依靠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电子聊天室、语音设备、视频设备、网站系统软件等网络信息技术工具。^[3]显然 ODR 这种虚拟环境下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回避制度上自有特色。

1. ODR 回避制度的具体内容

与民事诉讼的回避制度相比较,ODR 的回避制度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一是回避的对象范围较窄。ODR 是一个快速、廉价、高效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检察院不参与;ODR 一般通过网络把专业技术人员聘为裁决人,因此 ODR 机制中无需鉴定人;ODR 纠纷解决资讯的记录一般是通过信息技术工具来完成的,因此书记员的回避情形也不存在;由于 ODR 网站大多数情形下要求当事人提交指定语言的书面文件进行书面审理,因此 ODR 翻译人员的回避情形也很少。这样 ODR 机制的回避对象一般仅仅是 ODR 网站和 ODR 裁决人。二是需要回避的情形较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44 条的规定,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因而必须回避。由于 ODR 的裁决人系通过网络在世界各地海选,因此 ODR 裁决人虽然也可能在民事诉讼法第 44 条规定的回避之列,但是这种情形并不常见;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很少由于经济原因回避,而 ODR 机制中的 ODR 网站由于经济原因最有可能需要回避。三是回避的重要性较弱。在民事诉讼中回避是一个重要的程序保障内容,“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而没有回避的”是再审的一个理由。但是在 ODR 机制中由于当事人、裁决人之间距离遥远,裁决人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有亲属、经济、同学关系的可能性很小,因此 ODR 机制回避的重要性较弱。研究 ODR 回避的学术文献很少,而且实务中关于回避的 ODR

规范非常鲜见。如:2006 年 3 月生效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就没有关于 ODR 回避的规定;2009 年 5 月生效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网上仲裁规则》也没有相关规定。

2. ODR 回避制度的完善

(1) ODR 网站的回避

在民事诉讼中有时也需要法院的回避,这种回避是通过指定管辖或者管辖权转移等管辖制度实现的,而 ODR 机制中 ODR 网站的回避具有自己的个性。

关于 ODR 网站需要回避的情形。由于 ODR 系在虚拟环境中解决纠纷,ODR 网站和当事人在物理距离上具有遥远性,因此由于亲属关系和其他关系导致 ODR 网站回避的可能性较小,在实务中导致 ODR 网站回避的一般是经济关系。ODR 网站除了政府、民间社团设立的公益性 ODR 网站外,大多数是商人设立的企业法人,即以提供纠纷解决服务为内容的服务型企业法人。运行一个 ODR 网站,成本包括服务器租金、主机租金(或电脑设备购买费用)及维养费用、宽频连线费用、纠纷解决软件购买费用以及调解人或仲裁人的劳务费用等。向当事人收取“诉讼费”是 ODR 网站运营费用来源之一,但是网络民事纠纷所涉及的标的额往往不大。如果 ODR 收取的“诉讼费”超过了纠纷对象本身的标的额,那么当事人势必不使用 ODR 机制来解决其纠纷;而如果 ODR 网站收取低廉的“诉讼费”甚至免费,则又无法平衡 ODR 网站的运营成本。于是 ODR 网站向网络企业靠拢,寻求网络企业的赞助以解决其经济困境。^[4]而接受网络企业赞助的一个恶果就是:当该赞助企业成为 ODR 当事人时,人们就会对 ODR 网站的中立性产生怀疑,事实上实务中 ODR 网站向赞助企业低头让步的事时有发生。一个典型案例是:2 位纠纷类同的 eBay 顾客向 eBay 指定的 ODR 网站 BBBOnline 和 TrustE 同时申请纠纷解决,这 2 家 ODR 网站先后做出了裁决书,而 BBBOnline 的裁决书更利于顾客而不利于 eBay。eBay 威胁 BBBOnline 说,如果 BBBOnline 不改变其裁决书,eBay 将退出 Privacy Seal Programs 标章,不再向 BBBOnline 缴纳会员费。出于经济上的压力,BBBOnline 被迫向 eBay 低头,并最终做出了有利于 eBay 的裁决结果。可见,当事人申请 ODR 网站回避是有必要的。

关于 ODR 网站经济问题回避的具体落实。中立性原则是现代程序包括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的基本原则,是程序的基石。^[5]ODR 网站也必须独立、中立,不能与任何利益团体有不当的挂钩或瓜葛,否则

就可能危及其中立性。^[6]因此 ODR 网站必须远离使他人对其中立性产生怀疑的资金。关于 ODR 网站接受企业赞助资金产生的回避,笔者提出如下两条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是加大 ODR 网站回避的严格性。ODR 网站应在其官网上明文公示其资金来源,一旦赞助企业成为 ODR 当事人,则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该 ODR 网站无因回避,由当事人协议选取另一家 ODR 网站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ODR 网站发现此种情形时也可以主动回避,退出对该案件的裁决,建议当事人协议选取另一家 ODR 网站来解决纠纷。

二是解决 ODR 网站资金压力,彻底根治 ODR 网站回避的经济诱因。现行的免费 ODR 网站其背后多有政府资金支持或社会公益资金的资助,如 ECODIR 是由欧盟执行委员会及爱尔兰的企业、贸易与劳工部共同予以经费支持的。如果由社会来提供 ODR 网站的运营资金,则其中立性就不会由于经济原因而受到怀疑,从而不需要由于经济原因申请该网站回避。在 ODR 实务中由社会来提供 ODR 运行资金的 ODR 网站很少,所以解决 ODR 网站资金困境的最有可能的办法还是由 ODR 网站设立企业会员,收取赞助企业的会员费。为解决企业赞助资金进驻 ODR 网站后产生的 ODR 网站的中立性受到怀疑的问题,应该针对 ODR 网站的中立性设置内部及外部控制机制,如消费者团体当选董事或是有公正机构定期监督^[7],以使网民对 ODR 网站的中立性产生基本的信任。

(2) ODR 裁决人的回避

由于 ODR 裁决人是在虚拟环境中解决纠纷的,ODR 裁决人虽然存在回避情形的可能性不大,但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回避的情形。ODR 裁决人是利用网络对世界各地专业技术人才进行海选的结果^[8],ODR 裁决人与一方当事人间存在亲属关系、经济关系、其他关系等需要回避的情形很少,故 ODR 裁决人的回避是一个备受忽略的问题。《财团法人台湾网络信息中心网域名称争议处理办法实施要点》对此做出了提示性的规范,该《实施要点》第 7 条规定,专家于接受选定前或处理程序进行中,如有可能影响其公平性与独立性之理由,应立即向争议处理机构说明,争议处理机构应指定替代人续行程序。其对于 ODR 裁决人需要回避的具体情形、提出回避的时间、回避的决定权、回避的能否复议等程序均没有规定。

关于 ODR 裁决人回避的具体落实。针对 ODR 机制中裁决人回避存在的“立法”空白,笔者提出以

下措施以落实 ODR 裁决人的回避。一是科学地确定 ODR 裁决人回避的方式和程序。为了增加当事人对于 ODR 裁决人的信任,ODR 裁决人的产生应以当事人合意选择为主,如果当事人无法取得合意,才能由 ODR 系统软件随机选取或者由 ODR 网站指定。另外,笔者建议,对于 ODR 裁决人的回避一律实行无因回避,由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报 ODR 网站备案后立即终止裁决人裁决某个案件的资格;当事人申请 ODR 裁决人的回避和 ODR 网站做出的“同意该裁决人回避”的决定,均可以采取电子书面的形式;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后该 ODR 裁决人应立即停止本案的工作,除非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ODR 裁决人回避以前所进行的工作是否有效,由新的 ODR 合议庭(或独任裁判员)决定。二是详细公示 ODR 裁决人的相关资料。虚拟世界中的 ODR 裁决人的权力更容易被滥用^[9],再加上人们对于虚拟环境中裁决人的天然不信任,必须针对虚拟环境中的 ODR 裁决人设计一种制度,以确保 ODR 裁决人的中立性地位不会被动摇,并使网民能够“看得见” ODR 裁决人的中立性。这些制度主要包括 3 个方面。(1) 裁决人身份的详细介绍。在 ODR 网站上详细介绍裁决人的身份,包括专长、教育经历、工作经历、ODR 培训经历等,特别是该裁决人从事工作的经历(笔者访问的几个中文 ODR 网站,均没有达到这方面的要求)。这些详细信息的公布为当事人申请回避提供制度上的保证。(2) 裁决书的公布。ODR 的裁决书应当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基础上或者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在 ODR 网站上予以公布,以接受社会的监督,也迫使裁决人在裁决 ODR 案件中保持中立公正。(3) 裁决人的评分系统。设置一个评价系统,由当事人对 ODR 裁决人予以打分,如果一名裁决人长时间地被多名当事人打了很低的分数,这就应该引起重视,需重新考量其是否具有担任裁决人的备选资格。

二、ODR 的公开裁判制度

民事诉讼中公开审判指的是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向群众公开、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对象包括向当事人公开和向社会公开两个方面,公开审判的核心内容则是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的对社会公开^[10]。而 ODR 机制系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解决,解决的一般是小额的网络民事纠纷,通常情形下采取电子书面审理,只有当事人申请了才采取网上开庭审理。因此 ODR 机制的公开裁判制度也有自己的特色。

1. ODR 公开裁判制度的具体内容

与民事诉讼的公开审判制度相比,ODR 的公开裁判制度具有以下明显特征。第一,ODR 的裁决过程无法向网民普遍公开,只能向当事人公开。由于网络科技水平的限制以及案件裁决的需要,ODR 的裁决过程只能向当事人公开,无法向网民普遍公开,也即 ODR 的裁决过程不存在向社会公开的问题。即便是当事人,也只能凭借注册账号和密码进入 ODR 程序中。当事人只有进入 ODR 裁决程序以后,所有资讯特别是关于纠纷解决过程的电子记录才能随时向当事人开放。第二,民事诉讼公开审判的价值预设无法在 ODR 机制中兑现落实。根据民事诉讼经典理论实行审判公开,可以使法院的审判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可以带动辩论、回避等各项制度的执行;可以密切法院同群众的关系,增强审判人员的责任感;可以充分发挥审判的教育作用等。^[11]由于 ODR 的裁决过程无法向网民普遍公开,所以民事诉讼公开审判的这些价值预设无法在 ODR 机制中兑现落实。第三,ODR 实行电子书面审理为主、网上开庭审理为例外的原则。为了实现 ODR 机制的便捷、便宜、高效的价值预设,在 ODR 机制中一般是依据当事人双方提交的电子文件进行书面审理,在例外情形下才可能在网上开庭审理。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第 33 条规定:正常情况下,域名争议解决程序不举行当庭听证(包括以电话会议、视频会议及网络会议方式进行的任何听证),但专家组认为有必要举行且当事人愿意承担相关费用的除外。第四,民事诉讼中不公开审判的案件在 ODR 机制中很少遇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34 条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法院不公开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也可以不公开审理。这些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在 ODR 机制中基本不会遇到:由于离婚案件和个人隐私案件均涉及到身份关系,其证明标准较高,故此 ODR 很少受理解决这类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更不可能由 ODR 机制受理解决;ODR 机制最可能受理的案件只能是涉及到商业秘密的案件。总之,由于在 ODR 机制中审理过程不对社会公开,严格地讲 ODR 机制对案件的审理均是不公开审理。

2. ODR 公开裁判制度的完善

迳行裁决方式应在 ODR 机制中大力推广。在 ODR 机制中,实行电子书面审理为主、网上开庭审理为例外的原则。如《财团法人台湾网络信息中心

网域名称争议处理办法实施要点》第 13 规定:争议处理之程序,以书面审理为原则。但专家小组认为有必要时,不在此限。该《实施要点》第 19 条第 6 项规定:如专家小组认为有必要进行言词审理或其他程序时,在取得当事人同意后,收取所生之费用。此处所谓“必要时”,依据例外从严的法理解释,必须是专家小组从申诉人或注册人所提出之数据无从了解双方之争点,或双方对于争点在书面的叙述难以理解,专家小组即得以采用言词辩论之方式或其他之程序。^[12]不过鉴于实行网上开庭审理会减损 ODR 快速、高效的价值优势,笔者建议可以借用我国二审案件适用的迳行判决方式。迳行判决是介于书面审理和开庭审理之间的一种过渡方式,因为迳行判决仅仅需要询问当事人和证人。^[13]迳行判决这种审理方式无需严格程序的言词辩论,可由 ODR 裁决人与当事人就案情的争点,以一种询问、讨论的方式进行,可避免辩论方式的紧张,免除所有“诉讼参与者”共同参与程序的约束。只有在使用迳行裁决方式后仍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时,才可以适用开庭审理的方式裁决 ODR 案件。

ODR 信息的公开。事实上,ODR 在公开裁判制度的价值预设上与诉讼一样,均企图通过对纠纷解决过程和纠纷解决结果的公开来达到规制裁判者的目的。相较于民事诉讼,ODR 裁决人更需要监督约束,原因是,为了保证 ODR 机制高效、便捷、便宜价值预设的实现,ODR 机制赋予了裁决人在程序推进和证据收集上更大的权力。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网上仲裁规则》第 28 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可以在遵守本规则的前提下,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仲裁程序。第 31 条规定: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就案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向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物流配送公司及支付银行等机构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但是由于 ODR 无法通过公开裁决过程来对裁决者进行制约规范,因此必须创立 ODR 自我特色的公开裁决制度,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与纠纷解决的有关信息在 ODR 网站上予以详细公布,以保证当事人对于 ODR 网站和裁决人的提前监督。笔者认为,需要公开的有关信息包括以下几方面:(1)ODR 网站的信息。如 ODR 网站的合伙人、投资人、资金来源、隶属部门等关键信息必须在 ODR 网站上予以公布。(2)ODR 裁决人的信息。如调解人和仲裁人的资质、证书及经历、解决纠纷的领域专长、擅长的语言等。(3)ODR 纠纷解决的流程。如关于注册、进入 ODR 裁决程序的流程以及不会操作这些流程的辅导内容。(4)ODR 网站的

安保措施。如 ODR 网站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保障措施、ODR 纠纷解决资讯记录保存的方法以及使用的范围等。^[14](5) ODR 网站业绩的公布。如历年受理案件数、案件解决的成功率、处理案件的平均时间、裁决结果自愿履行的案件数、当事人不服 ODR 裁决结果向法院起诉的案件数、法院维持 ODR 裁决结果的案件数等。但是根据笔者的调研,这些需要公开的有关信息在绝大多数 ODR 网站上并没有公布。

ODR 裁决结果的公开。相较于民事诉讼审判结果的公开,ODR 裁决结果的公开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普通网民无法介入 ODR 的纠纷解决程序,容易导致舆论压力真空、程序参与者缺乏监督,最终导致 ODR 裁决结果的质量下降。作为弥补,在个案解决后,ODR 网站应该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基础上,在自己官网上把 ODR 裁决结果予以公开。关于 ODR 裁决结果在互联网上向普通网民的公开,在实务中落实得并不好。根据国际消费者协会(Consumers International)2001 年的调查,当年有 29 家 ODR 网站提供 ODR 服务,仅有 5 家对于其裁决结果予以公开。ODR 发展到今天,大多数 ODR 网站仅仅对于网站设立人、裁决人的资料以及案件受理数、成功化解案件数予以公布,而对于每个案子的裁决结果并没有公布。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纠纷解决中心就没有公布每个案子的裁决结果。但是有些 ODR 网站已经开始进行这些工作,如我国台湾地区解决域名纠纷的 ODR 网站——科技法律中心网站,在自己的网站上详细地公布了受理的每一件案子的当事人双方名称、裁决人、案情、裁决依据、处理结果、当事人是否向法院起诉(包括一审结果)、当事人是否向法院上诉(包括二审结果)。科技法律中心网站还把从创立至今历年所做的在线仲裁判断集结成了资料库,供纠纷当事人以及仲裁人、普通网民在网上随时查阅。ODR 裁决结果的公开对裁决者容易形成舆论压力,迫使其认真办案,这就非常有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障;而且 ODR 裁决结果的公开还将产生一种裁决先例的约束力,增强判断的一致性,最终形成 ODR 纠纷解决的实体规则;公开的 ODR 裁决结果可以供公众自由浏览查询,这将取得潜在当事人的信任,提高网站的信誉度,提升该网站被选用的可能性。ODR 裁决结果的公开也有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当事人商业机密以及隐私权的破坏,特别是网络的开放性、传播广泛性将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如果不解决当事人的隐私保护问题,当事人可能担心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而放弃对 ODR 机制的使用。ODR 裁决结果的公开性

与保密性是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15]为解决该难题,ODR 网站在公布 ODR 裁决结果之前,必须取得当事人的明示同意,以确保所有当事人对于 ODR 隐私保密的信任。

三、ODR 的审判组织制度

民事诉讼的审判组织是指法院审判案件的组织形式。一般认为审判组织有独任制、合议制两种形式,但也有学者认为审判委员会也属于审判组织。笔者认为,由于价值定位的原因,ODR 机制中不可能存在审判委员会,只有独任制和合议制两种纠纷解决组织。ODR 这种虚拟环境下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审判组织制度上存在着自我特色。

1. ODR 审判组织制度的具体内容

与民事诉讼的审判组织制度相比较,ODR 的审判组织制度具有以下明显特征:第一,当事人在审判组织的构成上具有相对的权利。ODR 当事人在审判组织的构成上所享有的权利既不同于诉讼也不同于仲裁。首先,在独任制还是合议制的选用上,ODR 当事人具有绝对的权利。但是如果 ODR 当事人选择了独任制,则由 ODR 网站直接指定裁决人而不是由当事人双方协议选取,这主要是考虑到 ODR 快速解决纠纷的需要,防止程序的拖延。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第 22 条规定:如果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均未选择 3 人专家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将在收到被投诉人答辩或答辩期限届满后 5 日内从其专家名册中指定 1 名专家成立独任专家组。其次,在合议制成员的构成上当事人仅具有有限的权利。^[16]如果 ODR 当事人双方有一方选用合议制的,则使用合议制来解决纠纷。而在合议制的构成上,则由当事人双方各自提供 3 名专家,由争议解决机构从这 3 名专家中各选取 1 名专家作为合议庭成员,第 3 名专家则由 ODR 网站从其专家名单中直接指定。ODR 合议制成员的产生显然不同于仲裁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 31 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 3 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1 名仲裁员,第 3 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第 32 条规定:当事人没有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约定仲裁庭的组成方式或者选定仲裁员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第二,ODR 机制实行独任制为主、合议制为例外的原则。合议制是民事诉讼中常态化的一种审判组织,而独任制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审判组织。ODR 机制实行独任制为主、合议制为例外的

原则,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第22条规定:如果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均未选择3人专家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将在收到被投诉人答辩或答辩期限届满后5日内从其专家名册中指定1名专家成立独任专家组。之所以这么规定,除了ODR机制追求纠纷解决的效率外,还由于ODR机制一般是对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诉讼文件、证据进行书面审理。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33条规定:正常情况下,域名争议解决程序不举行当庭听证(包括以电话会议、视频会议及网络会议方式进行的任何听证),但专家组认为有必要举行且当事人愿意承担相关费用的除外。第三,ODR机制无需陪审制度。民事诉讼中引入陪审员的目的是:通过陪审员制度,实现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利用陪审员的技术优势,实现审理的正确化。^[17]而ODR不像诉讼那样,承载了那么多的目的和价值。首先ODR就是为了解决纠纷而存在的,通过陪审员来管理国家的目的在ODR机制中不存在;其次ODR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很容易把世界各地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吸收为裁决人。因此诉讼中引入陪审员的两个目的在ODR机制中均不存在,在ODR机制中不需要陪审员参加。另外ODR机制像ADR机制一样没有上诉制度,因此ODR也没有二审审判组织。

2. ODR 审判组织制度的完善

第一,明确规定ODR裁决人的条件。裁决人作为审判组织的构成人员对于审判结果的质量具有重大的意义,而现行的大多数ODR规范对于ODR裁决人的条件并没有详细规定。笔者认为,ODR规范对裁决人的条件应提出明确要求。(1)ODR裁决人必须具有中立性。可以通过ODR裁决人的履历,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查清该裁决人是否具有中立性。^[18](2)ODR裁决人应具有基本的职业道德。应允许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如果由于网速等原因无法清楚地听懂当事人的意见,应允许当事人重新陈述,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运用实体世界的通讯工具来完整听取当事人的陈述。(3)ODR裁决人应具有专业性。在挑选ODR裁决人时,应该注意让各个行业的专业人才进入ODR裁决人名单以供当事人选择。而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仲裁员名单来看,其专家以法律专家为主,其他领域的专家几乎没有,这是不符合ODR裁决人专业资质多元化要求的。(4)ODR裁决人应较为熟悉网络世界,能很好地理解网络空间发展习惯和相关法律。

第二,规范ODR裁决人产生的程序。ODR裁

决人的产生、考核在现阶段均由ODR网站来进行,笔者认为这样做是不严肃的。笔者拟对ODR裁决人的产生程序作出以下规范:(1)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或其他有公信力的组织来负责对裁决人的培养、认证、评价、监督,以保证裁决人的品质。(2)成立ODR裁决人培训机构。ODR裁决人应取得相应的资格证明^[19],但不以取得司法资格证明为限制条件。为此应成立培训机构对裁决人进行必要的培训,其中调解人经大约2周的培训即可,而在线仲裁人的培训时间则需要长一些,大约为18个月。(3)允许当事人在ODR裁决人名单外选用裁决人。为了取得当事人的信任,加快纠纷解决程序,应允许当事人在裁决人名单外协议选用裁决人,如果ODR网站没有发现该裁决人有不适合于裁判本案的情形,应同意当事人的选择。

第三,协调ODR审判组织组成的迅速性与公正性的冲突。为了追求ODR纠纷解决的快速,ODR往往规范赋予ODR网站在审判组织的构成上过大的权力。如《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第25条规定:如果投诉人或被投诉人之一方选择3人专家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应当分别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各自提供的3位候选专家名单中指定1名专家。如果域名争议解决机构无法在5日内按照惯常条件从某一方当事人选择的专家中指定1名专家,则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将自行从其专家名册中予以指定。第3名专家应当由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从其专家名单中指定。第3名专家为首席专家。第26条规定:如果投诉人选择1人专家组,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应当从其专家名册中指定1名专家;如果投诉人选择3人专家组,在可能的情况下,域名争议解决机构应当从投诉人提供的3位候选专家中指定1名专家,从其专家名册中指定第2名专家和首席专家。笔者认为,赋予ODR网站过大的权力容易导致其中立性的丧失,使当事人对ODR裁决人失去信任。笔者建议,应要求ODR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提出裁决人人选,如提不出才可以由ODR网站指定。为此可以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第25条修改为:……第3名专家应当由当事人协商选任或者由当事人委托纠纷解决机制选任,当事人无法在5日内按照上述条件选任出第3名专家的,由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从其专家名单中指定。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第26条修改为:如果投诉人选择1人专家组,该专家应当由当事人协商选任或者由当事人委托纠纷解决机制选任,当事人无法

在5日内按照上述条件选任出专家的,由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从其专家名单中指定。

第四,ODR审前组织的构成。由于ODR机制受理的案件标的额一般都很小、案情也比较简单,大多数情形下没有必要启动审前的发现程序。但假如ODR网站受理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启动审前发现程序就很有必要。笔者认为,ODR机制应当借鉴大陆法系的发现程序,因为大陆法系是在法官主持下完成发现程序的^[20],ODR网站可以借鉴此种做法选派裁决者或者由ODR系统管理员来主持完成该发现程序,进而实现发现程序的目的。英美法系的发现程序主要由当事人双方来自主完成^[21],而ODR机制是在当事人双方没有直接会面的情形下解决纠纷的,因而使用英美法系的发现程序很难实现发现程序的目的。^[22]

四、结语

当人类的足迹迈入虚拟的网络世界后,新型的网络民事纠纷催生了ODR机制。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价值就是依靠“屏对屏”的方式,便捷、便宜、高效地解决纠纷。这样ODR的价值定位与理念预设和诉讼就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二者的运行机理有很大的差异。本文仅仅以诉讼的基本制度为主线,对比了二者在回避制度、公开裁判制度、审判组织制度上的异同。需要说明的是,基本制度上的差异并不能说明谁优谁劣,而只是说明了每种纠纷解决机制既有存在的价值,又有无法避免的缺陷。显然,现代诉讼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审判公开、直接听审、审判集中以及言词辩论等,无法在ODR机制中实现,实质上我们并不需要全部移植诉讼的原则制度,正是由于ODR机制与诉讼机制在一些原则制度上的差异,才使ODR机制的价值优势得以充分发挥。ODR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而仅仅是当事人面对网络民事纠纷时的另一种选择。我们坚信随着对网络认识的加深,网络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一定会更加多元化,现有的网络纠纷解决机制一定也会多层次化。这些多元化、多层次化的网络民事纠纷解决体系将逐步满足实践的需要、满足人类化解矛盾的需要。

[参 考 文 献]

- [1] Ethan Katsh, Janet Rifki.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Resolving Conflicts in Cyberspace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ress, 2001: 47.
- [2] Sarah Rudolph Cole, Kristen M Blankley. Online media-
tion; where we have been, where we are now, and where we should be [J]. The University of Toledo Law Review, 2006(38): 195.
- [3] 何其生. 电子商务的国际私法问题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295.
- [4] 邓杰. 电子商务法研究——以争议解决为中心 [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8: 259.
- [5] [日] 谷口安平. 程序的正义与诉讼 (增补本) [M]. 王亚新,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18.
- [6] 郭玉军. 网上仲裁的现状与未来 [J]. 法学评论, 2003(2): 36.
- [7] 李虎. 网上仲裁法律问题研究 [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89.
- [8] 贺旭红. 国际间网络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06(6): 135.
- [9] Colin Rule.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for Business [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ress, 2002: 85.
- [10] 邱联恭. 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 [M]. 台北: 三民书局, 1992: 167.
- [11] 常怡. 民事诉讼法学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51.
- [12] 陈剑钊. TWNIC 网域名称争议处理机制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之比较研究 [D]. 高雄: 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2009.
- [13] 田平安. 民事诉讼法原理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281.
- [14] [美] 罗森诺. 网络法 [M]. 张泉彤,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368.
- [15] Llewellyn Joseph Gibbons. Private law: public justice; another look at privacy, arbitration and global e-commerce [J]. Ohio State Journal on Dispute Resolution, 2000(15): 769.
- [16] 高兰英. 网上仲裁的若干法律问题 [J]. 学术论坛, 2008(1): 144.
- [17] 江伟. 民事诉讼法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56.
- [18]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Thomas Schultz.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Challenges for Contemporary Justice [M].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2002: 114.
- [19] 肖永平. ODR: 解决电子商务争议的新模式 [J]. 中国法学, 2003(6): 155.
- [20] 杨立新. 中国民事证据法研讨会讨论意见综述 [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0(6): 10.
- [21] 汤维建. 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226.
- [22] Lucille M Ponte, Thomas D Cavenagh. CyberJustice: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for E-Commerce [M]. Upper Saddle River: Pearson Prentice Hall Press, 2004: 3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67-06

我国建立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价值探讨

——基于全面推进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的背景

李春青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组织部, 河南 郑州 450011)

[摘要]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与认证认可质量管理体系在功能诉求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但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在成本可控性、体系延展性、运行平衡性、标准来源覆盖性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目前,国外司法鉴定领域存在大量并未取得、也不曾计划进行认证认可的司法鉴定机构,这些机构所建立的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为我国司法鉴定行业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借鉴。此外,我国司法鉴定行业有自身的特点,为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行业的内在需求及管理的外部空间。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既是管理者主观的需要,也是行业发展的客观结果,更是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开展过程中必要的过渡和补充。这正是我国当前全面推进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背景下建立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价值之所在。

[关键词]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司法鉴定机构质量管理

[中图分类号]DF8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11

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的决定》(下称《决定》)在第五条从业条件中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时“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首次将司法鉴定实验室认可工作写入法律。2005—2009年间,司法部先后出台了《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2012年司法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这些法规与文件在为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确立指导原则、提供工作依据的同时,也让司法鉴定机构取得认证认可由自愿转变为强制性要求,从而拉开了全面推进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的帷幕。

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的开展,是在我国司法鉴定行业多年来缺乏统一质量管理标准和规范的情况下,以系统全面提升司法鉴定机构的质量管理能力、建立健全机构质量管理体系、明确行业质量

管理目标为宗旨而提出的。围绕此问题,学界虽有回应,但所发表的成果多是国外的经验介绍或是质量体系文件的本领域解读,而对其与行业现实的契合冲突以及其试点效果中暴露出的部分设计缺陷和时机谬误等,则无人问津。面对其间的错位,如何予以弥合、能否提供其他可行的质量管理途径,笔者针对此问题提出了“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概念,尝试性地探寻司法鉴定机构质量管理的另一方法和手段,并努力实现其与认证认可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之间的衔接和一致。

一、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价值优势

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是指以提高和保证司法鉴定质量为目标,将各司法鉴定执业类别受理、鉴定、文书制作、出庭和信息反馈等过程中会影响鉴定质量的因素加以提炼,并以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的内容为基础,运用系统方法,依靠必要的组织结

[收稿日期]2013-07-10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32400411111)

[作者简介]李春青(1964—),女,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管理学。

构对其状态加以监督控制,从而保障司法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法定性的质量管理体系。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是一套区别于认证认可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在总结司法鉴定行业内各执业类别机构内部质量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整合了司法鉴定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以及行业规范和管理标准中的部分内容,并结合质量控制原理和技术而制定的一整套具有行业普遍适用性、应用于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的质量管理手段的集合体。

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与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关联,此种关联来源于两者间目的和追求的一致性。但两者间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它根源于两者在立足点和目标层级上的区别。正是因为有这些关联,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探索更具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通知》在“总体目标和要求”中明确指出,认证认可工作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可见,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的功能和效用之一就在于为司法鉴定认定机构建立一套科学、权威、可靠的质量管理体系。围绕这一问题,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与质量管理体系相比较有同有异。其相同点保证了质量控制体系的功效价值及其与认证认可质量管理体系衔接的可能;而差异点则体现了质量控制体系特有的优势及其相对于认证认可质量管理体系的存在价值。

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与认证认可质量管理体系在功效诉求上具有一致性。质量控制是认证认可的基本功能之一。认证认可是各类组织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也是寻求同样的工作目标,发挥着同样的制度作用。通过对人、机、物、法、环的标准核定,将整个司法鉴定开展流程紧密约束于各级各类的标准之中,从而实现了对司法鉴定流程和产品的质量控制,而这正是质量控制体系的主要功能。认证认可是质量控制的高级实现形式,是质量管理、质量保证的重要技术实现方式,其对于司法鉴定质量控制的实现虽并非唯一的选择,但是相较于其他质量控制手段,它在前提假设、基本立场以及目标高度等方面充分体现出其优势,因而是解决司法鉴定机构质量控制问题各种手段方法中的高级实现形式。具体来讲,认证认可是要求司法鉴定机构依据国际通用的准则,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提高自

身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对鉴定人员的能力、鉴定方法和程序、鉴定环境和设施等众多要素进行全面管理,对鉴定过程进行全方位、动态化的控制,并获得第三方的评价与承认,从而确保司法鉴定质量,确保鉴定意见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司法鉴定领域中认证认可的获得是质量控制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模式化的典型范例,是质量控制高标准、全覆盖的高级实现形式。

虽然认证认可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与笔者提出的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在功能诉求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但两者在目标高度上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内部结构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其在具体功能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区别,这些区别正是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优越性的体现,它主要表现在质量控制的外部实现途径和过程当中。

1. 成本(负担)可控性优势

对于认证认可所要求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建立和运行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撑。根据《通知》和认证认可依据准则内容以及笔者调查了解,仅在国家级资质认证认可前期准备阶段,就不仅需要大量的设施、文件、人员培训等工作成本(如引入外部咨询机构的咨询费用每项少则数万元),而且其后维持质量管理体系日常运作,如在内审和管理环节也需要大量的人力消耗。笔者走访的部分司法鉴定机构为保持其管理体系的效能发挥,专职内审管理人员与鉴定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了0.8:1,这还未计算外聘人员。同时根据多家取得认证认可鉴定机构提供的数据,要维持质量控制体系的充分运作,每年鉴定中心的案件受理数量需维持在1000件以上(此仅针对鉴定机构全部资金来源于鉴定所得的鉴定机构)。这些都充分表明基于认证认可所建立起来的质量管理体系在构建和运行过程中,需要鉴定机构投入巨大的成本,并且此成本负担还具有相对固定即不受控的特点——任何源于工作压缩的成本节约或控制,都意味着管理体系运行的间断或形式化,同时也是对相应质量管理作用的削减。

而对于具有行业普适性且相对独立的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而言,其在上述各方面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则要相对小得多,且绝大部分负担是保障鉴定基本合法有效性的必需成本,同时在成本可控性方面也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首先,在建立成本上,通用性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以保障鉴定合法有效为底线原则,进而选取法定内容为其基层标准,在满足基

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降低质量控制体系的起点来拉低成本基点;鉴于质控体系的普适性和稳定性特点,为避免鉴定机构对质控体系的适应成本和调整成本的产生,可以通过横向推广摊平设计和建立成本,全面减轻成本负担。其次,质量控制体系在基层结构之上,还建立了要素“观测池”,将影响鉴定质量的各要素集中于此,各鉴定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机构特点和层级需求,选择其中部分要素加以观测掌控,从而在质控基层平台上搭建适合自己的质量控制体系。个性化的设计、机动灵活的体系搭建,在便利运行的同时,也降低了构建成本。最后,质量控制体系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各类别间的质控可以统一到一个计算机自动化管理系统当中,将各机构独立构建成本整合为行业构建成本,进一步摊平质量控制体系构建成本,同时也可以有效降低运行维护成本,特别是解决那些人员少、案源少、项目少的小型司法鉴定机构在面对质量管理问题时的两难困境。

2. 体系延展性优势

从质量管理体系模式设计并建立的角度来看,虽然认证认可对质量管理的具体模式并没有提出统一要求,但认证认可依据准则的详尽性与单一性,导致在模式建立上各取得机构并没有过多的选择空间,除体系文件方面略有不同外,各质量管理体系在组织和运行上大同小异,失去了体系的适应性与延展性。适应性与延展性的丧失,影响了司法鉴定机构质量控制体系模式的差异化建构,各鉴定机构在地域、等级、项目、特色、性质等各方面的特质也就无从体现和发挥,进而约束了司法鉴定机构质量控制体系功效的实现,也制约了司法鉴定机构的特色化发展。

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在模式上由底层必需性结构和上部选择性结构共同组成,除源于司法鉴定领域法律法规中强制性规范的基层结构无法调整外,上层体系部分仅是进行了大量的关键要素和节点的提示性关注,未固定其相互关联和取舍维度,为各司法鉴定机构的个性化模式建立既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和完备的选材,又极大地保障了体系的延展性,可满足各级各类鉴定机构的差异性需求。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适当组合后,还可以衔接和等同认证认可要求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

3. 运行平稳(持续)性优势

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成效,不仅取决于体系本身的完善程度,更与体系实际运行状况成正比。依托我国司法鉴定资质认定和认证认可建立起来的

司法鉴定机构质量管理体系,其全覆盖、高标准的特点,也使得体系自身必然是内部组织结构繁复的庞杂系统。根据对数家已经通过国家级资质认定同时兼具教研功能的大型司法鉴定机构的调查了解,在有母体分担体系运行成本压力的情况下,质量管理和鉴定技术各环节均表现出对于体系运行参与的疲态甚至倦怠。尤其是运行超过1年后,会进入到排斥期,更有甚者,已经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被一定程度地束之高阁。

而通用性质量控制体系在体系机构上是分层结构。对于基层部分的内容,一方面是司法鉴定工作开展自身必然所需,已内化于各级各类司法鉴定的日常工作中,具有必然性;另一方面为保证鉴定的法律效力,其也具有必须性,如此决定了基础质控部分在运行中不会也不允许存在抵触和拒绝。而对于上部质控部分,由于是个性化的选择构建,体现了机构及内容人员的客观需要和主观意愿,不存在运行阻力的问题,因此在运行的平稳(持续)性上也会得到保障。

4. 标准来源覆盖性优势

无论是各司法鉴定机构已有的质量管理手段,还是本文所言的通用性内部质量控制体系,抑或是高端的认证认可制度,其质量控制的设定标准均是有一定来源的。此来源或是实际总结,或是法律规定,或是已有体例,来源的差异同时也带来了各质控体系在终极目标层级上的不同。

认证认可要求依照《司法鉴定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检查机构能力认可准则》中的内容作为其质量管理体系工作的标准来源,以实现鉴定结果的国际认可。

司法鉴定机构质量控制体系更侧重于对作为标准来源的基本法律法规的体系性吸纳,将《决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鉴定机构仪器设备配置标准》《司法鉴定教育培训规定》《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等法律法规内容作为核心质量控制标准的来源,与此同时也开放性地选取了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依据的文件作为自身体系“选择构件”的标准来源,以实现自身的平台功能,也寻求与认证认可质量管理体系间的有效衔接,为鉴定机构管理升级提供途径。

二、在我国建立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必要性

认证认可制度的可靠性、权威性、科学性等优势

自然毋庸置疑,现实经验和环境在给我们信心和鼓励的同时,其实也在不断提醒我们,实现全部司法鉴定机构及项目取得认证认可是一个过程,其间需要等待,更需要过渡。在这种起步运行中,需要司法鉴定机构通用性内部质量控制体系的存在。

1. 国外司法鉴定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的经验借鉴

1970年代末,美国罪证化验所所长协会/实验室认可委员会(ASCLD/LAB)开始着手研究并建立美国法庭科学实验室认可制度,至2005年美国公立犯罪实验室通过认可的数量占82%,其中州一级的91%通过了认可,县一级的67%通过了认可,而FBI犯罪实验室在1998年通过认可。澳大利亚国家检测机构协会(NATA)自1992年对法庭科学实验室进行认可,至2009年,认可的专业部门或实验室共257个,可见它们的发展速度并不快。^[1]在欧洲,截至2004年,参加欧洲法庭科学实验室网络联盟(ENFSI)的52家鉴定机构中有17家通过了认可。长期以来,荷兰乃至欧盟国家均很少有关于司法鉴定机构管理的专门性法律规定以强制要求司法鉴定机构参加认证认可,仅在个别鉴定项目上(如DNA检测),机构必须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检测实验室认可。^[2,3]

可见在国外的司法鉴定领域,至今仍存在着大量未曾取得、也不曾计划进行认证认可的司法鉴定机构,这些机构在鉴定质量控制上依然有自己的手段和方式,建立了有异于认证认可的质量控制体系。从世界范围内认证认可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况来看,全领域、全范围、各层级的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全覆盖尚未能得以实现。

2. 我国存在问题及构建必要性

我国司法鉴定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司法鉴定行业自身特点是我国在司法鉴定领域开展认证认可工作应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我国在《司法鉴定文书规范》中明确将鉴定书分为鉴定意见书和检验报告,这是对司法鉴定存在技术型鉴定和经验型鉴定的认可。此外,有些鉴定需要依靠团队配合和大型仪器设备辅助,而有些设备则以目测和一般性光学观察为主要的鉴定检验手段;有些鉴定需要多学科多门类综合完成,而有些鉴定则可以单人独立完成。面对此种状况,单纯的认证认可制度不能兼顾。上述司法鉴定行业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决定了司法鉴定既需要大型综合性实验室类检验鉴定机构,也允许单体小型鉴定机构的存在。这导致了在认证认可制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认证认可较为普及的西

方国家,认证认可也大多只局限于公立、大型、检案数量巨大的综合性司法鉴定机构。对于尚处于司法鉴定行业发展完善初期的我国而言,单一的认证认可质量管理方式必将成为行业发展的桎梏。同时,游离于标准化管理之外的“三大类”以外的鉴定项目或机构,更需要一个灵活机动且实用高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这为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构建既提供了行业的内在需求,也提供了管理的外部空间。

三、我国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构建

1. 我国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建立的现实环境

我国司法部所作的《2011年度全国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情况统计分析》中有两组数据(见图1、图2)值得对比关注。^[4]

由图1和图2可知,2011年我国现有司法鉴定机构除上海、江苏、浙江之外,其余省份中每个机构平均年检案数量均不到1000件,同时考虑受“马太效应”影响而存在检案分布的不均衡性,各省年检案数量在500件以下的机构应该占总数的绝大部分。从2011年度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规模统计情况可以发现,全国范围内10人以下的相对小型司法鉴定机构占比超过60%。可见,我国当前的司法鉴定机构队伍中,鉴定人数和检案数量较少的中小型机构占了绝大多数,这些机构很难承受认证认可所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所带来的成本压力,无论是从申报的积极性还是从取得认定后的执行动力来看,实质性参与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均存在较大的阻力。同时我国幅员辽阔,鉴定难度和需求参差不齐,中小型鉴定机构的存在及其相对分散的布局状态,有利于鉴定资源的利用和诉讼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节省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中小型鉴定机构的存在是司法鉴定适应现实的必然结果。而相对于认证认可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通用性质量控制体系更适合保证中小型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质量。

2. 我国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建立的法律空间

认证认可工作开展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督促各鉴定机构建立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而该项工作的开展又是基于《决定》和《通知》。在认证认可质量管理体系之外再建立一套质量控制体系,是否与法律相违背、是否存在法律依据,是首先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条文的解读不难发现,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应用,存在所需的

法律空间。

《决定》第5条及《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办法》第14条规定,鉴定机构需有在业务范围内进行鉴定必需的、依法通过计量认证或者实验室认可的检测实验室。该内容一方面要求进行强制认证认可的范围

仅是在计量认证和实验室认可两个方面,并不包括检查机构类认证认可;另一方面又说明开展该强制认证认可的前提,是在业务范围内进行司法鉴定所必需。笔者认为,认证认可并非全领域各层级所有司法鉴定机构和类别均需遵从上述规定,对于无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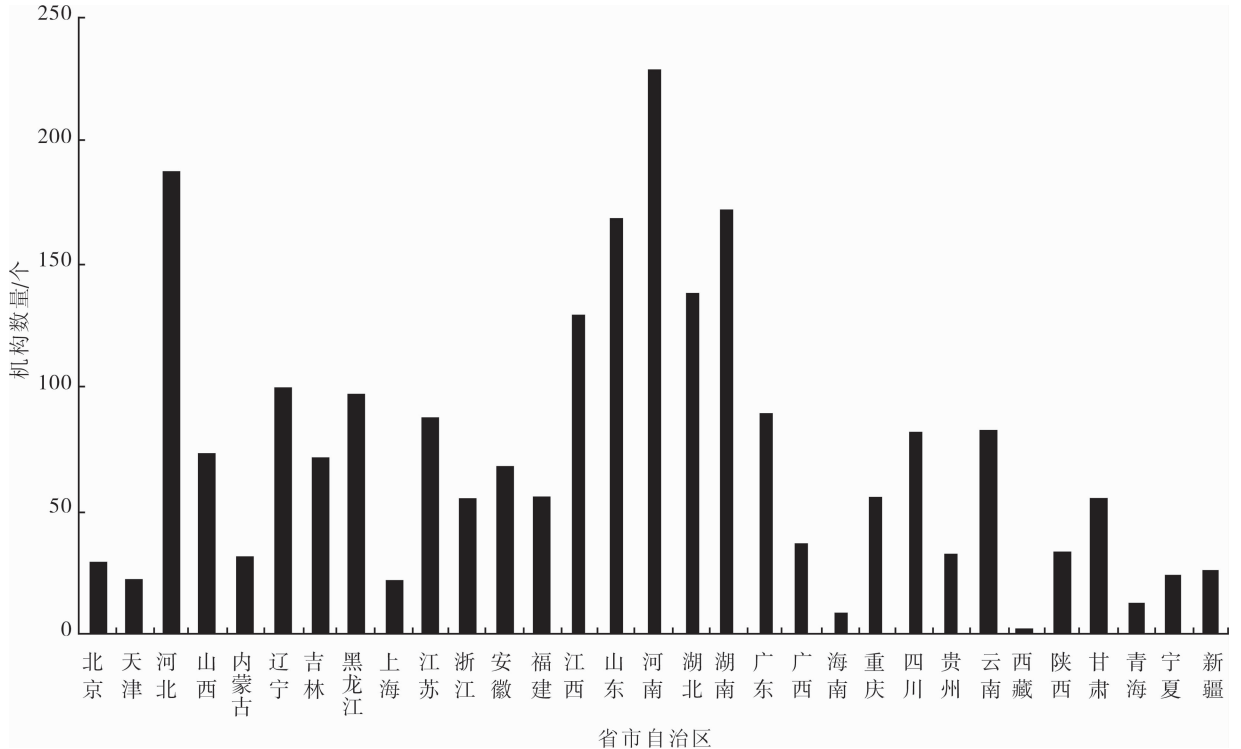


图1 2011年全国“三大类”司法鉴定机构数量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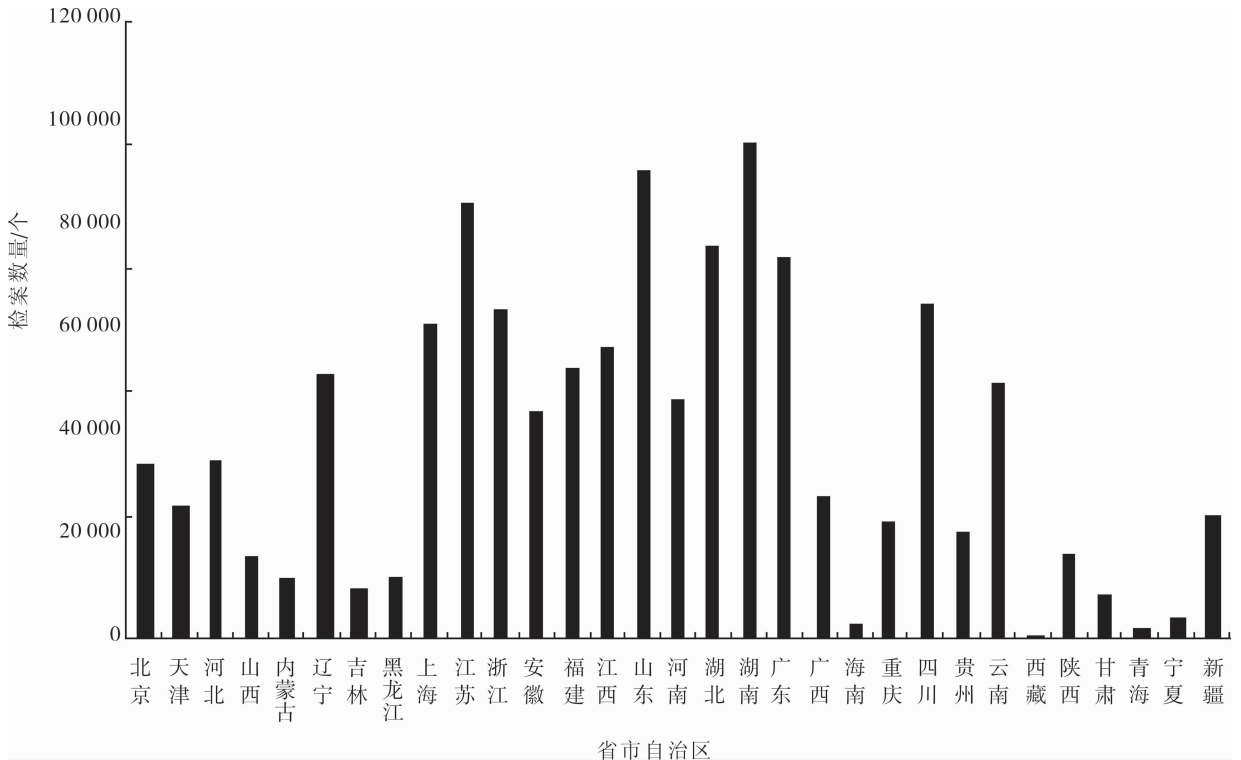


图2 2011年全国“三大类”司法鉴定检案数量示意图

实验室辅助的鉴定类别或实验室辅助以外的鉴定环节,则不需要通过认证认可。如此理解,那些无需或无法开展强制认证认可的司法鉴定机构或类别建立另外的质量控制体系,就得到了法律的默许。

根据《通知》总体目标和要求中(一)(二)(三)项的内容可以发现,强制性认证认可在时间和类别上均存有执行的过渡区域。首先在时间上,对于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新设立的司法鉴定机构核准登记后2年内,通知发布之前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应当按照所在区域司法厅(局)规定的期限,依法通过认证认可,此2年和规定的期限被设定为管理过渡期。但过渡期的设定在缓解矛盾的同时,也使得在该期间机构处于一种质量管理的游离状态。其次在类别上,从事法医、物证、声像资料类之外其他司法鉴定业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在面对认证认可这个问题时,司法部的要求是,可参照《通知》,依法通过认证认可。此规定使用了“可”和“参照”等用语,表明了非强制的通融性态度,如此使得“三大类”以外的鉴定机构同样处在游离状态。但是,司法鉴定质量的重要性以及鉴定机构对认证认可的追求,要求此间某种质量控制体系在机构内部存在。因此,在现有的法律规定、政策环境和行业规范内,上述游离状态的存在为具有通用属性的行业质量控制体系的存在提供了基础。

五、结语

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全面推进、全员达

标,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且“三大类”之外管理真空状态的存在,鉴定开展情况和人员、机构、检案数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决定了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在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开展过程中,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能够助其实现顺畅过渡,并为今后司法鉴定行业的发展和布局建立更为开放的平台,而且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数字化实现,将进一步突出该体系的优势,更充分地展现其价值和意义。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存在,既是管理者主观的需要,也是行业发展客观的结果。显而易见,它是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开展过程中必要的过渡和补充,而这正是在我国当前全面推进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背景下建立司法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价值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 花峰. 法庭科学实验室认可工作发展状况与启示[J]. 刑事技术, 2009(5): 35.
- [2] 中国司法鉴定考察团. 中国司法鉴定考察团赴芬兰、荷兰考察报告[J]. 中国司法鉴定, 2007(4): 69.
- [3] 中国司法鉴定培训团. 司法鉴定培训团赴荷兰考察报告[J]. 中国司法鉴定, 2010(6): S1.
- [4] 李禹, 党凌云. 2011年度全国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情况统计分析[J]. 中国司法鉴定, 2012(3): 12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5-0073-05

近年我国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

姚琳琳, 龙汉武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硕士研究生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 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普遍不高。近年的研究成果表明: 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 并依性别、年级、生源地、健康及婚恋、学校及专业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而自尊、自我效能感、自我和谐、社会支持是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已有的研究存在着样本代表性不强、测量工具信效度不高、研究内容不全面、结论相互矛盾等问题。今后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应沿着创新研究思路、拓宽研究路径、扩展研究内容、提升研究质量、注重研究规范、提高信效度的方向进行。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 硕士研究生; 研究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12

近年来, 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及人才竞争的日益激烈, 硕士研究生在择业、婚恋、生活、学习等方面面临诸多压力, 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普遍不高, 影响了他们自我潜能的发挥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主观幸福感, 就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性评价。本文拟对近5年我国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 目的在于全面把握我国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进展和不足, 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同时呼吁更多的人关注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 采取切实措施促进硕士研究生健康成长, 从而提升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

一、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概况

1. 文献分布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 以“全文”为检索项, 以“硕士研究生”和“主观幸福感”为检索词, 采取“精确匹配”方式进行高级检索, 共检索到2008年以来的相关文献1387篇。根据相关性原则, 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30篇文献进行分析。从文献资料的来

源看, 在这30篇文献中, 期刊有22篇, 约占73%; 硕士学位论文有8篇, 约占27%。从文献的年度分布看, 2008年有4篇, 约占13%; 2009年有4篇, 约占13%; 2010年有8篇, 约占27%; 2011年有8篇, 约占27%; 2012年有5篇, 约占17%。由此看出, 近5年来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2. 研究视角

文献表明, 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心理学视角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 也有个别学者另辟蹊径, 从其他学科视角进行创新研究。例如《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1]从体育学的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 《硕士研究生的幸福观、幸福感及其相关研究——来自湖南四所大学的调查》^[2]则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视角进行研究。

3. 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 只有《当前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3]和《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4]运用了理论思辨的方法, 其余的都是实证研究, 即从当地高校选择一定数

[收稿日期] 2013-08-15

[作者简介] 姚琳琳(1989—), 女, 江苏省盐城市人, 西华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管理; 龙汉武(1971—), 男, 四川省广安市人,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管理、学生管理、思想政治教育。

量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开展问卷调查,自编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研究。《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1]运用了访谈法、文献研究法、心理测量法、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对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实证研究。《硕士研究生学习幸福感调查——以沈阳地区某高校为例》^[5]则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沈阳某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进行调查研究。

4. 研究思路

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致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先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调查,然后通过归纳和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另一种是通过理论思辨,直接探讨提高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如《上海地区硕士研究生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6]和《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7]等,就是按照前一种思路进行研究的;而《当前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3]和《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4]则按后一种思路进行研究。

二、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内容

1. 关于主观幸福感内涵的研究

许德镇指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体验的主观感受和整体性的评估。它包含三个维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6]冯翠仙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成分,前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认知评价(即生活满意度),后者是指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8]黄钧裕等^[9-10]也给出了类似的阐述。从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主观幸福感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

2. 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研究

王淑燕等^[11-12]使用不同的主观幸福感问卷对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发现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王玲玲等^[13-14]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钱宇凤等^[15-16]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女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薛本洁^[17]以安徽省2所医学院校硕士研究生为被试,得出医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基本处于中等水平以上。马金凤等^[18]通过研究发现新疆

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综合各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当前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的结论。

3. 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差异研究

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依性别、年级、生源地、健康及婚恋、学校及专业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女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较高。王玲玲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一文中指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非常显著,女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男生。^[13]这一研究结论与《硕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19]《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分析》^[18]的研究结果一致。

(2)分别来自城、乡的硕士研究生其主观幸福感有明显差异。师保国等在《当代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系》^[12]中指出,城市研究生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农村研究生。而文献^[13]的结论相反,认为农村生源的幸福感指数显著高于城市生源的幸福感指数。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被试的取样、施测的方法、被试的生活学习环境以及掩饰程度等因素有关。

(3)不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有较大差异。许德镇^[6]以上海市硕士研究生为被试,结果发现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随年级的变化而变化,研一学生幸福感最高,研三学生幸福感相对较低;张宁^[20]在对西安地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张明明^[19]认为,研三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级学生。

(4)恋爱中的及生理健康的硕士研究生幸福感较高。学者们普遍认为,恋爱中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单身者或者已婚者;另一些研究表明,生理健康状况良好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要高于生理健康状况欠佳的硕士研究生,如《硕士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21]一文,对不同健康状况的硕士研究生幸福感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得出这一结论。可见,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其身心健康关系很大。

(5)重点高校及文科类硕士研究生幸福感较高。《硕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19]一文指出,985、211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文

科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理工科硕士研究生。然而王淑燕^[11]认为,理工科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稍微高于文科硕士研究生,两结论之所以相悖,与他们选择的主观幸福感量表的不同有关。

4. 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

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丰,大多研究者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既受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又受个体心理特征的影响。

(1)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自身因素。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自身因素很多。一是硕士研究生的自尊水平。如《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7]《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其与自尊的关系》^[11]等研究表明,硕士研究生的自尊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自尊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二是硕士研究生的自我效能感。《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13]中指出: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指数、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这3个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这个维度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三是硕士研究生的自我和谐。自我和谐程度不同的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自我和谐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强。《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自我和谐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22]和《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17]等文献持的就是这一观点。

(2)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随着研究生教育开放程度的加大,社会对学校 and 学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生获得的社会支持。冯翠仙等^[7,8,23]研究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相关,他们拥有的社会支持越多,主观幸福感就越强。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就业压力。张明明^[19]选取湖北省3所高校的400名硕士研究生作为被试,研究认为,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就业压力呈显著负相关,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随就业压力的增加而降低。

5. 提升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研究

很多文献都涉及到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提升策略问题,一般是从社会、学校、个人三个方面探讨增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策略。

(1)社会积极引导,为提升硕士研究生的主观

幸福感奠定基础。很多学者都积极提倡全社会一起来关注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首先,利用大众传媒对自强不息的硕士研究生代表进行正面宣传和报道,从而辐射到整个硕士研究生群体,引导他们乐观向上,提升其心理素质。其次,大力发挥社会团体的建设性作用,提供隐性的情感支持,从而使硕士研究生个体在社会团体中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如冯翠仙^[8]认为,应建立硕士研究生的社会支持系统;董凤洁^[21]则提出了构建良好社会支持系统的策略。

(2)学校高度重视,为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感受力。学校可以多开办一些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讲座,帮助他们解决人际交往、情绪调节和环境适应等方面的困惑。另外,学校可以结合硕士研究生身心发展特点,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国内很多学者都高度重视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如《当前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3]和《当代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系》^[12]等文献,分别强调要对硕士研究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活动。苗元江等在《研究生幸福感指数调查》中明确提出要面向研究生开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14]

二是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提高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硕士研究生每天的学习、生活都是在校园里进行的,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他们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学校应该积极组织各项文娱活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鼓励硕士研究生积极参与,从而丰富硕士研究生的业余生活,让他们在宽松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下更好地成长成才。师保国等^[12]提出要为研究生建立宽松的校园文化环境。苗元江等^[14]也提出要积极加强研究生校园文化环境建设。

(3)研究生积极主动,提升感受幸福的能力。一是培养强健体格,为自己的主观幸福感奠定生理基础。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去,才能满怀希望迎接未来的挑战,从而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打下坚实的基础。《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1]和《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21]都对研究生身体健康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是塑造健全人格,开发自身主观幸福感的内部源泉。健全的人格是幸福的源泉。作为硕士研究生,要想拥有健全的人格,就要勇于正视现实,积极悦纳自己,正确地认知他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客观冷静地面对一切挑战,进而收获丰盈的人生。《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强调,女研究生应该塑造良好的人格^[4]。《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也提出医学研究生要培养健康的人格。^[17]

三是提升综合素质,为主观幸福感提供动力保障。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要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要积极协助导师完成科研项目。此外,还要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锻炼自身的沟通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灵活应变能力等,从而为就业做准备。《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一文呼吁医学研究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来提升综合素质,^[17]田丽等^[4]诸多学者都认为,研究生应该通过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增强主观幸福感水平。

四是学会正确归因,提升自己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能。正确的归因方式,有助于硕士研究生客观分析自己成功及失败的原因,使他们正确认识自我,从而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增强主观幸福感。《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支持为统计变量》一文提到:要想塑造正确的归因方式,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归因风格,其次要形成正确的自我概念,最后要形成积极的认知系统,如此才能有效地感知幸福、体验幸福。^[21]

三、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评价与建议

我国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促进硕士研究生健康发展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样本的选择、测量工具的使用、研究内容的深化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实证研究中样本的代表性不强。纵观近5年的文献,可以发现很多研究者在选择被试时,样本数量不够,覆盖面不广,并且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在的地区,带有很明显的地方性、区域性,致使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遍性,难以推广。二是测量工具信效度不高。有些研究照搬国外的量表,有些研究对自编量表未作信度、效度检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三是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如有的学者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各影响因素之间交

互作用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影响硕士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因素方面,只提出了社会支持和就业压力两个因素,而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关注力度、研究程度都还远远不够;对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的问题,也缺乏深入的探讨。鉴于此,对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1. 创新研究思路,拓宽研究路径

与其他研究相反,关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是实证研究多,理论研究少。而要从根本上提升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必须有理论的指导。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将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形成机理和提升途径,为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 扩展研究内容,提升研究质量

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还有不少空白地带,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拓宽研究视野,可以对不同区域硕士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就婚姻恋爱、人际交往、学业成就、科研能力等与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全面探讨影响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原因等,从而提高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质量,使研究结论在提升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注重研究规范,提高信效度

在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中,一定要遵循科学研究规范,尽量减少研究中的实质性错误,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抽样的方法和样本的容量要满足要求;不宜直接套用国外学者编制的现成量表,而应该结合我国硕士研究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进行修订,以适应研究的实际需要;自己编制的问卷和量表要多方征求专家意见,通过试测满足信度和效度要求后施测;对收集的数据资料要进行统计检验和科学阐释等。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硕士研究生群体必定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心、研究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问题,硕士研究生就能不断增强抗压能力和主观幸福感,在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下茁壮成长。

[参 考 文 献]

- [1] 杜辉. 硕士研究生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 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0.

- [2] 肖乐意. 硕士研究生的幸福观、幸福感及其相关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 [3] 吴昕. 当前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期待与现实差距的成因分析[J]. 商洛学院学报,2009(4):75.
- [4] 田丽,王传旭. 提升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教育策略[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4):106.
- [5] 姜毅超,李娜,孙慧. 硕士研究生学习幸福感调查——以沈阳地区某高校为例[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07.
- [6] 许德镇. 上海地区硕士研究生心理控制源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4):25.
- [7] 杨东蕾,王志中. 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2):1481.
- [8] 冯翠仙. 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J]. 晋中学院学报,2008(4):109.
- [9] 黄钧裕. 医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 中国校外教育,2012:12.
- [10] 赵泓. 在校研究生感戴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关系[D].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2.
- [11] 王淑燕. 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特点及其与自尊的关系[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10):753.
- [12] 师保国,肖敏敏,陶晓敏,等. 当代研究生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其关系[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5):61.
- [13] 王玲玲. 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研究[D]. 南京:南京医科大学,2010.
- [14] 苗元江,郑霞,罗佳. 研究生幸福感指数调查[J]. 医学研究与教育,2010(1):41.
- [15] 钱宇凤. 关于女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现状的实证研究[J]. 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62.
- [16] 范琳洁,张术霞,王冰. 女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人口学变量影响因素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11):92.
- [17] 薛本洁. 医学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和谐、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D]. 蚌埠:蚌埠医学院,2011.
- [18] 马金凤,谢慧玲. 新疆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分析[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1(9):1025.
- [19] 张明明. 硕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 [20] 张宁. 西安地区硕士研究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4.
- [21] 董凤洁. 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D]. 青岛:中国石油大学,2011.
- [22] 钟艳兰,赖小林. 汕头大学硕士研究生自我和谐状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1):1.
- [23] 张俊玲,张俊杰. 硕士研究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 科教文汇(上旬刊),2008(9):2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78-05

民国时期河南省灾荒救助体系措施及成效

孙训华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河南 郑州 450015)

[摘要] 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荒,建立救灾组织机构、制定救灾运作规范以构建救灾组织体系;大力整顿仓储、开展植树造林、重组水利机关和兴建水利设施,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调配散放赈粮、筹集拨放赈款、开展以工代赈,实施灾荒救助措施。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特点是: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虽然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救助成效有限,其原因是: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赈灾过程中贪婪腐败现象严重;农民日益贫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

[关键词] 国民政府;灾荒救助体系;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13

1928—1937年,河南省灾荒发生的频率及其所造成影响,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尽管国民政府的救灾工作相对前清而言,无论是其重视程度还是动员力度,都有明显的增强,但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等诸多因素,灾荒救助工作并未取得预想效果。作为近代灾荒最为频发的地区,河南省的情况是国民政府灾荒救助的一个缩影。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灾荒的成因及其影响层次,而对于地方灾荒救助体系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拟通过分析1928—1937年间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的框架及存在问题,深入了解民国时期地方灾荒救助体系的特点及成效,以为今后的救灾工作提供参考。

一、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与运作

1. 构建救灾组织体系

(1) 建立救灾组织机构

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害,更好发挥政府对于灾荒救助影响,河南省政府奉命于1929年4月成立河

南省省赈务会,隶属于省政府,“盖合省政府委员二人,省党部委员二人,民众团体五人组织”。^{[1](P560)}赈务会成立以后,成绩显著,3个月时间,各种捐助及中央、地方所筹集的赈款已达275 850元。大部分用于散放各县急赈,部分款项用于办理工赈和平赈。1935年,成立河南省水灾救济总会,主要办理急赈、工赈、收容等事宜,并且在各县设水灾救济分会共计35处。河南省政府设立的赈灾机构,多为临时筹设性质,由于政府财政专款的支持,赈灾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发放急赈、设粥厂、工赈等措施,灾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救助。

(2) 制定救灾运作规范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河南省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救灾法规和办法,以规范救灾工作的各种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筹集平赈基金,针对灾荒期间省内受灾地区缺粮的现状,先后颁布了《筹捐款粮及运输办法》《以富养贫办法》等,以稳定市场粮食供给,后又陆续制定了《紧急救灾实施办法》《奖励各县绅商富户自动救济灾贫办法》《调剂民食办法》《节食救灾办法》《收养灾童办法》《牲畜保育办

[收稿日期]2013-08-27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3-QN-288);河南省社科联项目(SK1-2013-435)

[作者简介]孙训华(1980—),男,河南省周口市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灾荒史。

法》《开仓贷谷及散放办法》《专员、县长办理救灾奖惩办法》等规定。上述种种救济措施,采用中央赈灾与地方自救相结合的救灾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然灾害对于社会民生的破坏。

2. 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

(1) 大力整顿仓储

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积谷备荒显得尤为重要。早在清朝乾隆时期,全省常平仓、义仓、社仓,贮谷256万石有余,劝捐民社仓贮谷73万石有余^{[1](P552)}。仓储量相当可观,有效地发挥了防灾备荒的功效。但近代以来,积谷量逐年下降。民国初年,仓储制度几近废弛,“清时虽不时开仓赈济,然犹时借时还,仓储常满。自民国以来,民乏隔岁之粮,官无期年之任。仓政废弛,只有支出,未有偿还,早已一粒无存。”^[2]南京政府成立后,政治形势渐趋稳定,政府开始重建仓储。河南省政府要求各地严格整顿仓储,“由厅规定查报二麦收数、秋禾收数、谷价并旧仓状况,及新仓筹设情形,印成表册,交由查禁烟苗委员,附带查报,以为责成之标准,而杜藉词延宕之弊”^[3]。1933年,鉴于各县整顿仓储未能划一,河南省政府提出了具体的仓储整顿办法大纲,要求“于最短期间,以最低限度,将县仓区仓分别成立,一面督饬区保甲长宣传仓储必要,俾各协力举办义仓,即以办理仓储为各该县长之考成。自经通令之后,本厅当随时派员考查,倘仍有玩忽情事,一经查明,定行严惩不贷”^[4]。据统计,1932年河南省全省仓储粮为1.1万石左右,经过数年的整顿,1935年全省积谷已达29 413石,连同旧谷共45 816石。^{[5](P331)}

(2) 开展植树造林

为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河南省政府制订了一系列防灾造林的制度,并出台许多植树绿化措施,积极开展各种造林活动。1927年10月,河南省政府将原北洋军阀时期所设的林务监督改为森林办事处,加强对全省林业建设的管理,全省林务开始有了统一管辖机关。1928年5月,省政府公布《承领荒地造林暂行条例》,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植树造林的法规条例,如《拟定林业合作社规则》《订定强制人民造林条例》《订定各级林务行政人员奖惩条例》等。在这些法令条例的指导下,河南省先后组织营造了中山纪念林、各县模范林等,进行河岸造林、坟地种树,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强制人民造林。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人工林面积较以往有了明显的增长。据当时的河南省政府统计,1929年,全省共植树3 469 964株,1930年为3 879 102株,

1931年更是达到5 330 551株,三年合计全省共植树造林12 679 617株。^[6]可见,河南省当时的森林覆盖面积有了较大的提升,对防灾减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3) 重组水利机关,兴建水利设施

河南省水利管理机关早在民国初年就已设立,却因经费欠缺、政局动荡,纯属有名无实,水利设施已逐年老化,“河渠蓄泄无度,以致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汪洋一片”,尤其是民元以来,战乱频仍,水利建设已经严重滞后于农业发展的需要,以至于“十年之内,早者七,潦者二,年谷顺成者,不过十一耳。欲救济之,水利自不可缓也。”^{[1](P687)}1928年1月,河南省政府按照河流大小、水利设施具体情况,先后将全省水利机构整合为48个水利分局。1932年,又改组为4个水利局。1935年,又改组为河南省水利处,隶属于省建设厅,负责管理全省水利建设事务,水利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据统计,仅1931年一年,全省有54个县共疏浚及开挖大小沟渠232处,有31个县疏浚大小河流51处,有22个县凿井共4 088口。^[7]

3. 开展实施灾荒救助措施

(1) 调配散放赈粮

饥荒之年,灾民最急切盼望的是赈粮。由于灾荒不断,人口众多,河南省粮食本就不充裕,如遇上饥荒年景,粮食缺乏便成为了困扰当局的迫切问题。1929年1月,因灾荒严重,河南省决定向江苏购米10万石。1932年鄯陵水灾,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郑州办事处“拨给美麦一百二十吨,计一千四百九十四包,重十八万斤,按全县一百八十二乡镇,每乡镇分八百斤发给”^[8]。1933年,黄河大水,泛滥成灾,国民政府在河南省兰封、滑县等21县共散放救济赈粮201万余斤。^[9]从救灾应急效果而言,赈粮无疑是最为理想的方式。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与交通设施、天气状况以及社会政治形势有关。对于交通便利、政治相对稳定的地区,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战火纷扰、交通不畅的地区,赈粮必然不能及时运往灾区,一旦出现积压、耽搁时日,不但延误救灾时机,赈粮也会出现霉质,进而造成损失,影响到灾荒救助效果。

(2) 筹集拨放赈款

除赈济粮谷外,拨放赈款也是一种常用的救灾手段。灾荒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便会立刻拨放赈款,开展救灾。1931年河南省大水,泛滥成灾,国府水灾救济委员会下拨赈款10万元救济河南省灾

民。^[10]1936年河南省全省大旱,经多方呼吁,财政部前后共拨给公债票面30万元,售后现款为18万元左右,用于救济豫灾。^[11]拨放赈款,一直是政府赈灾的主要手段,可以实现快速高效的救灾效果。但由于受灾区域较广,赈款数额有限,难免在赈款分配上出现各种矛盾和纠纷,程序上的繁琐也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救灾的良机。同时由于经办赈款、参与赈灾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侵吞克扣赈款的违法案件层出不穷,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成效。

(3) 开展以工代赈

工赈作为传统荒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灾荒救助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民元之后,政治动荡,经济衰败,政府当局仍然将急赈放在了灾荒救助工作的首位,对工赈没有给予足够的投入。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工赈逐渐引起了各级救灾机构的重视,“古言荒岁役民,原出于不得已,而未始非良法也。浚河筑堤诸务,受其值,救目前之饥荒;藉其劳,免将来之水旱。故筹办工赈,实救荒最善之策也”^{[10](P21)}。1932年,西华境内沙河暴涨,泛滥为灾,绅民“向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呼吁,蒙准拨发赈麦赈款分别办理沙颖工赈……复以余款设立颍河下游桥工委员会,建修沿河桥梁十一处,植树十万株”^[12]。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已经开始将防灾与救灾进行了初步的结合。虽然从救灾成效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考虑到当时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形势,这种灾荒救助的举措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通过分析河南省政府所采取的种种灾荒救助措施,可以看出尽管政府已经意识到防灾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又只能将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到灾后的补救上来,缺乏防灾救灾的长效机制。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虽然构建起了灾荒救助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并未掌握近代灾荒救助的科学方法与先进的救灾思想。因而,面对无法抗拒的灾荒,只能疲于应付,以致于无法取得救灾的明显效果。

二、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的特点及其在灾荒救助中的作用

1. 河南省政府所构建的灾荒救助体系趋于近代化

(1) 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

民国时期,河南省政府在救灾方面采用了大量的近代化技术手段,比如通过近代化的媒介手段及

时向外界传播救灾信息。报纸和电报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式,以1931年江淮大水灾为例,作为当时中国社会影响力度较大的《申报》连续刊登了呼吁赈济豫灾的报道和通讯,诸如《济生会豫赈主任出发》《济生会豫赈纪要》《河南省刘峙主席急电乞赈》《河南省赈务会恳拨款粮赈灾电》《豫省赈务会电告水灾》《张钫电张学良乞赈》《豫省府请拨赈灾公债》等。在当时全社会范围内,让国民更加及时、真实、全面了解河南省的灾情,对于动员社会各方赈济豫灾产生了较好效果。

(2) 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

官方赈灾一直以来就是传统荒政的主要内容,但民国时期,政局混乱,财政匮乏,政府应对灾荒力不从心,于是动员民间力量参与救灾,“本省灾区广袤,灾情惨重,又值库款支绌,募赈有限,以之散给各乡,其为数直等于杯水车薪,而各县不乏殷富之家,慈善之士,劝捐义赈,实属要图。一方可免办赈不善之弊,同时灾民得受实惠”^[10]。民间救灾开始快速的兴起,1930年河南省大水,灵宝乡绅张重仁于本地“散粮二十余石,全活颇众”^[13]。1931年,河南省水灾,沙河两岸各县受灾较重,“现该处士绅组织沙河水灾救济会,实地调查,筹款疏浚,以期免除永久灾患”^[14]。1932年7月,“霖雨为灾,漳河决口六十余丈”,“邑绅王孝德、李建勋会同临漳绅士倪建勋等组织临时河防局,堵塞决口”^[15]。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专门的救灾赈灾机构,主要包括华洋义赈会河南省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在河南省的各分会、旅平河南省赈灾会、旅京河南同乡会。这些机构通过筹募粮款、移民垦荒等措施,在河南省灾荒救助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 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

在整个的灾荒救助体系之中,救灾资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国时期,政府财政支绌,而灾荒又异常严重,仅靠政府的赈款,无疑是杯水车薪。据国民政府统计,1932年河南省受灾面积14万多平方公里,灾民1480万人以上,因灾外迁者35万多户,死亡34万人,财产损失1893万元以上,而全省所得公私赈款不过23万元^{[5](P312)}。面对巨大的救灾资金缺口,河南省政府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如发行赈灾公债、发动政府机关捐薪助赈,组织社会知名人士开展义演、动员省外慈善团体募捐及提倡政府机关开展节约助赈等。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所采取的赈款募集方式,已经打破了传统荒政的单一模式,体现出民国时期河南省救灾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进一

步改善了救灾环境,提升了救灾成效。

2. 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体系中的作用及其救灾成效

(1) 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救灾体系的运作中,政府在灾荒救济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河南省政府组建的专门救灾机构——河南省赈务会,负责救灾工作的统筹与协调。灾害一旦发生,政府便会立刻启动救灾工作,并通过政令以及新闻媒体等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发出最为权威的赈灾呼吁。虽然富绅积极参与当地赈灾,但政府依然保持着对民间救灾力量的引导与控制。尽管在近代救灾体系中,民间救灾力量异军突起,但其从属于官方救灾体制的模式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种民间无法取代的官方主导式的赈灾体制,有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保障救灾有效运行。

(2) 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成效有限

尽管灾荒来临之时,河南省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民间人士都采取了众多的救灾措施,但在当时政局动荡、经济衰败的背景下,政府的灾荒救济在灾害频仍的现实面前,其救助效果依然是非常有限的。1935年偃师境内河流满溢、山洪暴发,省赈务会拨洋1000银元,连同其他方式所募集的赈款共计8000银元,赈粮6万斤,这些即便是完全无余地发给灾民,人均也只能得到8两粮食,1角钱。1936年临汝旱灾严重,省政府拨振款2000余元,灾民每口仅能分的五分钱,尚不够一餐之用^[16]。据国民政府统计,1931年,河南省全省各河决口长达8600余华里,灾民949万人以上,死亡11万人,物产损失约计22955万余元^{[5](P304-305)}。1934年,河南省受灾田地共3469.4万亩,占田亩总数的37%^{[5](P326)}。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河南省政府尽力救济灾荒,但其救灾成效并不十分明显。

三、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成效发挥的限制性因素

河南省政府灾荒救助体系成效发挥的限制性因素,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政府自身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首先,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民国时期,政府当局对广大农民加捐加税、重捐重税的现象极为严重。作为传统田赋征收大省的河南省,人民经济负担更为沉重,据统计,1902年,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税不过四角,而到1929年,豫南稻田平均

每亩赋税负担增至1.196元,较1902年平均额上升近3倍^[17]。各地驻军“吃地面”(饷项及一切军需、草料全让地方供应)十分普遍。辉县、滑县见于册籍的一年就分别为100万、400万元以上,人民实际负担数倍于此数。1932年,据国民政府统计,河南省20个县水田每亩平均负税5.6元左右,43个县旱地每亩平均负税5.6元,均相当于清末地丁之14倍^{[5](P312)}。1934年,《东方杂志》曾报道,今大灾之后的河南省附加税名目就高达42种,居全国前列^[18]。鉴于河南省捐税名目繁多,有超过征税十倍以上者。1934年6月份省政府先后免去300余种捐税,10月召开财政会议后又免去县杂捐21种,各县私收田赋附加查免46种。尽管如此,未上报的捐税还不知有多少。由此可以看出民间负担何其重^{[5](P326)}。

其次,赈灾过程中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民国时期,财政支绌,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救灾助赈机构的赈款也仅仅是杯水车薪,但即便如此,仍有人在赈灾过程中,营私舞弊,侵吞赈款,从中渔利。1932年,河南省省民政厅指出,“查河南省各县,自去岁以来,被灾奇重,分配赈款,亦不在少数。惟各属散放人员,及各区绅董,往往经人控告,有吞食挪用情弊,自非切实查察,认真整顿,不足以维赈务”^[19]。汝南县十九店以往所积累之社仓积谷,数年来一毫未动,合计应有积谷1500石,灾荒严重时,各方决定开仓赈济,当开仓时才发现所积仓谷早已被仓库主任“都信手挥霍,或者经营了买卖,现在是一点没有”^[20]。遭遇蝗灾更是一些地方贪官发财的大好机会,“这正是各省、各县政府中靠‘吃蝗虫’肥胖起来的贪官污吏们所大为高兴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年年除之不尽的严重的蝗灾中得到更多更多的‘奖金’,而使自己更肥更胖”^[21]。

最后,农民日益贫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因灾致荒,因荒成灾,近代以来社会灾荒的演变一直没有摆脱这一恶性循环。灾荒的打击极度地增加了农民生存的负担,造成了农村社会的日渐破产。即便勉强熬过了一个灾荒,在濒临破产的农村社会,农民在下一次灾荒面前依然毫无抵抗力。1936年,经济学家朱其华曾把中国人群按照经济生活状况进行了分类,其中处在贫穷线的人口为18.7%,饥饿线的人口占62.5%,死亡线的人口占到12.5%,全国人口的93.7%已经基本上无法维持最低生活了^[22]。而在这个群体中,农民的人数显然占绝大多数。农民在灾荒和农村经济破产的夹击之下,其对

灾害的防御和自救能力已达到了极为脆弱的地步。大灾自不必说,即便小灾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一场与死亡展开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政府官方的灾荒救助体系中,农民抗灾自救基本上无从谈起,进而加大了政府当局救灾的难度,成为影响政府灾荒救助体系发挥其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结语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河南省政府在构建灾荒救助体系方面进行了良好的组织和引导,也陆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防灾救灾工作,但是灾荒救助的成效并不明显,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的苛捐杂税、政治腐败,表现出政府当局在构建地方灾荒救助体系框架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制度性缺失,而这种体制上的缺陷又是国民政府自身无法克服和弥补的,结果必然导致救灾成效大打折扣。

[参 考 文 献]

- [1] 河南省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民国)河南省新志[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 [2] [清]张嘉谟. (民国)西华县续志(卷五)[M]. 潘龙光,修. 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10.
- [3] 讲演[J]. 河南省民政月刊,1933(1):88.
- [4] 重要公牍[J]. 河南省民政月刊,1933(2):35.
- [5] 王天奖. 河南省近代大事记[M]. 郑州:河南省人民出版社,1990.
- [6] 河南省各县最近三年造林成绩统计表[J]. 河南省省府年刊,1931:558.
- [7] 全省二十年水利进行之统计[J]. 河南省省政府年刊,1931:587.
- [8] 苏宝谦. (民国)鄢陵县志[M]. 靳蓉镜,晋克昌,修. 台北:成文出版社,1936:39-40.
- [9]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R]. 黄河水利委员会档案(MG4.3-50).
- [10] 工作报告[J]. 河南省省政府年刊,1931:19.
- [11] 工作报告[J]. 河南省省政府年刊,1936:140.
- [12] [清]张嘉谟. (民国)西华县续志(卷一)[M]. 潘龙光,修. 台北:成文出版社,1938:27.
- [13] 张象明. (民国)灵宝县志(卷十)[M]. 孙椿荣,修. 台北:成文出版社,1935:24.
- [14] 报告[J]. 河南省政治月刊,1931(4):2.
- [15] [清]贵泰,武穆淳. (民国)安阳县志(卷末)[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33:1683.
- [16] 武艳敏. 民国时期社会救灾研究——1927—1937年河南省中心的考察[D]. 上海:复旦大学,2006.
- [17] 李作周. 中国的田赋及农民[J]. 新创造,1932,2(1):1.
- [18] 邹枋. 中国田赋附加的种类[J]. 东方杂志,1934,31(14):312.
- [19] 计划[J]. 河南省政治月刊,1932(11):3.
-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河南文史资料(第十三辑)[C].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44.
- [21] 张水良. 中国灾荒史(1927—1937)[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137.
- [22] 朱其华. 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M]. 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5-0083-03

我国政府治理中的汇通思路

孔雪琳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71)

[摘要] 当今中国, 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成为过去, 然而伴随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政府管理模式却在政府治理的各个方面留存至今。这种管理模式造成财政压力大, 各项公共服务提供效率低下, 人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鉴于此, 新时期我国政府要立足于基本国情, 吸收古今中外政府治理的经验得失, 采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汇通思路,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 政府要创造合理的制度安排, 进一步放开对竞争性行业的行政审批准入; 有机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量, 创新改善政府管理, 切实加强市场监管,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既要满足当前民众的愿望和基本公共需求, 又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政府治理; 新公共管理; 汇通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14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政府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国家治理, 政府几乎包办了所有的公共服务。这种政府包办一切的做法既有利于将政府预算最大化, 便于官员寻租创租, 也符合当时民众对新中国的期望, 因而这种全盘苏化的治理模式很快根植于政府的治理理念、组成部门、各级政府官员乃至人民群众的心中。但是, 这种治理模式对财政造成极大的压力, 使得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低下, 也引发了很多不满。改革开放以后, 政府包办一切的做法在人民群众意见很大的方面有了一些变革, 但是这些变革往往因缺少理论支撑而失去了方向, 政府急于让位给市场或政府与市场草草地混合, 造成了一些领域社会治理的极大混乱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目前, 在中国很多公共治理领域都有一种倾向, 即市场无能为力的, 还得靠政府办起来。这将导致新的无效率和人民的不满。我们必须认识到, 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 政府并不是当然的完美提供者, 对政府的推崇逐渐消退之后, 是对政府能力的疑问和反思。于是问题从“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转变为“哪些是政府应该做而且有能力做好的”, 即从对目标的追求变为对能力的疑问, 进而寻求一种新的解决途径。在这个途径中, “市场干不了政府干”的模式转变为

“市场干不了的政府想办法来让市场干”的模式, 而不是在“市场干不了政府干”和“政府干不了市场干”两者之间摇摆。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到底该怎么做, 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探讨和历史考察两个角度, 分析当今中国政府治理的应有思路, 提出只有采用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汇通思路, 才是中国政府治理的应有选择。

一、近代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对政府治理的探讨

在近代西方学术界,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官僚制组织理论, 成为公共行政学派, 即古典学派的重要人物。古典学派的理论重心是在大规模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如何建立合法的机制。它提出了两种公共管理的基本机制: 官僚机构和公共企业。^{[1](P23-27)} 古典学派给出了一个解决公共治理问题的理想模型, 但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模型中的人是现实社会的理性经济人, 古典学派提出了他们应该怎么做, 却忽视了他们“会怎

[收稿日期] 2013-09-10

[作者简介] 孔雪琳(1971—), 女, 河南省郑州市人,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行政管理、公共经济。

么做”或“愿意怎么做”的问题;而在规定了人们应该怎么做之后,组织的目的已经被这些规则所取代。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的迅猛发展给了官僚制组织理论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寻租理论、尼斯坎南模型(认为官僚制组织总是倾向于从事比实际需要多2倍的活动,结果导致了配置无效率,损失源于过量的供给)和莱宾斯坦的X-无效率(损失源于过高的单位成本)。为了更充分地分析公共部门行为,尤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效率的条件、价值的地位,以及公共部门中的动机模式,产生了科恩式的范式转换,管理途径和政策途径取代了古典途径,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范式。^{[1](P21)}管理途径试图从研究人的本性和需要、行为的动机、生产中的人际关系等方面研究组织中“会怎么做”和“怎样使人做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从而达到组织的目的。其核心思考是确定组织的目标后,必须对组织下层中的人的行为进行分析,从而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这是对古典学派由上而下规定人的行为模式的一种颠覆。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关注,是政策途径和管理途径的共同之处。但是管理途径认为,目标一旦确定,就是一个既定的不再更改的方向;而政策途径认为,在执行政策以达到目标的过程中,政治仍须不断参与其中,因而政治过程取代了管理效率,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虽然研究的范式和途径不同,但是对于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这个最基本问题的忽视,成为新公共管理兴起的契机。

政府和公共部门不断地扩张,引发各种危机,使得学者开始思考,在公共治理中政府是否有能力成为一切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社会是否负担得起这样的政府。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公共治理、新公共管理等理论不断深化,明确区分了政府承担的不同角色:购买者、提供者、承包者、管制者和仲裁者,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1](P4)}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在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所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2]一书中得到了提炼和普及,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精髓——企业家政府理论。该理论对于政府的角色进行了详细的分解与刻画,试图重新分配给政府一个适当的角色,并提出了构成企业家政府理论之基本内核的10条政府体制改革原则。西方学者对于公共治理的研究不断深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治理的指南。正如新公共管理的著名学者E. S. 萨瓦斯所言,“治理”一词源于希腊语,其含义是“掌舵”——政府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但提供服务——不论是修马路还是航空服务,

都是在划桨,而政府对此并不在行。民营化是一项务实的政策,它使政府回到掌舵者的位置上,依靠私营部门划桨。^[3]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更是明确指出,提供服务并非政府的义务,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得以实现。^[4]

其实,这并非外国学者的新发现,早在5000多年前,中国西周时期设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的中国古代官僚政府的基本构架就是本着这一原则构成的。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朝廷从未试图包办过所有的公共服务,它们仅仅是在兵部、刑部、礼部、吏部、户部和工部的框架下履行着最基本的政府职责。

二、中国行政管理路径的历史考察

自西周起至清朝末年,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从来没有官办医院、官办基础教育、官办文化产业、官办体育产业。政府管理部门主要有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吏部和工部。官员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祭祀外交、军事、刑事、人口和官员管理等任务。国家提供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事实上,当时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也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发展各项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和卫生事业,迅速摆脱了贫穷的经济状况,改变了极端落后的社会面貌,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体制本身所固有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阻碍着中国政府治理的健康发展。^[5]苏联已经成为过去,然而苏联时期的思想对中国政府治理的影响仍延续至今;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然而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却没有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在中国政府治理的方方面面仍有留存。

三、汇通思路——中国行政管理的应有选择

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借鉴古今中外公共管理的经验教训,新时期的中国公共管理应该采用汇通思路,走出一条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

汇通,原意是指将西方医学与中医学汇聚而沟通。自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许多中医开始接受西

说,逐渐发展出持中西医学汇通观点的医学流派,称为汇通学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政府治理也应如此。我们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在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政府治理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选择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汇聚全人类智慧的国家治理之路。我们在进行任何领域的改革时,都要切实思考一下我国古人在这方面的处理方法,切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切向外国看齐。这里的外国,不仅包括西欧各国,也包括曾经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苏联。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首要一点就是创造合理的制度安排。其一,它必须是市场与政府相结合之路。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在其合著的《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6]一书中指出,在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时,通过预算程序的模式解决某些问题效率较高,市场模式在解决另一些问题时则更胜一筹,在两种模式中都存在失灵与满足一些需要,这两种模式对于社会治理是必不可少而且相互补充的。同样地,在卫生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上,也必须走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之路,但是这里的政府和市场必须是在各自所长的地方有所施展,而不是简单地引进市场机制,采取“放权”、“让利”和“创收”等措施,致使市场机制在诱导人性之恶的地方发挥作用。其二,它必须是一条既使当前人民感到满意,又不能使未来财政面临破产危机的路线。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必须满足的各项公共需求,还要在制度安排上加强约束机制,使其成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充满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生机勃勃之路。

1. 政府要进一步放开对竞争性行业的行政审批准入

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放开对竞争性行业实行的审批准入制度。对竞争性行业实行行政审批准入制度,是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妨碍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得寻租创租行为难以遏止。而行政行为造成的垄断比市场竞争行为造成的垄断可怕得多,因为前者是人为造成的,不是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形成的:无论企业的竞争力如何,只要获得行政准入,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享受垄断利益,而其本身的低效率必须由消费者来买单;并且一旦实行行政准入,也就造成了退出障碍。因此,对于竞争性行业要进一步放开行政审批准入。

2. 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

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还

要认真审视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市场力量虽然强大,但也会滋生各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罔顾社会责任的问题。因此,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同时,还要改善政府管理,切实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目前我国政府正在进行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但是,简政放权的同时要注意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放就乱,简政放权才能真正取得良好效果。

3. 既要满足当前民众的愿望和基本公共需求,又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之路,必须兼顾人民的意愿和财政能力。因此,要允许民间资本更多地进入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缓解较为尖锐的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下一步,应进一步放开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诸多限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需求既要满足,同时也要考虑到,仅仅依靠财政资金是难以为继的,因此,要借鉴西方国家民办教育、民办医疗的经验,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力量。

在公共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上,各国政府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研究参考的,汲取其经验、避免其教训,从而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政府治理之路。

[参 考 文 献]

- [1] [英]简·莱恩.新公共管理[M].赵成根,王洛中,崔跃嵩,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 [2] [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东方翻译所,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 [3] [美]萨瓦斯E.S.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4] [美]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再造政府[M].谭功荣,刘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5] 黄恒学.中国事业管理体制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7.
- [6] [美]詹姆斯·布坎南,里查德·马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M].类承曜,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86-07

工作压力、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关系研究

许颖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采用社会化媒体调查与MBA学员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工作压力、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分别进行了独立研究与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方法有效验证了传统方法的研究成果,并且有了一些新发现:个人经济因素与组织人际关系因素对工作压力影响较小;个体经常忽视周边绩效的重要性;个体往往忽视组织环境对个体心理资本的影响效果;组织层面的压力源对工作绩效有着显著的作用;心理资本的回复力维度对工作压力有较大的调节作用;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关系甚密,培养型的组织环境对心理资本的作用凸显,而作为心理资本一个维度的毅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心理资本会通过调节工作压力作用于工作绩效。建议企业注重员工的压力管理,协调员工的组织生活与家庭生活;关注员工晋升,给员工创造个人发展的空间;重视周边绩效的指标设计,加强员工的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创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做到人岗匹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加大对员工心理资本培养与开发的投入,构建与员工的和谐关系,增强员工的安全感,培养员工积极的心理资本。建议员工正确对待工作压力,通过培养心理资本沉着冷静地应对;加强与其他成员的合作,由竞争观念向竞合观念转变,提高工作绩效;正确处理好家庭与工作的关系,通过沟通交流让家人理解自己的工作。

[关键词]工作压力;工作绩效;心理资本;社会化媒体;语料采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15

在物质发达、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的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压力的时代”。普遍存在的工作压力对个人、组织和社会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工作压力与个人的生理、心理、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工作压力还关系着个人的工作业绩和企业的绩效。因此,工作压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仅仅依靠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运用是不够的,前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Martin E. P. Sefigman 开创了积极心理学新领域,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 Luthans 发现了区别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极心理资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组织中的员工在个体成长过

程中可被开发的积极的心理特征或者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就是员工的心理资本。^[1]心理资本是个体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能力的集合体,结合社会化媒体方法来探究心理资本与个体所感知到的工作压力和个体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社会化媒体调查与MBA学员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我们的研究目的,首先对网络上相关网站进行数据挖掘,搜集以工作绩效与工作压力为主题词的相关词汇,然后进行一系列分析,筛选出重要高频词汇用于MBA问卷设计;而后,通过对问卷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分别对工作压力、工作绩效、心理资本进行单个变量研究和相关性研究,

[收稿日期]2013-06-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0217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3-QN-029);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作者简介]许颖(1978—),男,河南省原阳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至2012年1月6日之间进行的,共发放问卷208份,收回问卷196份,回收率为94.23%。剔除无效问卷11份,有效问卷为185份,有效率达到94.39%。笔者作为MBA讲师和校际间相互学习成员,有机会亲自发放、回收问卷,因此问卷的回收率较高;同时向参与者强调问卷的重要性,从而保证了问卷调查的质量。

经过社会化媒体语料处理,得出30个高频词汇,由调查者从中选择其认为与工作压力、工作绩效、心理资本相关的词汇。问卷词汇选择标准包括同义归并,如将“工资”、“收入”归并为“收入”;选择词频尽可能高的词汇,剔除了“活动”、“出身”等词频低的词汇。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MBA学员的选词结果,分别得到了与工作压力、工作绩效及心理资本相对应的排名前10位的词汇(见图2—图4),本文称之为高度相关词汇。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以工作压力、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为关键词的所有高度相关词汇的关系网络图(见图5)。表1列出了与各个变量和多个变量相联系的高频词汇。

2. 单个变量的研究

(1) 工作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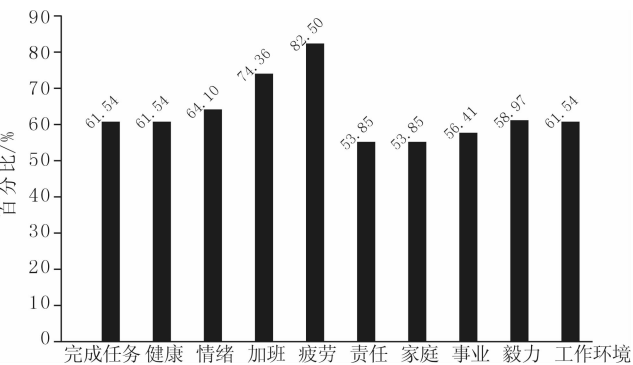


图2 与工作压力高度相关词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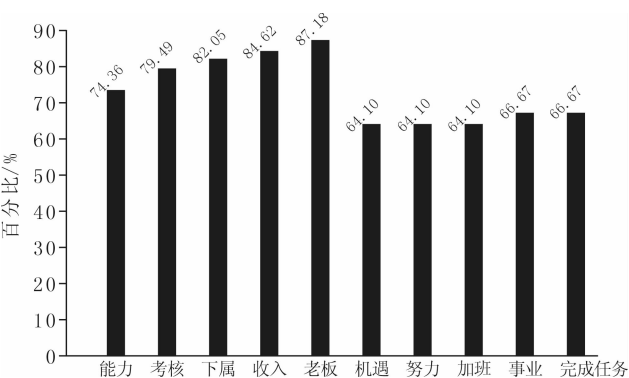


图3 与工作绩效高度相关词汇

“压力”本是一个物理名词,后逐渐运用于工作场所。综合国外文献相关内容,有学者认为工作压力是对个体需求的刺激性变量;也有学者认为工作压力是情景变量对组织中个体造成威胁时,情景需求超出个体所拥有的能力和资源;还有学者认为,是情景需求和组织中个体二者交互作用产生了压力。本研究采取我国学者徐长江对工作压力的定义:“在工作环境中,使个人目标受到威胁的压力源长期地、持续地作用于个体,在个性及应付行为的影响下,形成一系列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反应过程”。^[2]工作压力源主要是指导致工作压力的刺激、事件或环境,它是改变个体心理和身体健康状态的主要原因。Robbins^[3]认为压力源包括环境、组织和个人3个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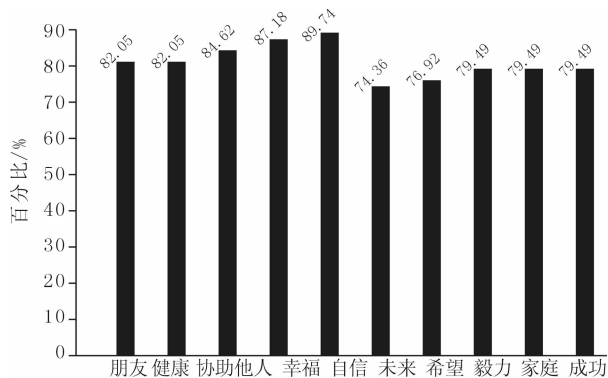


图4 与心理资本高度相关词汇

表1 与单个变量或多个变量相关的高频词汇

| 变量 | 相关高频词汇 |
|----------------|----------------------------------|
| 工作压力 | 疲劳、加班、情绪、健康、完成任务、工作环境、毅力、事业、家庭责任 |
| 工作绩效 | 老板、收入、下属、考核、能力、完成任务、事业、加班、努力、机遇 |
| 心理资本 | 自信、幸福、协助他人、健康、朋友、成功、家庭、毅力、希望、未来 |
| 工作压力与工作绩效 | 加班、老板、责任、能力、担心、完成任务 |
| 工作压力与心理资本 | 调整、健康、毅力、家庭 |
| 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 | 自信、希望、未来、动力、成功、幸福、努力、资源、教育、同事、机遇 |
| 工作压力、工作绩效、心理资本 | 情绪、事业 |

注:单个变量的高频词汇是指调查排名前10位的词汇,词汇选择率都达到了50%以上;多个变量的高频词汇选择率控制在50%以上。

从本文实证调查所得到的工作压力高度相关词汇中可以发现,这些词汇集中在压力源与压力结果方面。家庭、毅力、事业等词汇表明压力源集中于个人因素,通常认为对事业的渴望会给员工带来积极的压力,组织中具有毅力的员工往往能够较好地处理压力,家庭和谐与否、家人身体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工作压力。加班、完成任务、责任等词汇表明压力源集中于组织因素。过多的、超越其胜任力的任务会给员工带来较大的压力,员工承担的责任越多、越大,工作压力也会加大。工作环境如工作安全保障、工作进度、工作速度都会导致压力。从工作压力定义中发现,过大的工作压力往往会带来个人生理、心理等各方面问题。疲劳、健康等词汇表明工作压力给员工带来不利;情绪也会受到压力的影响,在高压状况下,人的情绪往往会波动,并且表现出焦虑、没耐心等症状。这些词汇基本能验证以往的相关研究。

通常所认为的经济因素对工作压力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在笔者对学员的访谈中发现,他们的工作压力更多地来自职位晋升,因为职位的升迁不仅与收入相关,还与个人的社会地位相联系,这是影响员工压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除此之外,老板、下属、朋友等人际关系方面的因素对员工工作压力的影响相对较低,这很有可能是由MBA学员这一群体的特殊

性决定的,他们在人际交往方面通常比普通员工把握得更好。

(2)工作绩效

所谓工作绩效,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是组织期望的结果,指人们在工作中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在不同层面上的有效输出。一般而言,工作绩效是衡量组织目标实现程度的核心标准,也是管理者进行人力资源决策的重要依据。在工作绩效构成上,Motowidlo 和 Van Scotter 以实证方式将工作绩效区分为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4]影响工作绩效的因素也很多,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如下模型来分析研究,即个体的工作绩效大小受其个人能力、工作动机、环境条件共同影响:

$$\text{工作绩效} = f(\text{能力} \times \text{动机} \times \text{环境})$$

实证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大致验证了以往对工作绩效构成与影响因素的研究。66.67%的被调查者认为完成任务与工作绩效有关,任务绩效包括任务的熟练性与有效完成自己任务的动机,也就是说,完成任务是工作绩效的一部分内容。74.36%的被调查者认为能力与工作绩效是相关的,这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能力是影响工作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相吻合。收入、事业是影响工作绩效的动机性因素,高收入、成功的事业都能激励员工提升工作绩效。老板、下属、机遇、考核、加班可以看做是影响工作绩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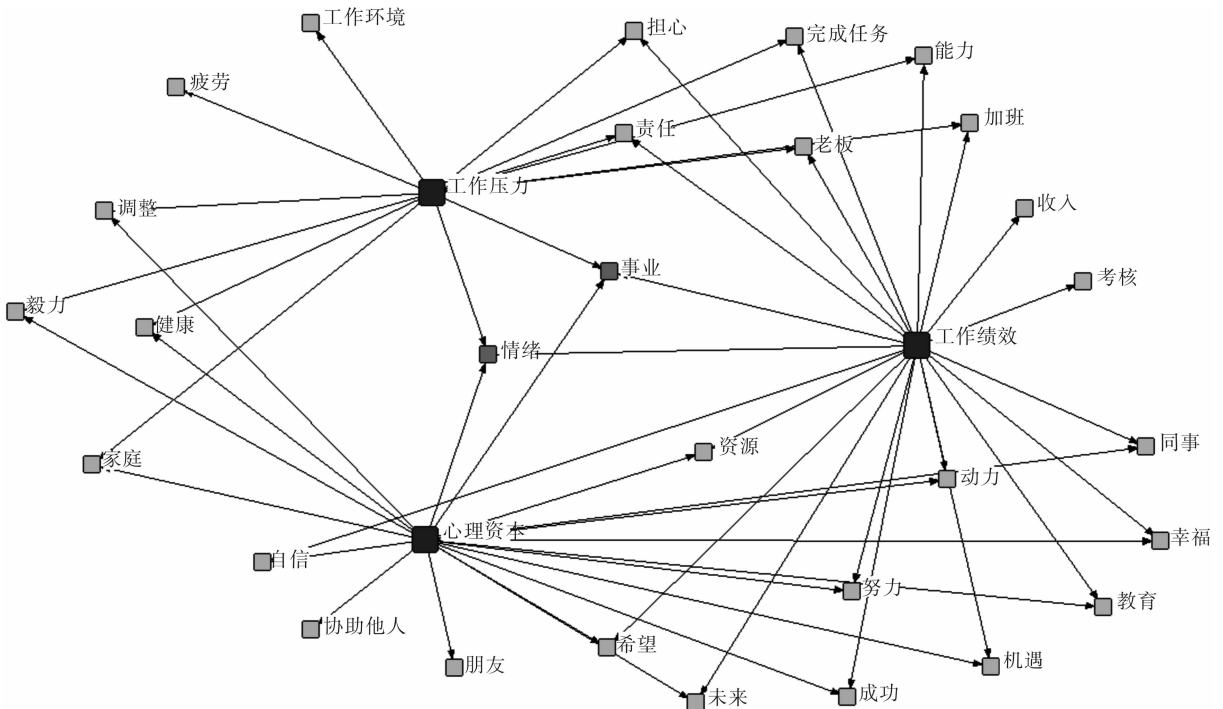


图5 工作压力、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问卷调查关系网络图

组织内部环境因素。老板是被认为与工作绩效最为相关的影响因素,老板可以制定任务、考核方案、薪酬方案,为员工创造机遇,这都是与绩效紧密相联的。同时,努力这一词汇表明员工的个人特质与绩效是相关的,这也验证了学者们普遍将人格与工作绩效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重要性。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只有 20.51% 的被试者认为协助他人与工作绩效相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只是认识到了任务绩效,而忽视了周边绩效的价值,这通常与员工之间的竞争关系有关,许多员工是不愿意与他人协作或是帮助他人完成任务的。

(3) 心理资本

Luthans 等^[1]将心理资本定义为:个体一般积极性的核心心理要素,具体表现为符合积极组织行为标准的心理状态,它超过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和开发而使个体获得竞争优势。在心理资本的构成要素上,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Luthans 指出,积极心理资本是指自信或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坚韧性 4 种积极心理能力,它们都是可以测量、开发和管理的心理状态。然而目前有关心理资本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少,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目前心理资本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心理资本的结构和影响效应;二是影响心理资本形成的因素非常多,如个体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特征、家庭、同辈群体、组织、社区、文化,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存在类型上的差异,而且在影响程度上也有所不同。通过文献阅读发现,一些文献初步探讨了心理资本构成要素的影响因素,例如,研究证明能够不断自我强化的人表现出更高的回复力,Averill、Catlin 和 Chon 认为,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许对希望的加强有作用;培养型的环境包括环境的支持和同事的帮助也会提高希望状态。^[5]

实证调查发现,自信、希望、毅力、未来都被认为是与心理资本相关的,这验证了心理资本的构成维度。朋友、协助他人、家庭被大多数人选择,通常认为这些词汇是与心理资本的影响因素相关的,培养型的环境能够提高个人的心理资本。除此之外,健康、幸福、成功这些词汇的出现则表明了人们通常认为心理资本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能够带来积极的效果;相反,担心、疲劳等消极词汇出现的概率较小,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心理资本的 4 个构成维度并没有完全凸显出来,这可能与人们对心理资本的认识还不深刻有关;人们也较少选择诸如老板、下属、加班等词汇,表明他们普遍认为心理资本受到组织环境的影响较小。

3. 多个变量研究

在对工作压力、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进行单变量研究分析之后,我们需要探讨这三者之间关系的相关性及相关程度。鉴于本文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我们在此不详细研究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另一个变量或是证明变量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或负相关,而是通过分析这些相关词汇来指导实践。

(1) 工作压力与工作绩效

中西方管理学界和心理学界中的研究热点之一就是工作压力与工作绩效相关性。由于测量标准、方法以及分析的角度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学者们对此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经典的 Yerkes-Dodson 关系模型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与支持,其在模型中指出工作压力与工作绩效呈倒 U 型关系,即员工在组织工作中压力应该保持在适度水平。但在现实应用中,使用该模型的最大弊端在于难以弄清楚何为“适宜程度的压力”,因此该模型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

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加班、老板、责任、完成任务这些影响工作压力组织层面的因素与工作绩效也显示出了紧密的关系,这可能与我们所研究的主题有关,即组织中工作压力与工作绩效的关系;能力是影响工作绩效的一个主要因素,能力强的员工能够比较轻松地完成任务,面临的压力也相对较小;而担心等词汇的出现则表明员工对工作压力、工作绩效的一个态度。

(2) 工作压力与心理资本

心理资本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目前而言,对工作压力与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比较少,笔者在翻阅历史文献中,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在 Cooper、Sloan 和 Williams 设计的工作压力指标体系(Occupational Stress Indicator, OSI)中找到,即人格特质对工作压力具有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6]在学者对心理资本概念的探讨过程中,特质论者认为心理资本就是人格,是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Letcher 等甚至将心理资本归结为经验开放型、尽责型、外向型、亲和型、情绪不稳定型五大人

格特征,认为心理资本就是人格特质^[7];Cole 也认为,心理资本是一种影响个体行为与产出的人格特质^[8]。因此,工作压力与心理资本之间是存在关系的。

工作压力与心理资本联系在一起共同词汇包括调整、健康、毅力与家庭。调整与毅力代表了心理资本的一种回复力或坚韧性,当个体面临工作压力时,有坚韧性的人可以在挫折和困难中茁壮成长,即心理资本高的人能够承担更大的压力;家庭是影响压力的个人因素,同时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资本;人们把心理资本看做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其对工作压力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具有调节控制作用。

(3) 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

研究发现,除了知识、技能、能力之外,人格因素也会对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人格因素对绩效预测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大五人格”模型提出之后,加之 Borman 等又提出周边绩效的概念^[4],研究者们渐渐认识到人格是工作绩效(特别是周边绩效)和人—组织匹配方面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自信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已被证实。Luthans 等通过对 422 位中国员工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心理资本及希望、乐观和坚韧性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员工的心理资本及希望、乐观和坚韧性,都与他们的工作绩效显著正相关^[1]。仲理峰^[4]做了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证实了员工的希望、乐观和坚韧性合成的心理资本对他们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有积极影响。

我们发现大量词汇是同时与工作绩效和心理资本高度相关的,这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自信、希望作为心理资本的构成维度,能够带来高的工作绩效,这一点已经得到验证;努力、动力、成功、幸福、美好的事物都能够反映出个体的积极心理状态,这些具有动机性的词汇通常通过作用于人的心理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工作绩效。同时,研究发现,充足的组织资源、良好的教育、机遇和友好的同事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影响员工心理资本的环境因素,提供培养型的环境能够提高心理资本,带来绩效的提高。

在研究中发现,毅力作为心理资本的一个构成维度,与工作绩效之间没有显示出很强的关联性,我

们认为毅力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才能表现出与工作绩效的高度相关,在企业家或是销售人员身上更能显示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4) 工作压力、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

在对工作压力与工作绩效关系研究过程中,Robbins 提出的“压力源—压力体验—压力结果”的压力模型,指出潜在压力来源于员工所处工作环境、员工所处组织特征、员工个人共同作用,而员工个体差异是能否将潜在压力转变成现实压力的关键。^[8]以往的研究把工作压力作为自变量,工作绩效作为因变量,而心理资本则作为调节变量。在本研究中,情绪与事业是连接这三者的共同词汇。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和相应的行为反映,它的产生伴随着复杂的积极或消极的主观心理体验。^[9]积极情绪是一种乐观的心理状态,有利于克服过高工作压力带来的工作绩效下降。换句话说,由压力源所带来的工作压力会影响到个人的情绪,过高的压力会促使消极情绪增长,但是个体心理资本好会削弱压力对绩效的负影响,缓解消极情绪。事业可以看做压力源的动机性因素,对事业的需求会产生一定的压力,适度的压力会促使工作绩效的提升,绩效上升会提高个体的自信、乐观,带来心理资本的提高。当然,如果过高期望的事业追求带来了强大的心理压力,最终也会适得其反。

三、研究结果与建议

1. 研究结果

本文通过采用社会网络调查与 MBA 学员实证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工作压力、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单个变量与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能够基本验证传统研究结论,同时我们还能发现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或者尚未开发的新领域。现将本文的研究结论概括如下:(1)对工作压力的单变量研究基本验证了压力源与压力结果的相关性,但个人经济因素与组织人际关系因素对工作压力影响较小;(2)对工作绩效的单变量研究基本验证了绩效构成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但个体经常忽视周边绩效的重要性;(3)对心理资本的单变量研究基本验证了心理资本的构成及其一部分影响因素,但个体往往忽视组织环境对个体心理资本的影响;(4)对工作压力与工作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本验证了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的作用,

同时发现组织层面的压力源对工作绩效有着显著的作用;(5)对工作压力与心理资本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作为一种人格特征,其回复力维度对工作压力有较大的调节作用;(6)对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关系甚密,积极的心理资本能够带来较高的组织绩效,并且培养型的组织环境对心理资本的作用凸显,而作为心理资本一个维度的毅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7)对工作压力、工作绩效与心理资本三者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会通过调节工作压力来作用于工作绩效。

2. 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企业与员工分别提出以下建议。

对企业的建议:(1)员工的工作压力来自于个人、组织与环境,企业应注重员工的压力管理,协调员工的组织生活与家庭生活,可以定期举办一些企业员工家庭生活派对,帮助员工家人理解员工与企业;(2)企业应关注员工晋升,给员工创造个人发展空间,这有利于提高员工积极性,减少因工作压力带来的问题;(3)调查发现,许多员工把工作绩效看做是单独的任务绩效,而忽视了周边绩效、协助他人所带来的绩效;企业在制定绩效考核指标的过程中,应重视周边绩效的指标设计,加强员工的团队协作能力培养;(4)来自组织层面的压力源很容易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绩效,因此,企业应加强组织建设,创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完善组织结构,关注员工的任务完成情况,做到人岗匹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5)个体心理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绩效,企业可以加大对员工心理资本培养与开发的投入,如进行员工人际技能培训、社会培训,为员工提供富有弹性的工资与福利模式,保障员工基本生活^[10];构建与员工的和谐关系,落实“五险一金”等国家基本政策,增强员工的安全感,实施 EAP 员工帮助计

划,这些制度的落实将有利于培养员工积极的心理资本。

对员工的建议:员工应正确对待工作压力,通过培养心理资本沉着冷静地应对;加强与其他成员的合作,由竞争观念向竞合观念转变,提高工作绩效;正确处理家庭与工作的关系,通过沟通交流让家人理解自己的工作。

需要指出,本文研究的样本空间还不够大,地域跨度有一定局限,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加大样本容量,增加不同地域的样本,以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参 考 文 献]

- [1] Luthans F, Luthans K W, Luthans B C.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yond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J]. Business Horizons, 2004(6):45.
- [2] 徐长江. 工作压力系统研究: 机制、应付与管理[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5):59.
- [3] Fred Luthans. The need for and meaning of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2(4):695.
- [4] 仲理峰. 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07, 39(2):328.
- [5] Seligman MEP, Csikszentmihalyi M. Positive psycholog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55):5.
- [6] Masten AS. 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56):227.
- [7] 王雁飞, 朱瑜. 心理资本理论与相关研究进展[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7, 29(5):32.
- [8] 舒晓兵. 管理人员工作压力源及其影响——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比较[J]. 管理世界, 2005(8):105.
- [9] 张辉华, 李爱梅, 凌文铨, 等. 管理者情绪智力与绩效的关系: 直接和中介效应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09(12):104.
- [10] 孙晓龙. 心理资本干预与应对[J]. 经济与管理, 2009, 10(10):6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93-04

股市波动对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分析

卓荣康, 张亮旭

(兰州商学院 金融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运用GMM方法对我国2000—2012年上市银行资本缓冲与股市周期波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银行资本缓冲具有显著的逆股市周期效应;股市会通过银行信贷影响银行资本缓冲;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资本缓冲均具有逆股市周期效应,但中小型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与股市周期的同向变动关系更为紧密也更显著。

[关键词]资本缓冲;逆股市周期效应;GMM估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16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到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造成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全球经济普遍衰退,从而引发了关于改革和创新金融监管的广泛讨论。新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建立银行业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政策框架,得到了各国监管部门的广泛认同。

目前,学术界关于银行资本缓冲的研究均是分析其与经济周期的关系^[1-6],即资本缓冲到底具有顺经济周期性还是逆经济周期性。然而,目前我国大量银行资金通过合规或违规的渠道进入股市^[7-8],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则必然会通过股市提前反映在资产的价格上,使得银行资金出现巨额损失,给银行业的稳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理论认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运行状况提前反映了经济运行的状况,若股市运行出现危机则预示着经济也将出现紊乱。股市的运行和经济的发展二者紧密关联但又并非同步,这给逆周期监管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困难。显然仅依赖逆经济周期资本缓冲还很难应对股市危机给银行资本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逆股市周期的资本缓冲策略值得关注。

迄今为止,关于股市与商业银行资本约束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Ito T等^[9]对1990—1993年日

本83家主要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日本监管当局允许银行将其所持股票45%的潜在资本收益计入二级资本,因此日本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对股票价格波动的敏感度较高。当股票价格下降时,银行潜在的资本收益将迅速减少,进而导致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瞿强^[10]认为资产价格的下跌导致银行信贷萎缩是通过资本约束实现的,资产价格的下跌首先会导致银行资本的下降,而资本约束的存在使得银行不得不收缩信贷规模。郭伟^[11]在理论上认为资产价格上涨/下跌通常会使得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上升/下降。上述研究均认为银行资本充足率具有逆股市周期性^[6],即在股市上升时,银行资本充足率增加;股市下跌时,银行资本充足率减少。由此推论,银行资本缓冲也具有逆股市周期性,银行在股市繁荣时提高其资本缓冲来应对股市萧条时给银行资本带来的损失。本文拟以2000—2012年我国上市银行数据为样本,运用GMM方法进行分析,从而探究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缓冲是否具有逆周期性。

一、研究设计、变量选取和样本数据

1. 研究设计与变量选取

Jokipii^[1],Stolz S等^[5]认为银行资本缓冲依赖

[收稿日期]2013-07-10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1105-04)

[作者简介]卓荣康(1988—),男,江苏省南京市人,兰州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证券投资。

于经济周期,因为经济周期会影响银行信贷风险以及特定的银行变量,如净资产收益率、不良贷款率、贷款增长率等。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资本缓冲的动态模型

$$BUF_{i,t} = \alpha_0 + \alpha_1 BUF_{i,t-1} + \alpha_2 CYCLE_t + \alpha \cdot X + \mu_{i,t} \quad (1)$$

其中, $BUF_{i,t}$ 为 t 期银行 i 的资本缓冲; $CYCLE$ 为经济周期; X 为一组银行控制变量,包括净资产收益率、不良贷款率、贷款增长率等; $\mu_{i,t}$ 是随机误差项。

但仅考虑经济周期对资本缓冲的影响是不全面的,股市的波动同样会影响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而且传统理论认为股市与经济的运行并不同步,股市将提前反映经济的运行状况。因此,经济周期对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并不能囊括股市对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银行资本缓冲必然会提前受到股市波动的影响。同时我国股市会对特定的银行变量产生影响。段军山^[12]通过资产价格波动与银行信贷关联性研究认为,我国股市的波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商业银行的利润和经营稳定。郭伟^[11]基于2004—2007年中国17家银行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股市与商业银行信贷高度相关,股票价格显著影响银行贷款增长规模。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本文的理论模型

$$BUF_{i,t} = \beta_0 + \beta_1 BUF_{i,t-1} + \beta_2 STOCK_t + \beta \cdot X + \eta_i + \mu_{i,t} \quad (2)$$

其中, $STOCK_t$ 表示股市的周期波动, η_i 用来捕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资本缓冲的影响。模型②关注的重点是 $STOCK_t$ 的系数,若系数大于0,则表明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股市周期效应;若系数小于0,则表明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顺经济周期效应。

除了分析股市周期波动对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本文还要检验这种影响路径是否真实存在,即检验股市是否会通过银行信贷给银行资本缓冲带来影响:

$$BUF_{i,t} = \beta_0 + \beta_1 BUF_{i,t-1} + \beta_2 STOCK_t + \beta_3 STOCK_t \cdot LOANG_{i,t} + \beta \cdot X + \eta_i + \mu_{i,t} \quad (3)$$

模型③引入了股市周期与贷款增长率的交互项,通过考察该交互项系数的估计结果判断股市是否会通过银行信贷给银行资本缓冲带来影响,进而确定我国股市对银行资本的影响是否由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偏离实体经济而进入股市所导致。

2009年后,我国银行业监管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2009年后大银行要求为11%,2011年提高至11.5%;中小银行2009年后要求为10%。

根据上述变化,本文的资本缓冲数据更符合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

根据研究设计,本文变量选取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

| 定义和取值方法 | 变量 |
|---------|--|
| 被解释变量 | $BUF_{i,t}$ 银行资本缓冲 = 当期资本充足率 - 最低资本监管要求 |
| | $BUF_{i,t-1}$ 银行资本缓冲滞后一期值 |
| 解释变量 | $STOCK_t$ 股市的波动 = 上证指数年末收盘价的对数 ^[13] |
| | ROE 银行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股东权益 |
| | NPL 不良贷款率 = 不良贷款/贷款总额 |
| | $LOANG_{i,t}$ 贷款增长率 |

2. 样本数据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00—2012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年度数据以及上证综合指数为研究样本,研究期间基本涵盖了一个股市周期。上市银行数据来源于各银行官方网站所披露的年报,股市指数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主要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

| 变量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BUF_{i,t}$ | 2.49 | 3.40 | -5.70 | 22.14 |
| $STOCK_t$ | 7.70 | 0.43 | 7.06 | 8.57 |
| ROE | 16.87 | 5.10 | 2.00 | 40.00 |
| NPL | 2.61 | 3.00 | 0.33 | 21.76 |
| $LOANG_{i,t}$ | 25.14 | 18.28 | -11.28 | 129.80 |

为了考察银行资本缓冲与股市周期的关系,我们首先可以观察图1所示的银行资本缓冲与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图(为便于观察,对图1中的上证综合指数数据进行了相应的线性处理),可以发现二者在2004年后基本呈现同向变动趋势,体现出银行资本缓冲的逆股市周期性,在股市繁荣时银行提高其资本缓冲来应对股市萧条时给银行资本带来的损失,避免股市的萧条影响银行经营稳定。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模型②③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根据相关的计量经济学理论可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 $BUF_{i,t-1}$ 是严格内生变量,由此而导致上述模型的OLS估计量有偏且不一致。同样,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固定效应的混合OLS估计量、组内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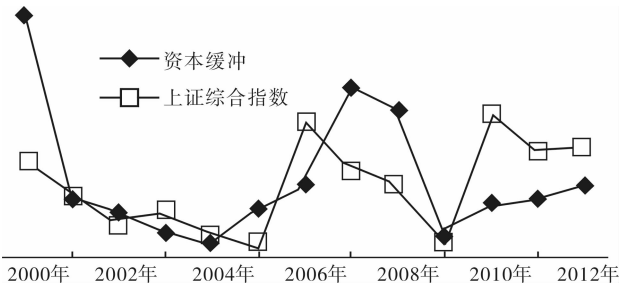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缓冲与上证综合指数的变动趋势

计量和随机效应的GLS估计量均是有偏且非一致的。为了得到参数的无偏一致估计值且由于本文样本容量较小(截面 $N = 16$, 时间 $T = 13$), 本文采用 Arellano M 等^[14]提出的一阶差分GMM方法来对上述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

1. 银行资本缓冲的逆股市周期效应

由表3可知,从上市银行整体回归结果来看,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具有显著的逆股市周期效应,即在股市上升时,银行资本缓冲增加;股市下跌时,银行资本缓冲减少。二者同向变动。 $STOCK_t$ 系数的 t 统计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控制其他变量,股市上升1个百分点,则银行资本缓冲水平增长1.3181个百分点。

表3 模型②③的GMM估计结果

| 解释变量 | 全部银行 | | 贷款增长率 | |
|------------------------------|-----------------|-------|-----------------|-------|
| | 系数 | t 值 | 系数 | t 值 |
| $BUF_{i,t-1}$ | 0.4982*** | 7.92 | 0.5365*** | 7.91 |
| $STOCK_t$ | 1.3181** | 2.00 | 5.7655*** | 3.76 |
| $STOCK_t \times LOANG_{i,t}$ | | | -0.1938*** | -4.75 |
| ROE | -0.2599** | -2.32 | -0.2502** | -2.49 |
| NPL | -0.0881 | -0.39 | -0.2391 | -1.41 |
| $LOANG_{i,t}$ | -0.0703* | -1.86 | 1.3939*** | 4.43 |
| $AR(1)$ | -2.4927(0.0127) | — | -2.1064(0.0352) | — |
| $AR(2)$ | -1.4136(0.1575) | — | -1.2151(0.2243) | — |

注:***、**、* 分别表示各系数的估计值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AR(1)$ 、 $AR(2)$ 分别表示一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因为即使 $\mu_{i,t}$ 不存在序列相关,其差分项 $\Delta\mu_{i,t}$ 也必然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因此我们重点关注 $\Delta\mu_{i,t}$ 是否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即 $AR(2)$ 是否显著),前者为检验值,后者为 p 值。表4、5 同此。

正是由于这种逆股市周期效应,在股市出现危机进而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时,银行有足够的缓冲资本来抵御这种外部冲击,从而避免银行倒闭风险。

其他控制变量,资本缓冲的滞后一阶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了银行资本缓冲具有显著的动态连

续性,前期资本缓冲是当期资本缓冲重要来源之一,也验证了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合理性。不良贷款率和贷款增长率与资本缓冲负向变动,这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而净资产收益率与资本缓冲负向变动,对此, Milne A^[15]认为高水平的净资产收益可以代替资本抵御银行收到的外部冲击,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则资本缓冲可相应减少,故二者方向相反。

2. 股市通过银行信贷对银行资本缓冲的影响

表3中 $STOCK_t \times LOANG_{i,t}$ 的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 $STOCK_t$ 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银行资本缓冲确实存在逆股市周期效应,但该效应受 $LOANG_{i,t}$ 影响, $LOANG_{i,t}$ 越大就越会减弱资本缓冲的逆股市周期效应。这也验证了股市确实会通过银行信贷对银行资本缓冲造成影响。我国银行信贷资金已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市,银行信贷增加则流入股市的资金也必然增加,这使得银行背负了额外的风险加权资产,从而降低了自身的资本充足率。

3. 在不同所有制结构及规模下,银行资本缓冲的股市周期效应

在表4中,通过模型②的计算结果比较可以发现,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这些大型国有控股银行,以及其余上市银行即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资本缓冲均具有逆股市周期效应,但中小型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与股市周期的同向变动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显著。从净资产收益率估计结果来看,大型国有控股银行系数并不显著,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系数显著。这表明相对于大型国有控股银行而言,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资本缓冲更加重视留存收益等内源资本调整途径。

4. 稳健性检验

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所有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均经过怀特异方差修正,从而使估计结果更加稳健。同时所有模型的序列相关检验表明,随机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在文中,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 $BUF_{i,t-1}$ 系数 β_1 的混合OLS估计量和固定效应组内估计量相对于其真实值分别存在向上偏误和向下偏误,而 Roodman D^[16]认为上偏误和下偏误构成了该滞后项估计值的上限和下限。因此,我们可以用 $BUF_{i,t-1}$ 系数 β_1 的混合OLS估计值和固定效应组内估计值来判断本文GMM估计的有效性。检验结果(见表5)表明本文

$BUF_{i,t-1}$ 系数 β_1 的GMM估计值位于其混合OLS估计值和固定效应组内估计值之间,GMM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表4 不同所有制结构及规模银行的GMM估计结果

| 解释变量 | 大型国有控股银行 | | 中小型股份制银行 | |
|---------------|-----------------|--------|-----------------|-------|
| | 系数 | t值 | 系数 | t值 |
| $BUF_{i,t-1}$ | 0.4481*** | 3.50 | 0.3981*** | 4.19 |
| $STOCK_t$ | 0.8770** | 1.97 | 1.7228*** | 2.72 |
| ROE | -0.0419 | -0.30 | -0.2348*** | -3.42 |
| NPL | 0.5853 | 1.41 | -0.1087 | -0.67 |
| $LOANG_{i,t}$ | -0.1392*** | -10.80 | -0.0484** | -2.54 |
| AR(1) | -2.0079(0.0447) | — | -2.2859(0.0223) | — |
| AR(2) | 1.4964(0.1346) | — | -1.5346(0.1249) | — |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 分类 | β_1 混合 OLS 估计 | | β_1 固定效应估计 | |
|----------|---------------------|------|------------------|------|
| | 系数 | t值 | 系数 | t值 |
| 全部银行 | 0.5827*** | 8.84 | 0.3296*** | 4.22 |
| 贷款增长率 | 0.6223*** | 9.66 | 0.3625*** | 5.11 |
| 大型国有控股银行 | 0.5675*** | 4.76 | 0.4474*** | 3.03 |
| 中小型股份制银行 | 0.5798*** | 7.43 | 0.3036*** | 3.36 |

三、结论

本文基于2000—2012年我国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一阶差分GMM估计法,对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周期效应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上市银行资本缓冲具有显著的逆股市周期性,表明即使股市出现大幅波动,上市银行也能够有足够的资本来应对。银行资本缓冲具有显著动态连续性,前期资本缓冲是当期资本缓冲重要来源之一。银行贷款增长率和不良贷款率均与资本缓冲负向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银行资本缓冲的逆股市周期效应。

(2)股市会通过银行信贷对银行资本缓冲造成影响。我国银行信贷资金已有相当部分偏离实体经济转而进入虚拟经济,一方面助推了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另一方面又使得银行资金面临巨大风险。

(3)股市周期对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资本缓冲影响基本一致,二者均具有逆股市周期效应,但中小型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与股市周期的同向变动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显著。同时,相对于大型国有控股银行,中小型股份制银行的资本缓冲更加重视留存收益等内源资本调整途径。

[参 考 文 献]

- [1] Jokipii T, Milne A. The cyclical behaviour of European bank capital buffer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8, 32(8):1440.
- [2] García-Suaza A F, Gómez-González J E, Pabón A M, et al. The cyclical behavior of bank capital buffer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size does matter[J]. Economic Modelling, 2012, 29(5):1612.
- [3] Tabak B M, Noronha A C, Cajueiro D. Bank capital buffers, lending growth and economic cycl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Brazil[J].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11(4):1.
- [4] Coffinet J, Coudert V, Pop A, et al. Two-way interplays between capital buffers, credit and output: evidence from French banks[M]. Banque de France, 2011.
- [5] Stolz S, Wedow M. Banks' regulatory capital buffer and the business cycle: evidence for Germany[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1, 7(2):98.
- [6] 蒋海, 罗贵君, 朱滔. 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研究:1998—2011[J]. 金融研究, 2012(9):34.
- [7] 吴晓求, 宋清华. 我国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研究[J]. 管理世界, 2001(4):86.
- [8] 马光远. 数千亿信贷资金流入股市风险堪忧[EB/OL]. (2009-03-01)[2013-05-10].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3/content_10920869.htm.
- [9] Ito T, Sasaki Y N. Impacts of the Basle capital standard on Japanese banks' behavior[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8.
- [10] 瞿强. 资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81.
- [11] 郭伟. 资产价格波动与银行信贷:基于资本约束视角的理论与经验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 2010(4):22.
- [12] 段军山. 股票价格波动对银行稳定影响的理论及经验分析[J]. 金融论坛, 2006, 11(6):53.
- [13] 杨高宇. 中国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1(10):026.
- [14] Arellano M, Bond S.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2):277.
- [15] Milne A. The inventory perspective on bank capital[R]. London: Cass Business School, 2004.
- [16] Roodman D. How to do xtabond2: an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ce and system GMM in stata[J].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2006(103):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097-05

是“两结合”还是理想化现实主义

——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论

刘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 广西 柳州 545007)

[摘要]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工农兵文学,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是“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是“理想化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一方面要求作品一定要表现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品集中地、强烈地、典型地体现阶级斗争的形势,呈现分明的阶级阵线和人物鲜明的阶级本质,体现党的阶级政策。“理想化现实主义”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工农兵文学的急功近利性减弱了其文学性;其次,这一创作方法采用了统一的、规范化的认识和运用,以致造成工农兵文学的趋同化和类型化,如果对其允许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是不会影响文学的多样化的。

[关键词]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两结合;理想化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17

对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两结合”创作方法,在“文革”之前虽然有争议,但理论界一般都将其认作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后至新时期之前我国文学创作方法的标志。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却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有人问:“两结合”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吗?^[1]更有人指出:“两结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怀疑^[2]。

回首争议的前前后后,一个问题萦绕在笔者的脑际:姑且认定“两结合”是1958年之后中国主流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创作方法,那么在1958年这一创作方法提出之前,工农兵文学采用的是一种什么创作方法?进而还有一个问题: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整个工农兵文学有没有统一的创作方法?如果没有,那么该怎样理解工农兵文学的整体性?如果说有,那这一创作方法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文学的创作方法与作品的形态是直

接相关的,因此研究创作方法关系到对整个工农兵文学的认识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对工农兵文学争议颇多的情势下,对其创作方法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两种创作方法的提出以及各自的涵义

实际上,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之前,工农兵文学的倡导者毛泽东早就提出了他对创作方法的主张。1938年4月,他在对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即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3](P16)}这反映出他一方面主张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他提倡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描写生活,但这“生活”又不是原本的形态,而是融进了理想的“现实”。他又说:“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

[收稿日期]2013-07-03

[作者简介]刘江(1948—),男,广东省梅县人,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3](P16)}基于此,笔者曾把他的主张概括为“理想化现实主义”^[4]。1939年5月,毛泽东在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时,又一次重申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3](P24)}重申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现实主义与理想的联系。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创作方法的问题,但是他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3](P64)}。这里对“普通的实际生活”和“理想”的强调,也是对“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表述。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工农兵文学在初创时期,就有统一的创造方法的指导。或者说,早期的工农兵文学,它所奉行的创作方法是理想化现实主义。

至于“两结合”的问题,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时指出:“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5]这里说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者“对立的统一”,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两结合”,但“统一”自然有“结合”的意味,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式称之为“结合”的是郭沫若。在1958年4月出版的第7期《文艺报》上,郭沫若发表了就《蝶恋花》答该刊编者的信,信中称毛泽东的这首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而更大规模地宣传“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则是周扬,在同年6月1日的《红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对“两结合”作了理论上的阐释和论证。

然而,“两结合”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什么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什么相结合?“文革”之前最具权威的解释者是周扬,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中,强调的是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意味着理想,革命的浪漫主义则是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5]因此,所谓“两结合”,指的就是现实主义所体现的生活的“自然”式样,同浪漫主义的“理想”的结合。也就是说,作品一方面要表现生活的原本形态,另一方面又要体现革命的理想。在当时,人们特别强调理想、想象和夸张。^[6]在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正式确定了这种创作方法,并以之取代了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5]

二、对工农兵文学总体创作方法的认定

其实,所谓“结合”,应该是两者本质特点或独特因素的结合,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却并非如此,因为“理想”并非是浪漫主义的本质特点,亦非他的独特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两结合”并非是本质意义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正因如此,“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否存在,确实是值得怀疑的,需要作深入的论证。

笔者要进一步论证的是:既然“理想化现实主义”是提倡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去描写生活,但这生活又不是生活自然的原本的形态,而是融进了理想的“现实”;而“两结合”,也就是现实主义所体现的生活的自然式样同浪漫主义的“理想”的结合。可见,两者都特别强调“理想”。如此一来,我们很快就能找到“理想化现实主义”和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两结合”)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共同性或一致性:一方面按照生活的自然面貌去描写生活,另一方面从中表现出理想。这样,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两种创作方法其实是一样的。实际上,所谓“两结合”,其实就是“理想化现实主义”。或者说,就是周恩来谈到“我们的现实主义”时所说的“理想的现实主义”^[7]。

还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周扬说的“两结合”,他提出的现实根据是“当前”即“大跃进”时代的特点和需要^[5],认为在当时全民奋进而又困难重重的政治情势下,文学应该以革命的理想激励人们前进,着意于表现理想,实际上是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才又另外增加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5],所以,“两结合”只是在某种特定时代的一种特有的说法而已,并不是“理想化现实主义”之外的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理想化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统称为“理想化现实主义”。这也就是说,从1940年代初工农兵文学诞生开始,它所采用的就是“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1940年代初至1970年代后期历时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的创作实际看,“理想化现实主义”也的确是工农兵文学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理想化现实主义”,不但是—种创作手法,更是一种创作精神。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对其解读的关键在于对“理想”的理解上。

毛泽东在强调“理想”之后,紧接着说:“在现状

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3](P16)}毛泽东所说的“理想”,就是“光明和希望”。所谓“理想化”,就是要在作品中表现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而“理想化现实主义”,就是不但“在现状中看出缺点”(这“缺点”包括工作中碰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更是要“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工农兵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即早期的工农兵文学,就是依照这一精神去表现生活的。例如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所表现的就是:新的婚姻、爱情观念在同旧的传统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重重困难和挫折,但终于结局圆满,心想事成。它让广大工农兵群众看到了婚姻爱情的“光明和希望”。同样,反映土改运动的《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描写的都是工作队进村后,虽然遇到了地主阶级的反抗和破坏,但在贫下中农的支持下,终于斗垮了地主,取得了土改斗争的胜利;反映抗日斗争的《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所描写的也都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斗争中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最终战胜了日寇……这些作品无一不展现出革命的前景,展现了工农兵的革命理想。

在“文革”之前即中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中,这种不但“在现状中看出缺点”,更要“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即特别重视展现革命理想的创作思想,同样表现明显。比如反映大革命运动的《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等,同样不但写出了革命所受到的挫折,更是写出了最终取得的胜利;反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上海的早晨》,也一方面写出了改造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艰难,又写出了最终这一改造又得以胜利完成;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也是一方面写出了运动中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又写出了最终是以胜利告终。即使是那些不是反映政治运动而是反映新的精神生活的作品,如《新结识的伙伴》《李双双小传》等,也是一方面写出种种思想矛盾,又写出了最后新思想得以确立。甚至那些“文革”期间被认为是工农兵文学消亡期出版的作品,如《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金光大道》等,也莫不如此,都是以革命的胜利、理想的实现为结局的。

上述是对“理想”的一种理解,也是“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内涵之一。还有另一种理解,或者说“理想化现实主义”还有另一种内涵——在上面的相关引文中,毛泽东是把“理想”与“集中”、“强烈”、“典型”相联系的。这又告诉我们:“理想化现实主义”

不但要求“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而且要做到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比实际生活“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强烈”^{[3](P64)}。只有“更集中”了、“更典型”了、“更强烈”了,才能做到“更理想”,从而达到“理想化”的效果。也就是说,作品的故事和人物,要“集中”地、“典型”地、“强烈”地体现出党的革命思想和政策,表现出工农兵群众的精神,突出地表明作者的“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3](P49)},这才是“理想化”。“文革”之前的工农兵文学,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抗日斗争的各种描写,都比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地表现出斗争的形势,从而也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地凸显工农兵的革命精神和政策精神。那些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地主、富农的暗中阻挠和破坏,中农的徘徊、动摇,贫下中农的坚定,已经成为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这框架是完全符合工农兵的阶级立场的,完全符合“理想化”的原则的;而日寇的凶残,汉奸的为虎作伥,八路军的不怕艰难、不怕牺牲,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以及最终的胜利,也成了表现抗日斗争作品内容的基本框架。同样,表现社会新面貌的作品,也都“理想化”地写出当时各种“新”的思想和精神。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大字报”、“大锅饭”等。总之,工农兵文学作品,都是“理想化”地展现党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党的政策,“理想化”地展现工农兵的理想和工农兵群众的革命精神。

三、“理想化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比较

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中,多是把“两结合”之前即1958年之前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面的相关引文中所说“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表明了这一意思。

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在“两结合”提出之前,我国文艺界、学术界所讲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正如上面所说,实际上奉行的创作方法是“理想化现实主义”。之所以声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在学习苏联的背景下,我国表明的一种“学习和“顺从”的姿态罢了。事实上,我国所奉行的“理想化现实主义”,与苏联奉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国的工农兵文学在“理想化现实主义”特别是“理想化”的思想指导下,尽管说要表现生活的原

本形态,但作品中的生活面貌,其实同实际生活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或者说有不少的差异。我们认真审察一下会发现,无论是早期还是中期的工农兵文学中的人物和故事即使描写得生动逼真,但都不完全是生活的自然面貌。这表现在:描写政治运动的作品,都有明显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思想影子。一些作品如《三里湾》,因为作者赵树理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对于“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他见到的不具体^[8],所以没有写出,因而就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而广东作家陈残云的《香飘四季》,从“阶级斗争生活的移位”等三个方面改写了当代文学中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模式^[9],在1960年代就得不到一些批评家的认可。生活事件中阶级阵线的分明、人物性格中阶级本质的突出,是工农兵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也是它们失真或者说部分失真的表现。这样,它们就成了宣传革命的“思想的教科书”。而作品中对人物、事件“理想化”的政策处理,又使它们成了“政策的读本”。

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不同,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10],它虽然也有“理想”,但其核心并不是理想化,而是“写真实”,即要真实地反映苏联的生活,写出生活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依照这一要求,苏联文学的故事情节都是生活的自然形态,即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按照作家的臆想去编造生活。例如法捷耶夫的《毁灭》,它写一支队伍在抗击白军时,以冲出包围圈时损失许多战士,队伍被击溃而告终。作品在构思时原本要把主人公美谛克写成自杀的,后来却没有这样描写,这是因为作家遵循生活的“自身的逻辑”,主人公“带领着艺术家向前走”,终于“没有力量自杀”^{[11](P373)}再如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它写一支被击溃的苏维埃军队和无组织的农民,在撤退时,因为抱怨苏维埃政府不能给他们办事,不能保护他们,因而不愿意服从长官的命令……直至最后,他们受尽了千辛万苦,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他们才感觉到:“是的,唯一的救星是——苏维埃政权”。作者说:“我取了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不服从自己长官的、时时刻刻都预备着要把自己的领袖杀害了的群众,经过了艰难,经过了痛苦,率领着他们一直到了他们觉得自己是组织的力量的时候为止。对于我,这已经足够了。”这样写革命的“铁

流”,完全是从生活出发的。他特别强调:“在文艺作品里首先要免除的是撒谎和粉饰现实。”^{[11](P300-309)}同样的情形还表现在《夏伯阳》(《哈巴耶夫》)、《母亲》等作品中。事实已经很明显:苏联文学遵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坚持写真实、坚持从实际生活出发。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作品,都保持了生活的原本样式,从而显得自然和亲切。

正因“理想化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不小的差别,所以笔者认为:“两结合”之前的工农兵文学采用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四、对于“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思考

1. “理想化现实主义”的急功近利性和工农兵文学文学性的减弱

创作方法的采用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与写作的目的有关,或者说,创作方法为写作目的所决定。古典主义文学如拉辛的悲剧,之所以严格遵守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是由于这样做符合实际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指戏剧创作服从理论的支配,服从封建王权的统治。^{[12](P94)}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之所以采用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充当“社会”的“书记”的职责,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12](P265)},是因为他要给人们生动地描绘出法国在1816—1848年间,在资产阶级上升和封建势力逐步崩溃时期,整个人欲横流的社会面貌^{[12](P265)};而西方现代派文学之所以采用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方法,就是因为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日益加深,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彷徨、迷惘、不满、痛苦、失望甚至绝望的作家,认为传统的创作方法不能充分表达他们的内心感受,从而努力寻求别的艺术手段来表现他们特殊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12](P364)}。

而工农兵文学的创作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3](P49)},它的本质是人民性^[13]。别的同样以人民性为本质的文学如五四新文学、苏联文学,虽然也十分重视教育性,但旨在潜移默化,而工农兵文学却强调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正是这一急功近利性,促使它要采用“理想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种“理想化”地对现实生活的处理,能直截了当地、尽快地、理想地宣传推翻旧制度,解放劳动

群众的革命思想和党的阶级政策,并使人民群众充满胜利的信心。但这样一来,又减弱了工农兵文学的文学性。从这一方面看,“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理想化现实主义”的规范化和工农兵文学的趋同化

当然,正如尼采所说,凡是存在的,同时是合宜的和不合宜的,而两者都对。^[14]“理想化现实主义”的存在自有其合宜的一面,也有其不合宜的一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使不合宜变成合宜。而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怎样来运用这一创作方法。

实际上,创作方法是有限的,而作品的式样和面貌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不同的作品,描写的生活事件不同,对生活事件的理解和认识更是不同,因而对事件的处理也会有所不同。由此,作品体现出来思想意义也就不同。同是批判现实主义,在巴尔扎克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上流社会即那些贵族男女身上,他唱的是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15](P136)};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却是无情地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15](P175)},同时也暴露出他“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在西方,许多名著都是采用同一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这足以证明创作方法和作品多样性共存的可能性。

但是我国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却不然:反映土改的、反映抗日的、反映农村合作化的同类作品之中,生活事件及其发展脉络几乎都是相同的,因而作品呈现出类型化、趋同化的面貌。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理想化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认识的“规范化”,所带来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一律化处理,必然使作品出现趋同化现象。这又说明,文学创作不但可以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而

且对于同一的创作方法,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和保证文学创作的多样化。

[参 考 文 献]

- [1] 吕兆康.“两结合”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吗?[J].文艺理论研究,1980(1):46.
- [2] 崔志远.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历史考察与反思[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67.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4] 刘江.论工农兵文艺的理论体系[J].焦作大学学报,2011(4):44.
- [5] 吕林.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87.
- [6] 郭志刚,董建,陈美兰.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8.
- [7] 周恩来.周恩来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53.
- [8] 董之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06(4):84.
- [9] 惠雁冰,任霄.从“负重”到“从轻”——论《香飘四季》对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写[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87.
- [10] 王凤.简明语文知识辞典[K].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189.
- [11] 宇清,信德.外国名作家谈写作[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12] 潘翠青.西方文论辨析[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 [13] 刘江.工农兵文学本质论[J].开封大学学报,2012(4):51.
- [14]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刘琦,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96.
- [15]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102-04

禅学思想在产品中的应用

兰海龙¹, 李辉²

(1.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艺术设计系, 河南 郑州 450015;

2. 郑州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禅学让人从内心体会自我与宇宙的关系,应用于工业设计,能使产品超越功能主义,提升到心灵层次的诉求。禅包括定、慧两部分,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产品设计就是一个由“慧”到“定”的过程。在设计产品时要明确状态“定”和手段“慧”的关系,完成从“不定”到“定”、“不慧”到“慧”的转变。禅的传播方式是看破不说破,要自己来领悟,设计中使思想意念达到沟通的境界就是这一点的妙用。禅讲求的是顿悟,顿悟渐修、渐修顿悟、渐修渐悟也体现在设计实践中。在禅学思想指导下设计的产品更加实用、更加简洁、更加人性化,因而更安静、更智能、更环保、更体贴,有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作为中国本土设计师和设计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条件、有能力将中华传统的思想文化及精神传承下去,在产品设计中积极阐释和运用禅学思想,从而使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关键词]禅学;顿悟;产品设计

[中图分类号]J50-02;B946.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18

近年来,很多国外设计师开始关注禅学在产品中的应用,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禅意”产品。对于产品设计来说,禅学思想的指导是非常有价值的,禅学蕴涵的深远的哲学意义,可能会使产品设计产生一次大的飞跃。日本和北欧的设计师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设计实践,试图展现禅学在产品中的妙用。我国设计教育工作者及设计师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但大多停留于理论研究层面。本文试图通过切身实践和设计作品,结合国外优秀产品设计,阐述禅学对现代产品设计的巨大应用价值。

一、禅学与产品设计

禅学是佛教的一个分支,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由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从印度传到中国,是佛教“禅那”的简称,梵语的音译。禅学是佛教的一种思想,它通过让人从内心体会自我与宇宙的关系,领悟世间万物的本质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不提倡用已有

的知识、逻辑来解决问题,认为最容易且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用源于自我内心的感悟来解决问题,寻回并证入自性。其理论认为,这种方法不受任何知识、任何逻辑、任何常理束缚,是真正源自于自我(你自己)的,最适合解决自我(你自己)问题的。因而可以把禅理解为是一种最为简单、最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产品设计是随着西方机械大工业的兴起而产生的年轻行业,它是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信息处理过程,通过线条、符号、数字、色彩等把产品展现在人们面前。它将人的某种目的或需要转换为一个具体的物理的或工具的过程,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实际的载体,以美好的形式表达出来。产品设计也是在解决问题——通过产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产品设计的宗旨是通过产品的本体,满足人的生理或心理的某种欲望。而如何面对欲望、如何合理地控制欲望,这是禅学思想所涉

[收稿日期]2013-06-28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QN-547)

[作者简介]兰海龙(1979—),男,北京市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产品设计。

及的重要内容。产品设计涉及产品的使用方式、产品如何操作以及如何与人沟通等问题,这在禅学思想中表现为“悟”,即无需通过太多的言语和文字的描述,人通过内心的感悟,了解身边的事物、身边的自然、身边的人、身边的一切。具有“禅意”的设计应在使用方式和操作方式上都能让人通过“悟”来体会。产品设计讲求外形的美观大方,禅学从最朴素的思想着手,追求心的宁静,质朴无瑕,回归本真,即从最无华的状态参透人生。禅学思想的正确解读为设计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禅学的朴素思想对产品外观线条设计、产品材质选择、产品与用户交互设计等方面都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国外的产品设计师从很多年前就开始研究禅学思想,有些设计师还进行相关的佛教修行,以使自己的身心更加贴近禅的真谛。作为一名中国本土的设计工作者,对于禅学之于产品设计的指导意义应有更深的领悟与广泛的实践。

二、禅学思想精髓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禅学思想讲求“体悟”,善于用简短的故事让听者自己领悟其中的禅意,因此,禅给人的最初印象是松散的、无序的、不可琢磨的。其实这只是禅给我们的表象。禅的中心思想体系还是相当明确的,并且这些思想对产品设计的启发具有具体的、可操作的指导意义。下面我们通过禅学的几个典型思想来分析一下它们对产品的影响。

1. 定与慧

“定”与“慧”是禅学的主要思想之一,“定”主要体现在印度的禅学思想中,“慧”则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禅学思想中。据胡适考证,印度的“瑜伽”就是印度禅。“瑜伽”在印度出现得比佛教还要早,“瑜伽”在梵文中是“管束”的意思,就是说如何能把我

们的心管好、训练好。它主要是讲一种苦修,修炼方法有打坐等,打坐就是要人人“定”,“定”又名“三昧”,就是制心一处,全神贯注所观之境,不使散乱。因定心能启发智慧,故云:“慧依为业”。“慧”乃“睿智”的意思,就是正确了解诸法真象及契合真理的正确认识,有分别事理、决断疑念之作用。中国禅注重一个“慧”,就是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运用智慧想出办法来。但“定”与“慧”在中国的佛学中是互相帮助的。胡适曾说,禅实在能包括定、慧两部分。因为要用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所以有人合称慧定。一般的来讲,禅是先定后慧,就是说学禅要先进入定的状态,然后才能生出大智慧。“慧”通于“善”、“不善”、“无记”三性。“恶慧”中,作用强者称“恶见”,为五见之一。“善慧”又作“正见”、“正慧”。依俱舍论之说,“慧”系与任何心所皆有相连属之作用,为大地法之一,唯识宗谓慧为别境五心所之一。此外,“慧”与“智”为相对之通名,达于有为之智相称“智”,达于无为之空理则称“慧”。

产品设计就是一个由“慧”到“定”的过程。“定”为一种状态,例如设计一把椅子,当你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时,你处在“定”,这个“定”是由你的内心给你的,因为你需要一个舒适的“坐”的状态。但是这个“定”是由“慧”来实现的,即通过设计的“慧”,选择最合理的形式来实现椅子的最终形态。所以我们在设计产品时要明确状态(“定”)和手段(“慧”)的关系。如日本建筑家坂茂设计的卷筒卫生纸(见图1)就很好地诠释了产品设计中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卷筒型卫生纸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它的结构相当简单——圆筒型卷轴加缠绕在其上的卫生纸,我们几十年来一直接受这样的设计,很少有人对它提出怀疑或者有过改良的设计念头。卷筒卫生纸设计的目的是使用户能够方便快捷地抽取,这是它的“定”,而手段是通过卷轴滚动的方式,

这是它的“慧”。禅学追求“定”与“慧”协调,只有协调了,万物才能顺畅发展。但是传统卷轴卫生纸的“慧”并不是最好的,我们在拉动卫生纸的时候经常由于不小心而多抽出很多,于是不得不起用掉,从而造成浪费。坂茂的设计就是从这一点着手,重新定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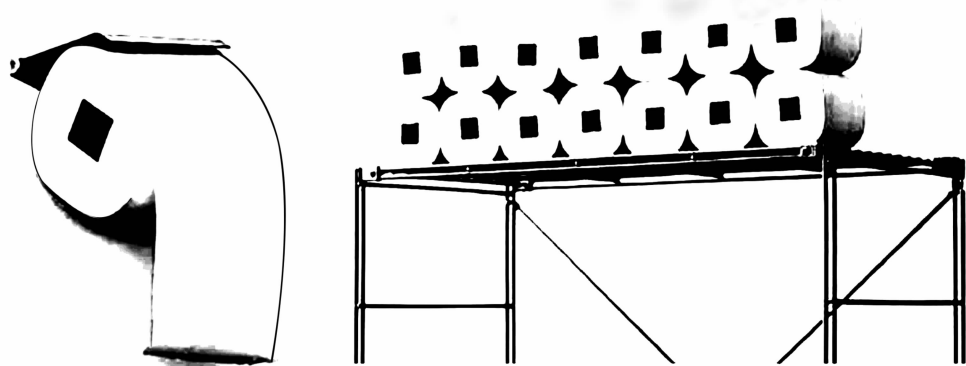


图1 方形卫生卷纸(坂茂)

卷筒卫生纸的使用手段,他将卷轴设计成方柱状,这个小小的改良使卷筒卫生纸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有圆弧倒角的大方柱,这样在使用卷纸时不再是自由转动,而是“有阻碍地转动”——每转动90度都会被卡一下,并使卷纸盒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这就解决了我们一不小心抽出过多卫生纸的问题。目的没有变,手段发生了小小的改良,改变的却是“定”与“慧”的关系。卷纸从“不定”到“定”的转变,使它的工作方式实现了从“不慧”到“慧”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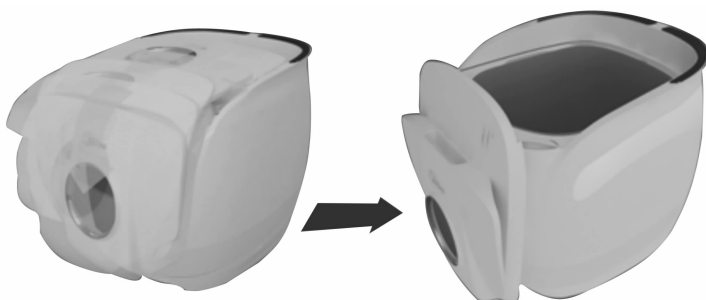
笔者在“慧”与“定”的关系探索中也做了一些设计尝试,如图2所示的电饭煲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款为国内某知名品牌设计的电饭煲样机,从外形曲线到操控方式上都与以往日常使用的电饭煲有所不同,其在使用方式上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可滑动的顶盖。与传统的电饭煲相比,其顶盖采用了滑动设计,既保证了电饭煲的紧凑性,又使开盖过程变得轻松自然。用户每次打开电饭煲的过程都有“拨云见日”的感觉——滑开盖子即见热气腾腾的米饭,并且在滑动盖子的同时使用户能够清楚地体验电饭煲侧面优雅的曲线。每次开关顶盖对用户都是一次愉悦的体验,也是用户与电饭煲交流的过程,这种过程加深了用户与电饭煲的交流,也为“焖米饭”这件简单而无聊的工作增加了几分期待和乐趣。电饭煲的“开”与“关”的状态我们可以理解为禅的“定”,即我们想要的结果;而“滑动”的方式相当于禅的“慧”,即我们所选择的方式。

2. 道不可道

禅的传播方式是看破不说破,是不需言语的传述,即是中国人讲的“道不可道”,需要自己来领悟,在设计中用思想意念达到沟通的境界就是这一点的妙用——产品的外观和操控不需要太多繁复的说明,消费者能通过本能的感悟体会到产品所传达的

使用信息,感受设计者的用意,通过产品来达到心性的沟通与交流,这便是好的设计。如图3是笔者2012年设计的一款汤碗,取名为“skirt bowl”即“裙碗”。这是一款传统的中国瓷碗,由骨瓷烧制而成,与普通的汤碗相比,它的碗肚部分多了一圈向外翻的窄边,很象是穿了一件超短裙,因此而得名。当然,这个裙边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美观,而是有具体的实用功能的。我们在端热汤碗的时候为了使其不致烫手,常会把汤碗事先放在托盘上或者用布垫在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端汤碗的难度,并且使端碗的过程变得复杂而无趣。“裙碗”的设计从碗的结构上着手进行了小小的改进,“裙边”的结构相当于在碗肚的部分多设计了一个碗口的结构,这种窄边结构既便于四指抓握,又能像碗口一样快速将热量散失,从而避免端热汤时烫手。这种设计是从禅学“道不可道”的思想出发而产生的,从外形和结构来看,“裙碗”并没有为了功能的增加而额外增加过多的附件和材料,新设计并未破坏中国传统瓷碗固有的简洁和优雅的气质,反而增加了情趣和韵味。在使用过程中,用户会自然而然地将四指放在“裙边”的位置,无需太多的说明和指示,当徒手端热汤变得轻松时,用户会由衷地对“裙碗”这个结构设计所体现的对用户的体贴而欢喜,就如深泽直人的壁挂CD机一样,用户在拉动开关绳子后,一切都变得那么自然,无需太多解释。碗与人的交流在一种自然的默契中进行并完成。

产品设计过程是一个产品设计师通过产品同消费者进行沟通的过程,很多产品设计的着重点放在“这样最好”、“独一无二”的强烈归属感和拥有感上,通过强烈的视觉、听觉、触觉感官刺激来提高产品的吸引力和附加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产品的浮夸造作气质,同时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过度设计”和浪费。这种设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一



顶盖滑动开启

顶盖滑动开启后状态

图2 滑盖电饭煲(兰海龙)



图3 裙碗(兰海龙)

度成为设计的主流,以至于1970年代,“设计”一词在美国具有一定的贬义,即“过度设计”——故意强调所谓的“设计感”,使产品失去个性,失去亲切感。从禅学的角度上讲,产品设计给消费者传达的应该是“刚刚好”的满足感。这就意味着,“刚刚”中所蕴含的“抑制”、“让步”以及“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理智态度,应该得到一个中肯的评价,所以说,“刚刚好”比“独一无二”更接近真正的自由价值。目前,由于面对消费群体的不同,我们周围的产品已经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一种是以新奇昂贵的材料和夸张的造型来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和独一无二性,以限量生产来标榜品牌的价值,以创造出心甘情愿地接受其超高价格的忠实消费者为目标;另一种则是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使用最便宜的材料,竭力简化生产过程,在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国家加工,竭尽所能地降低价格(很不幸,中国的制造业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走的是第二条路线)。这两种形式都没有真正实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前者过于强调产品本身的存在感和自我价值,而后者则过分迎合成本的要求而牺牲了产品应具有的固有价值 and 魅力,牺牲了产品的最终属性。这两种形式的产品在与消费者沟通的过程中都会失去“道不可道”的意义,前者奋力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后者则将“廉价”写在脸上。朴实、亲切、自然、触摸的质感等产品设计信息都能在“道不可道”中找到切入点。笔者在设计实践中也在不断寻找最合适的素材、加工方式及商品样式,在“朴素”或“简约”中寻求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如图4所示的家用电剪刀设计,笔者从鹅卵石的形态和质感得到灵感,将传统硬朗理性的电动工具外形进行了颠覆性的设计。这款家用电剪刀没有多余的棱角和装饰,也没有粗大的散热孔和彪悍的开关旋钮,它的整体造型流畅自然,形态浑圆饱满,像河边的鹅卵石般细腻柔滑,握在手中让人产生信任与温暖的感觉,一改传统电动工具冰冷



图4 电动剪刀设计(兰海龙)

粗壮、专业性强的印象。当用户手握这把电动剪刀进行操作时,剪刀的曲线和手的曲线自然而默契地融合在一起,既能使操作过程轻松流畅,又能减少长时间工作的乏味感觉,有时用户甚至仅仅是为了感受一下它的手感,也会将其握在手中把玩一番。“苹果”总裁乔布斯说,人们对产品的喜爱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给产品起外号,二是想要抚摸它。其中第二句是很具有禅意的,所谓抚摸,是人与物的一种交流方式,是禅中“道法自然”的体现,即通过自然的感觉和体悟来了解世界,不需要文字、语言等的说明和解释,也不用费心揣摩和练习。

3. 顿悟

禅讲求的是顿悟。那什么是顿悟呢?大约在9世纪初,神会(慧能弟子)的第四代弟子宗密把顿悟总结为4种方式,即顿悟顿修、顿悟渐修、渐修顿悟、渐修渐悟。第一种是不用方法的,是自然的形成,或者说是规律或者造化,是人力不可为的,在产品设计中能借鉴的不多。第二种是可能的,天份高的人会有顿悟的感受,譬如说,我们在学画画或者下围棋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你很喜欢画画,而且领悟得很快,这是顿悟,再通过后天的勤奋最后修成正果。很多产品设计师有这样的经验,在设计的过程中,往往是头脑风暴式地发散思考,头脑中一闪的灵光在刚开始都是平等的,都是瞬间的灵感体现,但是最终会有一个或几个脱颖而出,成为主导思维方向。在此基础上,设计师进入“渐修”阶段,将这些思路进行细化、整合、取舍,于是这个最初的粗糙想法渐露端倪,成为最终决定方案的雏形。这就是设计师“顿悟渐修”的过程。第三种“渐修顿悟”便是更多的人可以感受到的,就像你做产品设计开发,画了上百个方案,突然有一天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案蹦了出来,非常优秀,那是你前面积累的结果带来的。这一点与西方的设计教育方法是雷同的,西方有句谚语说:“发疯就是方法”(Madness is method)。所谓“发疯”其实是量的积累过程,在积累的过程中渐渐向“悟”靠拢。产品设计教育的过程其实也是“渐修顿悟”的过程,通过本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不断修习产品设计的方式方法,不断研究优秀产品案例的设计思路,不断体会消费者的使用感受和使用心理,不断通过设计实践检验研修成果等,这都是在进行研修,是为“顿悟”做准备。根据个人的悟性高低,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快地“顿悟”产品设计的根本及方法,有些人可能要经过更多的“渐修”,但是这个

(下转第109页)

[文章编号]1009-3729(2013)05-0106-04

论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美学思想

张瀛

(阜阳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41)

[摘要]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美学思想与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崇古与求变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以艺载道是其重要的文化品格,文质统一是其重要的人文精神。以何震、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为代表的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大家在融汇互补中,为追求更高的精神目标和审美理想,发扬创新精神,使古老的篆刻艺术有了新的飞跃,极大地丰富了徽州的文化宝库,促进了中国篆刻艺术的发展。

[关键词]徽派艺术;篆刻;美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J292.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19

篆刻艺术是由古代印章艺术发展而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印章,即古玺印;秦汉时期印章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唐宋时期印章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书画收藏印、斋馆印、别号印、词句印等相继产生。元代玩赏金石篆刻之风渐兴,且印章与书法、绘画紧密结合,印谱、印论等相继出现。明清时期是中国篆刻艺术的大发展时期,其中徽派篆刻艺术因其美学思想与特点非常鲜明而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学界对徽派篆刻艺术尚未进行系统研究,尤其对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美学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鉴于此,本文拟对明清徽派篆刻的艺术思想、美学主张、文化品格和艺术精神等进行论述,以期繁荣当代中国篆刻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

一、崇古、求变是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重要思想基础

崇古与求变的思想是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创作的思想基础,这从明代的何震、清初的程邃等人的印学理论与艺术作品中,可见一斑。明代的何震既是徽派篆刻艺术的开宗人物,也是徽派篆刻艺术崇古思

想的典型代表。他力求古趣,用涩刀刻石仿汉,注重借鉴秦汉印的艺术传统,从而以其深厚的文字、训诂学问和精湛的书写技法,拓展、丰富了篆刻艺术。理论上,他明确指出:“学篆须博古,鼎彝、凋戈、带钩、权律,其款中字,神气敦朴,可想六书未变之笔,知此作篆书,始有趣”^{[1](P52)}。实践上,其篆刻艺术作品以挺劲清健、猛利爽快的冲刀法表现了刀与石独特的意趣,古意盎然,酣畅淋漓,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如作品“笑谈间气吐霓虹”(见图1),取法秦汉印的宽博、雄强,并继承宋元印的圆融和畅的特点,形成了端正简朴,气势恢宏,“刀笔相因”的新面貌^[2]。不仅格调高古,遒劲苍润,刀法锋芒毕露,猛利厚重,而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突出地表现了其精湛的篆刻技艺。因此,清代书画、印学家李流芳在题《茵阁藏印》中说:“印文不传以摹古为贵,难于变化合道耳。三桥、雪渔其佳处正不在规规秦汉,然而有秦汉之意矣。”^{[3](P495)}何震以崇古、求变作为篆刻艺术的基本思想要求,强化了篆刻艺术创作的自觉意识。他以猛利、遒劲、端庄、古朴、典雅的艺术创作风格,实践了“刀笔相因”的篆刻艺术主张,创立了“去繁缛求简洁,去板滞求空灵,去芜杂求纯正的清新面目”^[4],为后来的徽派篆刻学研究奠定了

[收稿日期]2013-08-20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F07-08D47)

[作者简介]张瀛(1960—),男,本名张莹,安徽省颍上县人,阜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学。

思想理论基础。

清初徽州地区涌现了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等一批优秀的篆刻艺术家。譬如生于歙县的程邃,其诗、书、画、印艺术均有很大成就、很高建树。其白文印师法汉印,厚重凝练;朱文印以大篆入印,欹正错落,作品于刀法生动中饶有韵致,将清隽、雄强熔于一炉。虽然其篆刻艺术取法何震,但却能在篆法、刀法、章法等方面加以创新,自成一格。譬如他能参酌古文籀体,“力变文(彭)、何(震)旧习”,博采众长。尤其以严谨的章法、奇古的笔意、厚实的刀功,形成了凝重遒劲、古秀苍逸、浑厚含蓄的风格,充满了浓郁的文人气息。其篆刻艺术不仅在明清徽派篆刻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徽派篆刻艺术力追秦汉的美学境界。巴慰祖刻印师承秦汉,严谨稳重,温厚典雅。胡长庚、汪肇隆两人治印,则以深厚的金石文字学功底,将青铜器铭文引入印文,与巴慰祖一脉相承,婉约清丽,底蕴厚重。由于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都是徽州人,又都直接和间接地以何震为宗师,其篆刻艺术创作风格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地域性,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他们的篆刻艺术影响深远,其篆刻艺术实践与理论鲜明地体现了徽派篆刻艺术崇古、求变的美学思想与特征。

明清时期以何震、程邃为代表的徽派篆刻艺术家,强调超越宋元、直追秦汉,在理论和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崇古、求变、“刀笔相因”的美学思想。他们“以文字训诂学问,力矫时俗印章篆文的舛误不经”^[4],

将篆与刻紧密结合,以刀代笔,实践着“笔法、刀法,往往相因”^{[1](P56)}的审美主张,再现了秦汉印中的镂、铸、凿、琢之美,古雅朴厚,气韵流畅,开创了明清篆刻艺术的新潮流。

二、以艺载道是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重要文化品格

何震在《续学古编》中说篆刻艺术“拨蜡为款,凸出;镂字为识,凹进。故印之阴阳文为款识体”^{[1](P55)},明确指出了篆刻艺术要具有阴阳和谐之美。林乾良在《中国印》中也说篆刻艺术的“线条美,如从阴阳来论,也不外两途:从体势论,直线属阳,曲线属阴;从外观论,毛糙属阳,光洁属阴。阴阳两美,各有其妙。”^{[5](P247)}因此,在篆刻艺术章法中,朱文为阳,白文为阴,阴阳分布,相依相生,方成佳作。可见,篆刻艺术鲜明地体现出了“阴阳之道”的美学思想。以“艺”进“道”,“艺”、“道”相通,成为篆刻艺术的最高审美追求。徽派篆刻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注重“篆法”、“书法”、“章法”的印外求印的艺术修养,突破了前代工匠治印重“刻”的技术窠臼。譬如何震率先提出了“法由法出,不由我出”,“笔画之外,得微妙法”^{[1](P56)},既强调了主客观的高度统一,也注重了学养品格的价值取向。其在艺术创作中实现了刀法、书法、章法的和谐相融,内容与风格的完美统一。这在他的“云中白鹤”等篆刻艺术作品中都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云中白鹤”(见图2)在镌刻中为了寄予情感,赋予线条以遒劲猛利



图1 笑谈间气吐霓虹(何震)



图2 云中白鹤(何震)

的动势,在刀笔的驰骋间,锋芒毕露而不失典雅的韵致;章法表现虚实相生,优雅自在,体现了他对大自然之“道”的感受,营造出舞鹤游天的自由境界。也因此李流芳评其为“新安何长卿,始集诸家之长而自为一家,其体无所不备,而各有所本,复能标韵于刀笔之外,称卓然矣”。^{[3](P463)} 徽派篆刻家依据对自然之“道”的理解、提炼,通过篆刻艺术将“艺”与“道”和谐统一起来,“复能标韵于刀笔之外”,“虽从迹入,性自神解”^[6],从而使徽派篆刻艺术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

明清徽派篆刻艺术的以“艺”进“道”,“艺”、“道”相通的审美品格,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基础。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始终秉承着“崇文重教、尚礼仗义、诚信理性”等文化精神,以印信的品格,规范自己的言行,并依此自勉自比,借物言志。特别是随着徽派文人篆刻家群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与篆刻审美认识的不断深化,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在创作中既重视儒学传统与教化功能,又高度重视篆刻艺术的主体精神与抒情达意的审美趣味。譬如进入清朝以后,随着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等徽派文人篆刻艺术家的崛起,徽派篆刻艺术的文化品格与审美价值越来越清晰,从崇古到出新,无不彰显出了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崇文重教、尚礼仗义、诚信理性”,崇尚自然、关爱生命的审美特质。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家们在篆刻艺术理论与创作实践中,努力把情与理、心与物、道与器、文与质等融合在一起,主张篆刻艺术与人们的文化生活相结合,在篆刻艺术创作实践中追求生命价值,实现人生的审美理想,从而使徽派篆刻艺术升华到“道合乾坤”的境界,开启了后世“印外求印”之先河。

三、文质统一是徽派篆刻艺术的重要人文精神

文与质的统一是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命题。在篆刻艺术中,“文”是指篆刻艺术的形式美,“质”是篆刻艺术的一种审美意境的追求,如神韵、境界、格调等超然物外的审美内涵、精神等。“文”与“质”的和谐统一对徽派篆刻艺术家的审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在学术思想上体现着“文”与“质”的和谐统一。明代沈野在《印谈》中说:“印章兴废,绝类与诗”,“印虽小技,须是静坐读书。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7](P63)}。又说:“古人云:画中有诗。今吾观古人印章,不只有诗而已,抑且有禅理,第心独知之,口

不能言”^{[7](P64)}。他以诗的创作规律来谈篆刻艺术创作,强调学养品格,以诗入印,以禅论印,把篆刻作为“抒情寓意”的手段,这种开宗明义的深刻见解,也是对徽派篆刻艺术“言有尽,意无穷”、“文”与“质”统一思想的最好诠释。

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家大都具有深厚的古文字学基础。首先,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家文化修养广博,在治印中考虑较多的是以艺载道、文与质统一的自由情思,把篆刻艺术作为抒发情感的载体。譬如明代徽州篆刻艺术家朱简在《印经》中写道:“工人之印以法论,章字毕具,方入能品。文人之印以趣胜,天趣流动,超然上乘”^[9]。其次,何震作为徽派开宗人物,提出了学篆、识篆的要求,“六书不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8],对徽派篆刻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在内容上多以词句入印,抒发情怀,彰显了文与质统一的审美意蕴。

明清徽派篆刻艺术“文”与“质”统一的审美意蕴,是将考据、文字、训诂学问,以及诗、书、画美学思想与篆刻艺术创作理念有机融合,承载着丰富的徽州人文精神,展现出了鲜明的徽州篆刻艺术精神与美学风格。譬如何震的另一方代表性印章“听鹧深处”,刀法放纵老辣,有一种浑厚之气,分朱布白,自然和谐,虚实相生,浑然一体,展现出诗的境界。程邃的另一方代表性印章“千岩秋气高”(见图3),内容深邃,寄寓情感,抒发性灵;文字参差,疏密相映,生动自如;骨气神韵,高明苍古,让人感受到苍润渊



图3 千岩秋气高(程邃)

秀、简约淡远、雅逸清新的意境;同时,也蕴藏着徽州文化的中和性、人文性和融通性的独特艺术精神。因此,明清徽派篆刻家在篆刻艺术创作中,将印文内容的诗画意境与其形式美感紧密地联系起来,追求作品的印外之韵,形成徽派篆刻艺术独特美学观念以及儒道哲学思想等文化特征,蕴含着深邃的审美意境,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独树一帜。

综上所述,以明代何震和清代程邃等人为代表的明清徽派篆刻艺术,“以秦汉为宗”,用涩刀刻石仿汉,一扫唐宋萎靡之风,开启了篆刻艺术新道路。明清徽派篆刻艺术体现出了以“崇古”与“求变”的艺术思想、“刀笔相因”的美学主张、“以艺载道”的文化品格和“文”与“质”统一的艺术精神等美学特点与思想,在中国篆刻艺术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明清徽派篆刻艺术家强调“古意”、“刀法”、“理趣”、“以艺载道”和“文质统一”的美学思想,也彰显出徽州文化艺术的多元性、兼容性、和谐性。其在融汇互补中,为追求更高的精神目标和审美理想,发扬了创新精神,使古老的篆刻艺术有了新的飞跃,极大地丰富了徽州的文化宝库,促进了中国篆刻艺术的

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明]何震.续学古编[C]//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上册).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
- [2] 孙慰祖.孙慰祖论印文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339.
- [3] [明]李流芳.菌阁藏印[C]//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
- [4] 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上册)[C].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51.
- [5] 林乾良.中国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 [6] [明]祝世祿.梁千秋印隽[C]//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
- [7] 沈野.印谈[C]//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上册).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
- [8] [明]周亮工.赖古堂印人传[M].印晓峰,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9] [明]朱简.印经[C]//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上册).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

(上接第105页)

过程是相通的。第四种“渐修渐悟”则是在不断地设计实践中进行思想的修复,一旦开始自己的设计生涯,设计实践会是极好的进行渐修渐悟的方式,通过不断地借助产品与消费者的交流,设计师得到第一手反馈,这些反馈在随后的设计项目中会得到考虑和重视,从而为下一次产品的成功设计奠定基础。这样的不断实践、不断磨合就是一个“渐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设计本身有不断的新理解和感悟,这就是“渐悟”的过程。

三、结语

禅学思想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在产品设计领域的指导意义还远远不止以上所论述的内容。产品设计师应该用心去领悟禅学的内在思想价值,并做到自我修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味禅的真谛,并能真正用禅的方法指导产品设计实践。一旦禅的思想在产品设计的各个领域得到充分体现,我们周围所

使用的产品会更加实用、更加简洁、更加人性化,更安静、更智能、更环保、更体贴。禅学思想指导下设计的产品具有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它们能够在心灵感悟的层次与我们沟通,因而不再是冷冰冰的人造设备,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人类自我机能的有机延伸。禅学中蕴含的巨大精神能量为我们的产品设计提供了深层次的思想源泉。作为中国本土设计师和设计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条件、有能力将中华传统的思想文化及精神传承下去,在产品设计中积极阐释和运用禅学思想,从而使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参 考 文 献]

- [1] 刘琼雄,胡传建.2006—2008 创意市集产品类型录[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45.
- [2] [英]詹妮芙·哈德森.1000个新设计[M].赵欣,译.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出版社,2007:78.
- [3] [德]马克斯·韦伯.亚洲的宗教[M].杨晶,李建华,译.上海:上海书店,1987:80—8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3)05-0110-03

傣族服饰色彩语言的符号价值

果霖¹, 宋文娟², 张天会¹, 徐人平³

1. 云南农业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01;
2. 西南林业大学 机械与交通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3. 昆明理工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3)

[摘要] 傣族服饰的色彩是一种可以传递信息的符号,具有表明归属与扮演角色的社会价值、代表图腾与驱邪祈佑的心理价值、崇拜自然与表现审美的视觉价值,是规范社会、满足心理、美化视觉的语言。

[关键词] 傣族服饰;色彩语言;符号价值

[中图分类号] J523.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3.05.020

色彩本身并无善恶贵贱之分,经过民族意识的投射之后,便被赋予了某种意义^[1],成为一种语言,成为一种符号,具有了鲜明的社会文化价值。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是色彩表达最直接和最广泛的媒介。傣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云南南部和西部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属壮侗语族,因其生活在气候温热、山林茂密、物产丰富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一系列色彩迥然的服装服饰风格。与现代服饰中运用的流行色不同,傣族服饰多运用高纯度色彩进行对比、搭配,如以黑色为基调搭配五彩色、黑白对比、红绿搭配等,这些都是经过民族意识加工,作为一种民族风俗习惯表现出来的,是历史文化、社会需要与心理需求共同积淀的结果,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云南民族服饰独特且重要的一支,傣族服饰的色彩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视觉语言,是一种能够传递信息的符号。这种符号具有表明归属与扮演角色、代表图腾与驱邪祈佑、崇拜自然与表现审美的价值,它不仅是傣族人民的徽记,更规范了傣族人民的社会秩序,强化了傣族人民的集体意识。

一、表明归属与扮演角色的社会价值

色彩语言是人类社会中作为信息传递手段的色

彩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2]。色彩作为语言可感知的表层结构或物质外壳,是色彩语言的形式,语言作为色彩蕴含的深层结构或意义内核是色彩语言的内容,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就构成了符号。傣族服饰的色彩语言产生于社会,是在社会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召唤下应运而生的,并伴随各种社会需要沉浮兴衰。傣族服饰色彩语言的意义也只有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形成。同时,傣族服饰的色彩语言又作用于社会,具有规范社会、满足心理、美化视觉的符号价值。

在社会交往领域,傣族服饰的色彩语言作为一种信息符号,具有表明个体的族群支系、社会地位以及婚姻状况的价值。这种服饰色彩符号的传递,对于维持傣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乃至婚姻习俗,进而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着重要作用。^[2]

1. 表明族群支系

在傣族聚集区,一定的色彩或色彩组合与一定的服饰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表明个体属于哪个族群支系。古代早有以“白衣”、“白夷”等称的傣族先民,如今的白傣、黑傣、花腰傣等都是以服饰色彩表明不同支系的,其下又细分多个小支系。如居住于红河流域的花腰傣又有多个支系,其中傣雅人服饰

[收稿日期] 2013-09-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C720049);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QN201257)

[作者简介] 果霖(1986—),男,云南省昆明市人,云南农业大学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设计艺术,民族艺术。

以黑色为基调,头饰选用红条花布,腰间、裙边绣有五色花边,以黑色长方形布套裹腿,脚穿黑色或红色带绊布鞋;傣洒服饰则以绿色为主体色,在袖口、衣摆等边缘处选用红、绿、紫、黄等绸缎拼接缝制,下穿黑色筒裙,以白色或彩色布套裹腿,仅穿红色布鞋。在德宏傣族地区,穿着蓝衣黑裙的是“傣欢”,着白衣黑裙的是“傣放”,而着浅衣花裙的是“傣卯”等。

2. 表明社会地位

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傣族服饰的色彩直接反映着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尊卑,其中,多以金、银色、五彩色系表明贵族身份。

五代十国时期的西双版纳傣族,以金、银色服饰代表不同等级。贵族称为“孟”,孟服专用绸缎,其女子筒裙可织三道以上的金色环圈,绣金色龙凤;次为“翁”,专用细布,其女性筒裙可织一至两道的银色环圈,绣银色星纹图案;其他等级用粗布,女性筒裙只可织一道彩圈。^[3]唐代的德宏傣族,妇女“贵者以锦绣为筒裙”,明代“贵者以金花金螺饰之”;近代,贵族妇女在庆典上凤冠霞披,粉红绸衣,套红绸袖套,黑缎滚边,金线绣花,裙以红、黄、绿等色绸缎缝制,边绣金花,鞋以红、青缎绣制,这些服饰色彩的繁华,都表明了个体的权势和地位。而贵族服饰的代表,当属有“贵族服装”之称的花腰傣服饰^[4]。花腰傣是生活在玉溪市境内的元江、东峨、新平、戛洒的一个傣族支系,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两山出土的文物、民间传说以及现存的民族生活形态,综合来看,元江、新平的花腰傣是古滇国主体民族越人的后裔,具有皇室血统。^[5]其人数不多,但与同样生活在热坝、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傣族人的服饰相比,花腰傣服饰色彩华美艳丽;绸缎为料,刺绣精美,五彩锦带束腰,银泡琳琅满目。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贵族身份和等级制度早已淡出历史,但具有古滇国遗风的花腰傣服饰却传承了下来,只是如此华美的服饰不适宜劳作,如今成为了祭祀、节日活动的盛装。

3. 表明婚姻状况

傣族服饰的色彩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下也有着很多规矩和变化,服饰根据不同的人群,依据多彩与活泼、单一与庄重等视觉效果,规范人们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色彩搭配还用来表明不同的年龄及婚姻状况。例如:德宏傣族妇女一生可分为四个年龄段:13岁以下,着白衫黑裤,绿腰带;15岁左右,着白衫黑裤,加黑底绣花围腰和腰带;已婚中青年妇女,着蓝衣黑裙或白衣黑裙,不系围腰、腰带,用白布或黑布包头;老年妇女,一律黑衣黑裙黑包头。红河沿岸

的傣族妇女则着黑布包头、黑蓝色筒裙、黑色无领上衣,袖口镶花边花绸,婚前镶红色,婚后则镶绿色或者蓝色,从这些服饰色彩上人们可以分辨出某个傣族妇女的婚姻状况。

二、代表图腾与驱邪祈佑的心理价值

图腾是原始人类在险恶环境中生活、生产受到自然界巨大威胁而心生敬畏和人类对自然物存在及自身繁衍等无法理解时所幻化出来的崇拜物^[2],图腾的产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古代原始人类对强大的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对自身的生老病死也感到神秘莫测,在大自然的挤压下,必然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进而寻求某种精神保护和精神支柱,这就产生了驱邪祈佑的心理需求。人类用图腾来表达“驱邪祈佑”的心理需求,如避寒暑、避风雨、避兽虫、避敌袭击等,即是驱除鬼怪邪气,祈求各种神灵护佑,并试图操纵强大的自然力,使之服从自己的意志。色彩本来是寓于图腾之中的,而当色彩被抽象出来应用在服饰上并能独立表达驱邪祈佑的意义时,就形成了服饰的色彩语言,具有了符号的价值,这就是傣族服饰色彩语言的心理价值。

傣族图腾有蛇、孔雀、象等,因此服饰的主体色彩多用青、黑、五彩、白等颜色。例如,白傣尚白,头饰、衣装皆为白色,代表其图腾白象、白牛、白虎、白塔等,以白为瑞;黑傣则尚青黑,男女全身或黑或蓝,代表其图腾蛇;红河、元江一带的花腰傣的傣雅人也以黑色作为服饰的主要颜色,并以五彩色进行装饰,表示其图腾为蛇、孔雀。

1. 以青黑为祈佑色

傣族的祖先是龙,世世代代都是龙,傣族服饰中崇尚青黑色,以青黑色为祈佑色即与青蛇(龙)图腾有关。传说古时候第三代召勐法童年老时躲避到山洞吃蛇药,原说七天七夜可返老还童,结果只修得人身蛇尾,化为地方神保护族人。然而,当青黑色被抽象出来应用在傣族服饰上时,青蛇图腾的驱邪祈佑作用就让渡给了色彩。德宏等地早傣老年妇女的包头、上衣、筒裙都是青黑色,老年男子的帽、衣、裤子也为青黑色,已婚妇女着黑包头、黑筒裙,未婚女子着黑围裙、黑裤子;元江傣泐妇女着青或蓝色长衣、蓝长裤、青布包头,傣雅妇女着青蓝或绿色内褂、青蓝短衣,着三条青色土布围裙、青布绑腿、青布包头。

2. 以五彩色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傣族社会中,关于孔雀和孔雀舞的故事流传

久远,传说楠木诺娜(孔雀公主)自奉孔雀为图腾。傣族则俗以孔雀为吉祥、幸福的象征,从不伤害,多家养。孔雀舞至今仍盛行,跳孔雀舞时需要戴菩萨似的面具,身穿模仿孔雀翅膀做成的衣服。因而,孔雀的五彩装饰在服饰中应用甚广,尤其是“花腰傣”,其得名就是傣族人在裙边、衣袖边装饰五彩条布,又以彩带束腰,从而将孔雀图腾的祈佑作用让渡给了色彩,用五彩色代表图腾,表达对美满生活的向往。

3. 色彩结合图腾形象驱邪祈佑

傣雅妇女常着圆领短袖内衣,下摆绣饰一排白色的尖塔图案。这是传说古代有妖怪侮辱傣雅妇女,被一位天神用白色尖塔镇住,后来只要姑娘喊“我有尖塔”,妖怪就不敢动了。于是她们就将白色尖塔绣在衣服上,塔尖直对下巴,表示准备喊“我有尖塔”来镇妖。这是用图腾形象与色彩共同来驱邪祈佑的典型。

三、崇拜自然与表现审美的视觉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便成为人们十分重要的需求。少数民族的审美意识多是在对世界的直觉认识之基础上形成的,而大自然是傣族原始崇拜的主要对象,傣家人从自然物的色彩中发现了自然物蕴藏的美,并把这些视觉美感幻化,作为色彩表达的主要依据,进而应用在服装服饰上。因此,傣族服饰色彩语言是在“表明社会归属”、“代表图腾”的基础上,结合“自然崇拜”,再依据与遵循色彩构成的形式美法则而表现出来的,这是傣族服饰色彩语言的视觉价值。

1. 红绿和谐

傣族人民生活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大自然是傣家人原始崇拜的对象之一,而“红花绿叶”则是大自然中最具代表性的色彩符号。那么,服装服饰作为傣族人民表情达意的主要载体,尤其对于红河流域的傣家人来说,自然是要用到红色与绿色。“红配绿”在现代人的审美观念中是典型的“艳俗”,而在傣雅、傣卡、傣洒等傣族支系的服饰中,却是以黑色作为底色进行衬托,将红色系与绿色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以五彩色进行点缀。它看起来是那么的和谐、统一,没有丝毫的刺眼,反而搭配出了朴实与华美。

2. 黑白对比

傣族对自然崇拜的另一色彩表达还表现在“以黑白论天地”,即以黑、白为心目中的天、地之色。“天白地黑,黑白对立,相生相克,于是生神生人生万物”,是傣族尚白崇黑的依据。从表现审美的角度来说,在国际通用的色标体系中,表示明度的垂直轴底是黑色,轴顶则为白色^[6],一黑一白,用强烈的明暗对比打破了白色的单调和死板,同时又凸显白色,使其更加明净与纯洁。白与黑在傣族服饰中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色彩表现,如傣族上衣多白而下装多黑,或是以黑色为基色,与大面积的白色银泡搭配;二是间接的色彩表现,如傣族妇女衣裙多运用归于红色系但又是不同属性的红色,即在红色中不同程度地掺入原崇拜的黑、白色,在带状行间以各种明度的红色进行对比,以形成对比中的统一。这种服饰色彩的选择与搭配,旨在崇拜自然的同时表达审美,是服饰色彩语言从物质符号向精神符号升华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结语

傣族服饰是云南民族服饰的重要一支,服饰色彩的运用更是独特且多样,并具有丰富的象征涵义,是传递信息的符号。傣族服饰色彩语言具有表明归属与扮演角色的社会价值,代表图腾与驱邪祈佑的心理价值以及崇拜自然与表现审美的视觉价值,这三种符号价值相互衬托、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规范社会、满足心理、美化视觉的视觉语言,是顺应时代需要的视觉语言。

[参 考 文 献]

- [1] 邓启耀. 衣裳谜语——中国民族服饰文化象征[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 [2] 朱净宇,李家泉. 从图腾符号到社会符号——少数民族色彩语言揭秘[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 [3] 杨鹂国. 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4] 孔令奇. 花腰傣服饰品艺术研究[D]. 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08.
- [5] 杨金云. 浅谈保护元江傣族服饰文化的必要性[C]//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傣族协会. 元江傣族文化.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
- [6]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